



《访谈卢金将军》

采访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受访者：米哈伊尔·卢金

翻译：散栌儿

前言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1915-1979），苏联作家、战地记者，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创作了大量战争题材小说。曾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两枚列宁勋章、红旗勋章、两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等军功章，以及六次“斯大林奖”。本文出自他生前采写完成但未付梓的档案材料。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卢金（1892-1970），苏联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中将。1919年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曾担任第16、第20、第19集团军司令，在斯摩棱斯克战役表现出色。1941年10月突围时受重伤，昏迷被俘。做了单腿截肢手术，一条胳膊瘫痪。1945年4月被美军解救，从巴黎返回祖国，1946年底因伤病退役。曾获列宁勋章、五枚红旗勋章、红星勋章等。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政府称赞卢金是“不屈不挠的苏联人，轻蔑拒绝敌寇的一切承诺和威胁”。1966年铁木辛哥元帅、科涅夫元帅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联名提请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授予卢金“苏联英雄”称号，被拒绝。1988年斯摩棱斯克市追授米哈伊尔·卢金“斯摩棱斯克英雄城市荣誉市民”，以他的姓名命名街道。1993年10月1日俄联邦总统追授卢金“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本文即是卢金从斯摩棱斯克战役到被俘再到回国的数年经历。

脚注、配图和说明是译者所加。

第一次采访

西蒙诺夫(К. М.): 七月十日他们给您留了两个师?

卢金(М. Ф.): 只有两个师加一个机械化团, 其他的都被调走。激烈的战斗打响了。坦克出现, 我反击, 但撤下来了……没有别的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全部……在斯摩棱斯克还有……

К. М.: 斯摩棱斯克是您的防区?

М. Ф.: 是我的, 我的防区。斯摩棱斯克有一个警察营, 三个志愿营。但……没有步枪。

十六号, 夜间, 军政治部副主任突然跑来告知我: “将军同志, 德国人到斯摩棱斯克了, 桥已炸毁”。我立刻跳起来, 军事委员会委员也来找我, 我们坐车直奔斯摩棱斯克。

到了斯摩棱斯克, 城内静得瘆人。清晨太阳升起, 一片寂静, 不见一个居民, 仿佛死城。难以置信德国人已经到了斯摩棱斯克。我驶近第聂伯河, 车子遭到机枪扫射……

К. М.: 从那边?

М. Ф.: 从那边。

К. М.: 桥真的炸啦?

М. Ф.: 炸了。桥梁都被爆破了, 甚至用一门大炮轰击, 所以, 是真的。

К. М.: 直接保护斯摩棱斯克的是哪些部队?

М. Ф.: 我的部队, 提前部署出去的支队、营, 第 132 师。是我的部队在守卫。怎么办呢? 我们收拢到明斯克—莫斯科公路通往斯摩棱斯克的岔路口, 我坐在那儿, 思考我该怎么办? 我一个排都没有, 连一个能够投入战斗的警卫营都没有, 还没动员到我这边来。我什么都没有。我俩陷入沉思。这时一位将军出现在我面前, 我惊讶地抬起头, 看着他问: “您是谁?” 他说: “戈罗德尼扬斯基, 少将, 129 师师长”。“你的师在哪儿?” “就在那片小树林, 我们的师部设在那儿”。“您有多少人?” 他说: “两个团, 但团里的营缺编, 炮兵团也不全。您呢? 您有什么? 哪怕一点儿呢?” 我把情况向他讲明了。他说: “下命令吧, 将军”。

К. М.: 他是不是已经归您指挥了?

М. Ф.: 不是。

К. М.: 他从哪儿来的?

М. Ф.: 撤下来的。

К. М.: 第 20 集团军的? 还是 19 集团军的?

М. Ф.: 19 集团军的。于是我下了命令……对了, 当我和军委委员赶到河边时——我的部队哪儿去了? 那些战斗过的官兵, 志愿营和警察营撤哪儿去了? 原来他们就在城区作战, 在另一边, 敌人打败了他们, 他们后撤。大家因为连续作战筋疲力尽, 都睡得死沉。

К. М.: 先过桥, 接着炸桥?

М. Ф.: 是的, 人马过来之后炸的, 有些地方甚至可以泅渡通过, 那条河并不很宽。二十年后我故地重游——当时的河水要比现在宽得多、深得多。虽然现在也还有一些小轮船在河面行驶。

当我叫醒他们, 他们好久缓不过神来, 不知道究竟要他们做什么。我很清楚没法指望他们, 但我还是下达命令: 在第聂伯河沿岸、滨河街的石砌建筑内占据尽可能宽的防线, 越宽越好, 开枪射击。哪怕是直瞄射击, 也要让敌人知道河岸这边有部队。

您知道吗, 这一招奏效了。十六号白天敌人没进攻, 十六号夜晚也没进攻, 等到十七号白天他们开始进攻的时候……

K. M. :他们开始渡河了对吧？

M. Ф. :是的，已经开始强渡第聂伯河了，我的渡口被占据。我把第46师调回来，第20集团军从右翼往前拱，中间是129师，再往前，格涅兹多沃那边我有152师。不管他们从哪儿突进，面对的都是第聂伯河，斯摩棱斯克北部城区已经被我军占领。他们无能为力了，至少接下来几天是这样。

第19集团军的两个师：127师和158师部署在我的46师以南，沿第聂伯河布防，从东、南方向包抄斯摩棱斯克。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中将来到我的指挥所，对我说：“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现在的态势十分有利。你看，如果我把我的两个师直接调动到斯摩棱斯克南郊，而你的152师从右翼、斯摩棱斯克西边进攻，再加上中间的129师，我们就能一举突入斯摩棱斯克，展开巷战，把敌人阻截在城内。”

我说：“是个好办法，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但我们大炮不多，炮弹也少。没有足够兵力”。可他说：“不，只能这样，咱们试试看吧”。那就试试吧。

K. M. :他当时指挥19集团军吗？

M. Ф. :19军。

各师过了河，开始推进。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来我指挥所，说：“让你的152师进攻。中路让戈罗德尼扬斯基进攻，因为部队已经……推进到斯摩棱斯克南郊了。那边……公路已经封锁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为两个师的进展感到高兴，电台传出消息：“部队被打回第聂伯河，退至起始阵地”。发生了什么？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离开后，部队的确渡河并推进到斯摩棱斯克南郊。就在此时敌军空袭，古德里安的坦克也沿公路打来，约有75-100辆坦克，因为我们所有的火炮都朝向西边，来不及转向南方，又担心误伤友军，没能及时射击——结果就被坦克击溃了。不得不撤退，回到原来的阵地。然后他们固守河岸，没让敌人攻过来。

152师也尝试渡河，推进到西郊。那边原有兵营，叫纳尔瓦兵营，他们往兵营走，敌人已经把它变成永久火力点，布置了炮兵。我们打不下来，什么也做不了，被赶回去了。

我还没跟你讲一个插曲。当时戈罗德尼扬斯基的师正准备沿着第聂伯河、在斯摩棱斯克北部中段展开阵地……我们五个将军站在那儿：我本人、戈罗德尼扬斯基、我的军委委员洛巴乔夫、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沙列夫，还有别人。一个红军战士走在人行道另一侧，背阴那一面，对着我们喊：“将军们出卖我们！”横向冲过来。我当时背对他没在意，以为是个疯子乱叫，大家继续在路边说话。站在一旁的副官克雷科夫上尉空手把他的刺刀推开——对方拿着刀——副官的手严重划伤。这个人被当场缴械。原来是因为空袭，加之坦克突击，这个红军战士精神崩溃了。正好我们刚刚宣读了命令，说枪决了巴甫洛夫将军和其他几位将军，因为他们叛国。当然巴甫洛夫根本不是叛徒、卖国贼，他是因为指挥不力、未采取措施才被枪决的，但这种说法在许多人心目中萦绕许久。



(西部方面军司令员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指挥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战役惨败，丢失明斯克市，1941年7月4日被捕，押送莫斯科受审，7月22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剥夺军衔、没收财产。1957年7月撤销原判，恢复军衔，1965年平反恢复名誉。)

K. M. :尤其人们还没忘三七年、三八年的往事。

M. Ф. :所以这个红军战士精神崩溃了。

戈罗德尼扬斯基的师也在进攻。他多次尝试渡河未成功，炮火猛烈。

21日敌军成功在第聂伯河北岸、斯摩棱斯克北部的季赫温公墓一带渡河，同我军展开激烈巷战。北部城区多数是低矮小房子，三层楼的很少。部队原本就兵力不足，反坦克炮缺乏，敌人却有坦克和迫击炮。迫击炮在城市里特别管用，能从很近的距离打曲射，击穿任何房顶，所以发挥了很大作用。而我军迫击炮不太够。

敌人发动猛烈攻势。这时空中侦察报告：敌军大队车辆正沿奥尔沙—斯摩棱斯克旧公路（不是新公路）向斯摩棱斯克移动。

152 师师长切尔内绍夫上校头脑敏捷、守纪律、有文化，广受红军战士和各级指挥员喜爱，是一位各方面非常出色的师长。他预先标定了射击坐标，手下四个炮团：两个师属的、一个集团军的，还有一个装备双联和四联高射机枪的团，一切准备就绪。从他的观察哨能看见敌人在克拉斯内附近稀疏树林集结。尽管炮兵请求开火，身边的参谋军官也焦躁不安，切尔内绍夫仍坚持等待敌军车辆、坦克、大炮聚集到他认为充足的程度，才下令发动猛烈轰击。

这个师的旅政委梁赞诺夫后来告诉我：“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您看看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切尔内绍夫。他在观察哨用炮队镜观望，一边跺脚一边念叨他的口头语‘特林基-布林基’——这人有个习惯，无论遇上什么事总爱说‘特林基-布林基，好嘛，特林基-布林基’，边说边跺脚，看我们的炮兵开火，德国人乱作一团”。我军随后发起反击，俘虏三百敌兵，更重要的是，许多红军战士和军官缴获了德国冲锋枪，以及大量子弹，之后在斯摩棱斯克战斗和接下来的撤退中派上了大用场。

俘虏来自 137 步兵师，奥地利人。这个师刚刚抵达就被投入战场，还没参加过战斗呢。我问他们害不害怕当俘虏，他们很坚定地说 Nein。我问 Warum？他们说：父辈和祖父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也被俄罗斯俘虏过，送去干农活，待遇挺好，不少人还娶了俄罗斯媳妇领回奥地利，如今日子不孬，所以我们大概也会被送去干农活吧。

我当然不会劝阻他们想要干农活的愿望。

但那个时候亚尔采沃方向的交通干线已被切断，我无法后送俘虏。大路断了，我们收不到补给和弹药，只能绕行条件不好的远路，十分困难。因此我没办法把俘虏送走。

紧要关头，敌军坦克从杜霍夫希纳方向直插我的指挥所。我的处境可想而知，人都坐在朱科沃国营农场的一间板棚，这就是指挥所，真不幸还关押着三百俘虏。该怎么办呢？德军可能会暴动，夺下区区几个守卫的枪。情况非常危险。所幸此地有两个炮兵营，直瞄射击消灭两辆坦克，其余的逃跑了。

德军 137 师被打散之后，其残余部队渡过第聂伯河进入斯摩棱斯克。此前城内只有德军第 29 机械化师，现在又来了 137 师。激烈的战斗再次打响，戈罗德尼扬斯基被逐出北部城区。

K. M. : 他当时在城区中部，对吗？

M. Ф. : 不，他在城北，几乎被打出城北。于是我命令 152 师师长从西侧进攻斯摩棱斯克。战斗又开始了：又打“加里宁”工厂，又打季赫温公墓。

K. M. : 这两个地方都在城北？

M. Ф. : 都在城北。季赫温公墓无数次易手。为什么打一座公墓打那么久？因为墓碑对于双方都是很好的掩体，所以才激烈争夺。之后争夺机场，我们的 153 航空师在机场坚守了很长时间。战斗持续进行，他们照常升空执行方面军司令员的任务。又争夺发电站、火车站，火车站全毁。最终到了 27 日，129 师再次发起进攻，重新占领斯摩棱斯克整个北部城区。

K. M. : 所有人都过河了吗？

M. Ф. : 都打过河对岸了。从未成功突入斯摩棱斯克南部城区，没兵力了，炮弹也没了。从 7 月 10 日到 25 日，将近二十天战斗，我没收到任何补充——除了从莫斯科、伊万诺-沃兹涅先斯克、弗拉基米尔和高尔基赶来的两千个共产党员。必须指出，这些共产党员在斯摩棱斯克保卫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是连接部队的纽带、水泥。当然，部队本身打得也很好。为什么 152 师、第 16 集团军的部队打得这么出色？为什么他们从未溃退？以后有机会再谈，我会告诉你第 16 集团军在外贝加尔地区是怎样生活和训练的。自然环境锤炼了他们，条件极其艰苦，没有营房，只能睡地窝子。地窝子也不是常见的地窝子，上面盖个顶，土墙和板床，柳条编一编挡土。环境潮湿阴冷，零下 35-50 度的霜冻很常见。风大得站不稳，上厕所都得拉着绳子走，否则会吹到草原上冻死。这支部队就在这种环境中训练。是一支强悍的、锻炼过的队伍，所以他们战斗如此顽强。

敌人再次企图渡河，调来坦克部队、党卫军师，“大德意志”团也来了，我们开始撤退。再次激烈争夺每一栋房子、每一条街道。但我们的力量已经耗尽。我们之所以撤退，不是因为打得不好，而是因为无力再战。这时第 16 集团军和第 20 集团军已经合并，我们——16 集团军和 20 集团军的两个军委委员库罗奇金和希马诺夫斯基、卢金和洛巴乔夫——碰头开会，商议下一步怎么办。

虽然到了 27 日我们已被完全包围，陷入战役合围之中，但我们知道援军正在来搭救：霍缅科将军的三个师正从别雷方向朝我们推进，加里宁将军的三个师也从亚尔采沃东边来增援，而且亚尔采沃附近还有罗科索夫斯基少将的三个师；南边罗斯拉夫尔方向：卡恰洛夫将军的第 28 集团军，暂时包含三个师，正准备进攻。我们知道总共十二个师正向我们开来，显然他们还带有一定数量的大炮和坦克——我们推断如此。所以无需特别担忧，要继续战斗。遂决定不撤退。但 29 日，敌人集中大量坦克攻打第 20 集团军左翼，发动空袭，撕破了莫吉廖夫奇克将军的第 69 步兵军的防线。152 师师长报告我说，他的右翼被压转向北，作战方向不再朝西改朝北了。

第 69 军军长莫吉廖夫奇克少将来我的指挥所，对我说：“将军同志，我找不到我的集团军司令和军部，他们大概已经撤退转移到另一个指挥所了。我向您报告，请您采取措施：我的军正在撤退”。

我跑进观察哨——就在附近小树林，视野很好——看见我军和敌军的坦克正在激烈交火，步兵已经开始成片撤退。

于是我给第 129 师师长戈罗德尼扬斯基下命令。他是优秀的指挥员，非常冷静，我曾经去他师部视察，我们的指挥员控诉他打仗的时候不仅下到营，甚至下到连。我批评他：“阿夫克森季·米哈伊洛维奇，

您怎么不爱惜自己，全军都需要您啊！”他开玩笑说：“哎，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我有我奶奶的护身符，死神拿我没办法”。他确实总拿根细手杖，也不拄着，不戴大檐帽——因为大檐帽太显眼——光着头走路。后来方面军司令员询问有没有好的师长担任集团军司令，我就推荐了戈罗德尼扬斯基。他接手一支集团军¹，在哈尔科夫跟敌人拼刺刀，一直战斗到最后，被德国佬捅死了。

我命令戈罗德尼扬斯基在明斯克—莫斯科公路上布置阻击线。局势已经相当危险。敌人从北郊再次击退129师，152师还在西北郊，如果我多拖延一夜，敌人就会从西面和北面合围我，两个师就困在斯摩棱斯克了，没有枪弹，没有炮弹。给养耗尽了，食品和油料都快没了。

我决定撤退。29日夜—30日部队全部撤出斯摩棱斯克。

遗憾的是，《军事历史杂志》第十期写道：敌人在15日、16日已经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北部和南部。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我们在斯摩棱斯克战斗两星期，打了艰苦的仗，牺牲几千人！是谁这么不负责任地乱写？

撤退命令是29日夜—30日凌晨下达的。但152师的一个营没出来，他们在30日甚至31日仍坚持战斗。这个营的残部突围后，在营政治指导员托姆斯基同志率领下拉起一支游击队。他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最后以游击队长的身份英勇牺牲。

K. M. : 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您有几个师？两个师？

M. Ф. : 后来有了第三个师，再后来增加了第19集团军的127师和158师，这两个师一直停在东岸。他们自己没法渡河，但也没让敌人过河。

K. M. : 您自己手下实际只有很少的部队？两个师和其他一些队伍？

M. Ф. : 只有这些。加上第19集团军的三个师。

但它们的人数都很少，我们就靠着这些部队打仗。难以想象我们如何抵挡那么大一支敌军，我们确实做到了！第17、18坦克师，第29机械化师，第137师，“大德意志”团，都盘踞在斯摩棱斯克，第聂伯河对岸的南面。河这边还有霍特的部队。

K. M. : 那么撤退的情况怎样？

M. Ф. : 那是个炎热夏天，但燥热不仅来自太阳。敌军看出我们正在撤退，身陷重围，所以加紧向我们猛攻。这里就彰显了我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司令部、政治部、集团军（军一级建制因为已无必要被解散了）的全体军官统统补充到师，清空所有辎重车辆，全部投入一线作战。无论司令部的、政治部的、师的、团的指挥员，凡能够作战的都上前线。每次敌人发起攻击我们必予以反击，虽然反击了，遗憾的是大炮和迫击炮支援很弱。

我命令：炮兵只有在团长下令、并且目视看得见目标或敌方坦克时才允许射击，其他情况不得擅自开火。炮弹所剩无几，敌人的坦克源源不断，飞机在空中不停盘旋。

30号、31号、1号、2号、3号连续撤退。3号我们才开始在亚尔采沃、索洛维耶夫渡口一带渡过第聂伯河。这五天时间，第16和第20集团军功勋卓著。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阻击敌人，使敌军极度疲劳。

最糟糕的是，4号早晨我没有渡河器材、没有浮桥，第20集团军在拉德琴科村附近还有浮桥，我这边只有A-3型充气橡皮艇，承载能力弱。等我赶到拉德琴科村渡河口，发现那边的浮桥已被炸毁。只好退回来用自己的小艇，优先让伤员和能够过河的炮先过去，重炮因为橡皮艇载不动，只能丢弃在对岸。就在这个渡口，汽车一辆接一辆往里挤，我的腿被撞断。刚出发那会儿还有雾，烈日升起，雾气散开，敌机就临空了，机枪、迫击炮和大炮一阵猛打。

您打过仗，见识过战场什么样，那真是无边炼狱啊。人们争相跳水，不会游泳的淹死了。辎重队想涉水过河，马匹也呛水沉底。整条第聂伯河塞满马车和汽车，对岸的洼地也有不少马车、汽车。

最后好歹过去了，部队渡河了，进行防守，开始整顿秩序。但我们的队伍减员严重。

八月五号我被叫到第20集团军司令员指挥所。铁木辛哥和布尔加宁一起去的，还叫了罗科索夫斯基。

对了，我还没说，当我们撤退到亚尔采沃附近，罗科索夫斯基成功撕开包围圈，使我们迅速补充了炮弹和枪弹。所以渡河的时候稍稍轻松些。

K. M. : 这帮助你们冲出来了。

M. Ф. : 有助于突围。不仅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霍缅科部队、加里宁部队、卡恰洛夫将军的部队都在阻止敌人进犯莫斯科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排头兵是第16军和第20集团军，他们是阻挡强敌向莫斯科前进的主要力量。

我们抵达指挥所。铁木辛哥祝贺我们冲出包围圈，感谢我们打得漂亮。我等会儿把他的报告读给你听。要我现在读吗？

K. M. : 您请。

M. Ф. : 铁木辛哥向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报告称：“第20和第16集团军长期牵制‘中央’集团军群的大量兵力，使其无法从斯摩棱斯克地区向德罗戈布日—维亚济马方向突破，最终为苏联军队在斯摩棱斯克以东重建连续防线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西方方向遏制敌人一个多月之久。第20集团军和第16集团军的作战特点是顽强防守与果断反击相结合，无论白天黑夜。我认为，经过这些天的激烈战斗，

我军彻底打乱了敌人的进攻计划。攻击我们的七到八个坦克和摩托化师、两个步兵师在付出巨大伤亡后，整整十天丧失进攻能力。库罗奇金和卢金面对庞大、凶猛的敌军，在对方集中大量航空兵，意图合围和消灭我军的情况下，能够长时间坚持作战，两人功不可没。——铁木辛哥”

K. M. :这是宝贵的材料。

M. Ф. :他对我们表示感谢，说：“我已经决定，也报请莫斯科同意了——库罗奇金将会调离我们，任命卢金为第20集团军司令——这是一个大集团军，处在主要方向上，第16集团军的司令由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担任。原第16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的所有师合并，形成更大的作战力量”。²

K. M. :并入20军？

M. Ф. :并入20军。

K. M. :所以您还带着您的师？

M. Ф. :还属于我。

K. M. :那么指挥机关……

M. Ф. :我的指挥机关转到他那儿去了。我这边留了一部分人。

K. M. :增援部队是吗？而且给他补充了新的师？

M. Ф. :对，那些原本就在他那儿、跟他一起作战的师。

K. M. :他那边没有指挥机关吗？

M. Ф. :他只有很小的指挥机关，一个小组。后勤什么的没有。

K. M. :您这就跟洛巴乔夫分开了。

M. Ф. :对啊，我们和洛巴乔夫就此别过。

继续说回铁木辛哥。他说自己要走了，我将调到第20集团军，罗科索夫斯基将指挥第16集团军。说完话我们各奔东西。

我和罗科索夫斯基是老相识，以后有机会可以单独讲讲他。如果您愿意我现在就可以说。

K. M. :太好了。

M. Ф. :我以前在工农红军管干部工作。罗科索夫斯基当时是第15师师长，在外贝加尔，达乌里亚。那地方没水，军马喝的水得用罐车拉去。再远就是大草原，早先叫“饿死人草原”还是什么的，鬼知道，方圆几百千米无人烟。

他任期满了，从那边回来找我报到。我见了他说：“罗科索夫斯基同志，我们没有师职务的空缺，没办法安排您”。他说：“那就给我个旅吧”。我说：“旅也没有”。“那就给我个团吧”。

我心想：“什么样的指挥员在兔子不拉屎的远东地方服役这么多年，回来还能说‘给我个团’？这人不简单”。

我说：“过几天再来一趟，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于是我给他找个师，第12师。为此进行了好一番调动。

K. M. :他是不是因为不想去司令部，才有这种问题……

M. Ф. :不是的，需要等一等，可他不肯等。宁肯带个团。

K. M. :噢，他不愿进预备役？

M. Ф. :对，不愿意在预备役。所以我就给他安排了职务，因为他是那种极其少见的指挥员。他让我想起利涅维奇……不对，让我想起库罗帕特金。当年库罗帕特金被撤职，改由利涅维奇指挥军队³，库罗帕特金给皇帝打电报：“陛下，请不要剥夺我留在军中的机会，哪怕当个军长，我也愿意在利涅维奇中将麾下做个优秀指挥官”。可他当时已经是步兵上将了，您明白吗？

我说：“啊，此人真了不得，我必须为他找一个师的职务”。果然找到了。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出发赴任。而现在我又和他重逢了。

K. M.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请谈一谈您对铁木辛哥指挥西部方面军那段时期的印象和感受？

M. Ф. :当敌人攻入斯摩棱斯克，我向上报告之后，立刻收到铁木辛哥和布尔加宁签署的电报：“丢失斯摩棱斯克就送你们上革命法庭审判”。当晚又接到第二通电报：“如果打不下斯摩棱斯克就枪毙”。这种情况持续了多日。

² 两个集团军1941年8月8日正式合并。8月10日西线亚尔采沃的部队重组为新编第16集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

³ 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曾任俄帝国战争部长，因俄日战争失利被撤职。

我从第129师回来，这支英雄部队强渡斯摩棱斯克南部城区屡屡受挫。我刚回来洛巴乔夫就递过电报说：“看吧，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电报”。里面说我和洛巴乔夫被推荐授予政府最高奖项，“也许这能帮助你们拿下斯摩棱斯克”。

我当时很恼火，心烦意乱，回复电报说：“无论你们以军法审判和枪毙威胁我，或提名授予我最高奖项，都不如送来炮弹和补充人员更有帮助，我恳切请求你们安排”。

可是铁木辛哥和我通话，或者亲自到集团军视察，从未暗示发过威胁电报。他开玩笑、鼓励我，承诺会派坦克和飞机。甚至明令要求：“坦克拨给第16集团军，航空兵支援”。但事实证明别的地方更急需飞机、坦克，到最后也没给我派来。

我认为，铁木辛哥那时候是真正指挥西部方面军的人。您看，在原来的西部方面军遭受惨败、事实上崩溃之际，他用微不足道的兵力，在最高统帅部的协助下，重新建立起一条完整防线，把敌人挡在莫斯科城外两个半月。哪个指挥员还能做到！给我指出来是谁？哪个方面军的？然而他做到了。有人说他手下有优秀指挥员——卢金、科涅夫、库罗奇金。但仅仅他手下有强将吗？为什么只有他做到了？我认为这是他和军事委员会的巨大功绩，在这个方向上抵挡敌人进入莫斯科。我认为，他当时处于最佳状态。他从不胡乱干涉，不插手琐碎小事。

K. M. : 开战前一年他做了很大贡献，办了好多事情。

M. Ф. : 我认为他把军队带回正轨的。诚然，当时党中央和斯大林肯定已经明白这样下去不行了。芬兰事件表明军队并未准备好作战，必须有所行动。我认为斯大林不糊涂，他知道这一点，赋予铁木辛哥相应的权力，而这正是铁木辛哥需要的。

您知道吗，当我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从总司令那儿出来，感觉自己像长了翅膀。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了这股力量，能够扭转军队的一切，让军队重新变得像三七年之前那样强大。毕竟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无论指挥员或政工干部都有极高的水平！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您根本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批指挥员！

以前亚基尔⁴的时候，开班上课，做出决策、评估局势——随便哪个师长、军长，随便叫出一位来，局势评估妥当，决策有理有据，航空兵和机械化部队运用正确。听他们发言简直是享受。

之后这支军队忽然没了，不再是军队，沦为乌合之众。芬兰事件表明我们没做好战争准备，军队打不好仗。但铁木辛哥用一年多时间让军队重回正轨。您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写过莫吉廖夫的战斗。您见识过那些人，您描写过谢尔皮林。他们还是以前那些人，只是现在长了翅膀，稳稳站在大地上，感受到身后有一股力量支撑和引导他们。他们愉快接受铁木辛哥推行的措施，军队又变回了军队。如果我们主要方向上的部队司令员，不是大清洗之后那些人，而是其他更老练、更坚定的人，我想这一切本来可以不发生的。

人人指责斯大林、铁木辛哥、朱可夫，说他们进入战争的方式不正确。好，我要问了：库兹涅佐夫为什么命令舰队进入战备状态，为什么舰队在开战头几天没受很大损失？为什么？毕竟下达给每个人的命令是一样的，谁也无权擅自行动。那他为什么提前把舰队从易受打击的塔林和其他港口撤出来，调到喀琅施塔得？为什么他就能做到？因为这是司令员的职责。如果别的司令，正如我先前跟您说过的，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能够组织演习，把炮兵和工兵部署到部队，集中到作战方向，而不是靠近边境——没必要贴着边境布防——就可以打一场遭遇战，握紧拳头而不是摊开巴掌打。但实际上，警报拉响后部队就是这样分散着各自为战的。他们英勇拼杀、浴血牺牲，宁死不逃跑。您自己写过人们是怎样战斗的。就像172师在莫吉廖夫的血战，不正是这样吗？！

一切本可以不同。

至于斯大林的问题，我以后再跟您谈，时间不早了。事情怎么发展的我下次详细告诉您。

4 约纳·亚基尔，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曾领导红军军事教育机构。1937年受图哈切夫斯基冤案牵连被镇压枪杀

第二次采访

M. Ф.: 9月16日我被任命为第19集团军司令。原来的第19集团军司令科涅夫被任命为西部方面军司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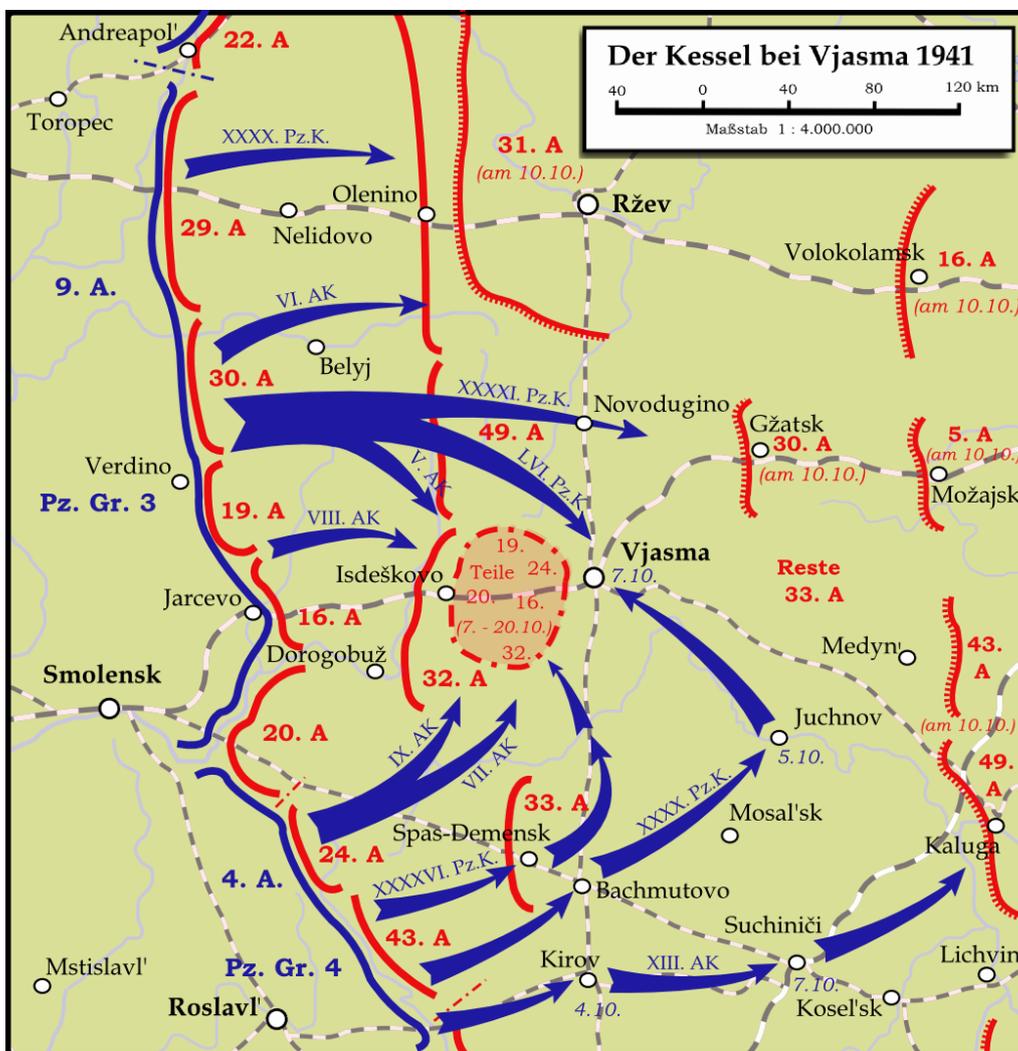
为了让您有个整体印象，这么说吧，方面军司令部把全部六个集团军拉成一条防线。西部方面军向南延伸，两个集团军：第43、第24集团军是预备方面军的。西方面军背后还沿着勒热夫—维亚济马一线及更南方向部署了预备方面军的其他集团军。

我是这样看待局势的。两位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和布琼尼⁵，互不隶属，两边的集团军都拉成一条直线，几乎没有预备队：一个集团军仅一个团，算什么预备队呀？说实话这不能叫预备队。方面军司令也只有三个师和两个坦克旅，分散在相距很远的地方。

我与伊万·斯捷潘诺维奇⁶交谈的时候说：您看，目前这个局面，两位司令员互不隶属，预备队薄弱，既然互不服从对方的命令，可不可以把两个方面军拆分成几个部分。那么每位司令员手里都有自己的预备队，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调动。这样的话预备力量就更强了：一个方面军起码有两个集团军。

后来的情况是，9月30日敌军突破布良斯克方面军防线之时，预备方面军司令布琼尼根本派不出预备队。所以部队开始向东撤退，他位于勒热夫—维亚济马之间的三个集团军彼此相隔甚远，没办法调动。至于科涅夫，当敌人突破第30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之间防线时，他同样调不动它们——因为不归他指挥。

随着战事进展，在第聂伯河的预备方面军也被突破，导致这些集团军无法运用。这是我军总参谋部和本营的重大失误和错判，本应被及时纠正的。



(1941年10月，维亚济马战役)

5 谢苗·布琼尼9月13日-10月8日担任预备方面军司令

6 科涅夫

К. М.:之前有没有人向大本营提出过这个问题?

М. Ф.:不知道。

К. М.:您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说过吗?

М. Ф.:我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说过,但不知道他是否汇报过。我想他应该汇报了。毕竟时间太紧张,也有可能没顾得上,他必须熟悉每个集团军的情况。

К. М.:事实上,他是在大溃败之前十八天才到的方面军。

М. Ф.:是的,才刚到。他还没来得及熟悉各集团军,所以没法向上汇报。他不熟悉自己的部队。总得先和司令员、司令部见面吧。

再者,面临这么复杂困难的局面,敌人的进攻迫在眉睫——这从战争之初、从希特勒入侵我国那一刻就开始了,任命、调换集团军、军、师,甚至方面军的司令员毫无根据。尤其我本人,四个月的战斗我指挥过四个集团军。您说我这叫什么司令啊?可人家讲了:你能行!

也许我没那么聪明绝顶,也许因为我能够把事情安排妥当,总能做出点儿成果,就被当成打引号的“最佳”人选,使劲儿把我往主要方向调。可能我幸运吧,可能这些工作适合我吧。但说实话这完全不合理,因为我来不及熟悉手下的师长,也没时间了解司令部。我没办法仅凭三两句话就确定自己司令部里头哪些人是可信可靠的。

К. М.:九月份的实际情况是,布琼尼在西南战线给斯大林发电报说应该后撤,斯大林很不满意,把他换下来,派铁木辛哥接替他。当然,铁木辛哥也无力回天,只能熟悉当地已经形成的局面。同时,布琼尼被调到了他同样不了解的预备方面军……

М. Ф.:并且任命科涅夫指挥他不熟悉的方面军。叶尔沙科夫刚到第20集团军,不知为什么从22集团军调离了。卢金从20集团军调到19集团军。完全是新情况。我接手19集团军的时候科涅夫已经走了,我告别他就开始熟悉部队,巡查各个师。首先,我发现战壕挖的不规范;大炮虽然进行了伪装,但炮兵阵地器材不够。反坦克炮需要构筑适当掩体,这样才能发挥作用。没挖交通壕,高地的交通壕只是个别散兵坑。后侧防线没建立起来。工程器材极少,反坦克器材几乎为零——我指的是地雷。一切都得重新安排。

我抵达之后立即召集各部队指挥员和政委开会,命令他们迅速开挖带胸墙的全剖面战壕。通常挖的那种直沟不合适,会被火力射穿,一旦坦克逼近,壕沟横着竖着就被打透了,所以必须挖掘规范战壕……

К. М.:蛇形壕沟?

М. Ф.:不只是蛇形,要胸墙、壕沟、再一道胸墙。这样横墙和胸墙之间就可以设置机枪掩体。前沿和后方之间的交通壕也要蛇形的,也是全剖面。

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让司令员手里有一个师做预备队,不得不抽出一整个师。确实,这就使得部队防线拉得过长,因为当时部队只有30-40%的兵力。换句话说不满员——30-40%。

К. М.:您接手的时候,集团军兵员和武器什么情况?

М. Ф.:七八千人。

К. М.:一个师七八千人?

М. Ф.:对。正常是一万二千五百人。

К. М.:您有几个师啊?

М. Ф.:我手里有这些:老底子的第50师,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师,完全是边防军组成的,战士和指挥员统统来自边防军;还有第89步兵师;再就是第91西伯利亚师,在托木斯克组建的;哈尔久诺夫上校⁷指挥的第166师,也是西伯利亚师;第244师……对不起说错了,第244师才是正牌边防师,第50师是西伯利亚师。以及第134师、214师、第45骑兵师、第127师……和几个坦克旅。集团军没有航空兵,只能申请空中支援。

К. М.:坦克旅是什么样的?

М. Ф.:当时已经有了T-34坦克和KB坦克,数量很少。大部分是BT-7,它很容易着火,装甲也薄,打几下就退出战斗了。

К. М.:那时候KB坦克有炮弹吗?

М. Ф.:有,但不多。

在构筑防御地带的工作中我特别重视前沿。我听说罗科索夫斯基向科涅夫和布尔加宁提出过一个方案:构筑前沿阵地,在前沿建立足够坚固的工事和精锐部队,而主力后撤至第聂伯河一线。您没走过通往斯摩棱斯克的那条大路吗?

7 此人实际姓“霍尔济涅夫”,1941.8.31调任162步兵师。

K. M. :我走过几次。

M. Ф. :您注意，那边东岸高，前方是辽阔山谷，地形十分有利。科涅夫和布尔加宁看过后完全否定了这个方案，此事我就没再提。但我采用了别的办法。

我构筑了宽大完善的前沿，主防线设在河边。工程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加固，放了鹿砦。在最容易被坦克突击的方向布设雷场，尽管反坦克地雷不多。为炮兵构筑了土木火力点，掩蔽良好。也就是说，我们在坦克突击地带布置炮兵，使整个地区都能反坦克，有掩蔽。虽然这些掩体不是混凝土结构，只是土木构筑的，但在第一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

整个集团军和师的政治部门始终下到基层。集团军和师的报纸一直在提醒官兵敌人即将发起进攻。一切情报都显示敌军快要打来了。

我们掌握哪些情报呢？9月下旬敌人进行了积极活跃的侦察，既有空中侦察，也有强力的试探性进攻。不是大规模来袭，而是用携带炮兵的大部队侦察。他们的意图是寻找我军薄弱环节，寻找我们的炮兵阵地，摸一摸哪个位置有机可乘，从而集中力量进攻。对我们而言局势很明朗。

此外，方面军司令员在27日最终确认敌人随时会进攻。因为27日当天我军俘虏了一名德国军士长，是飞行员，他交待说敌人准备在下个月2号动手。

于是和司令部进行了各种方案的推演。召集师长们共同研究，并和他们推演作战场景。凡被敌人试探进攻打坏的地方都连夜修补。就这样从13号到敌人发起进攻那天，部队进行了大量工作，导致他们筋疲力尽，睡眠时间极少。

2号我醒得早，时刻准备迎接敌人进攻。果不其然，天刚亮，所有电话同时响铃，报告敌人开始炮火准备了。我自己也亲耳听见炮声。炮火准备之后是空袭，接着开来坦克，步兵尾随坦克进攻。

K. M. :进攻您哪些地段，北面吗？

M. Ф. :我的右翼第244师方向压力最大。糟糕的是该师师长是个酗酒成性的将军，我一直害怕他打起仗来喝酒误事。结果在战斗中途我不得不撤换他，让师参谋长克拉斯诺什塔诺夫上校接替——此人随后的表现证明这一任命是对的⁸。

K. M. :这是边防师吗？

M. Ф. :边防师。敌人对244师、我的右翼施加压力，左翼的162师和第30集团军的另几个师也被猛攻。敌军突破了第30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的接合部，迅速向侧翼迂回。

K. M. :您的右翼是第30集团军？

M. Ф. :是的。

K. M. :左翼呢？

M. Ф. :第16，再往南是第20。

244师的右翼向北弯折，它的一个团在战斗第一天两点钟左右就被包围了。我询问师长他怎么打算的，怎样把他的团救出来，要不要我支援。他说，目前这个团的第二梯队已经投入进攻，于是我命令相邻的第91师预备团也来助攻解围。这样到了当天结束时，那个被包围的团成功突围。

第166师参加了第一天的战斗，它是我的预备师。敌人在第89师的阵地上无法前进，连续三次进攻被打退。第50步兵师左翼方向的全部进攻也都被挫败。

罗科索夫斯基报告说敌人对他发起攻击，实施炮火准备，但他进行了反炮击，敌人的攻势没能展开。我认为，第19集团军及时进行的炮火反准备也起了很大作用，成功遏制敌军集结……

K. M. :您说第16？

M. Ф. :第19。

K. M. :您也进行了炮火反准备吗？

M. Ф. :我也进行反准备了。很有帮助，因为敌人密集集中在某些地段，这些地段我们已推测到了。

第一天结束之际，我军始终在前沿地带甚至纵深地带和敌军鏖战。敌人突破的时候没越过察列维奇河，就连沃皮河也没越过。

夜间我不得不进行重新部署，主要不是步兵，而是调整炮兵和炮兵阵地。因为已经看清楚了，敌人意图包抄右翼，压力会集中在右翼。我把大部分炮兵集中到右翼方向。

这时候给我补充了坦克。刚开始没有坦克，之后配属给我第127、第143坦克旅，不得不让它们投入战斗。当战线明显出现缺口，第30集团军迅速向东撤退，我又得到方面军预备队：第214、第134步兵师增援。我稍微轻松了些。

第二天继续争夺前沿地带。敌人一度突破战线中路，推进到沃皮河，但我军的反击将敌人击退。

就这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的战斗都在我军防御地带进行。我们没把阵地让给敌人。虽然敌人突破前沿，插入我军阵地，但沃皮河沿岸的主阵地仍在我们手里。

8 第244师原师长尼古拉·谢尔巴科夫少将10月3日被免职，理由是“无力控制部队”。

K. M.:您跟右翼的友军失去联络,跟方面军之间还有联络吗?

M. Ф.:二号当天敌机轰炸指挥所和方面军的后方机构,有线通讯中断。这种情况大概一直持续到次日三号中午,但无线电正常使用。

K. M.:后来有线通讯彻底断了吗?

M. Ф.:很不幸,之后就完全打不通电话。后来我必须频繁更换集团军指挥所的位置,一直通过无线电联络各级军官,我和他们从未失联过。虽然无线电曾经出了一阵子问题,很快就修复了。我不能说自己和军官之间失联了。

K. M.:我有个疑问,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关于发生在卡斯涅伊的不幸,那次空中轰炸。有人说:怎么会这样,明明预料到德国人要进攻,为什么不转移指挥所,竟把一切都留在德国人知道的地方呢?

M. Ф.:当然,应该分散驻扎。应当修筑掩体,必须挖防空设施。但实际怎么样呢?我去领取红旗勋章,勋章是科涅夫发给我的,我就感觉吃惊。这地方早年想必是个庄园,房舍连排,有土窑,有多条道路。方面军司令部是庞大的机构,车来车往,敌机沿着公路飞行,一看就知道这儿是指挥所。何况敌军的侦察兵也肯定报告过了。敌机来轰炸,空军指挥所立刻倒塌,当场死亡十五到二十人,六十多人受伤。您想想,伤亡的可是方面军急需的指挥人员。这是巨大的疏忽。或许科涅夫没能迅速安排好一切,但无论如何应该转移啊,至少……

K. M.:要有备用指挥所。

M. Ф.:毫无疑问,必须有备用的。

四号收到方面军司令员的通令,说第19集团军打得好,号召向它的指挥官卢金学习。通令是电台传达的。这让我更加振作精神,决心坚守阵地,因为我认为:虽然敌人正在从两翼包抄我,但方面军司令员显然会采取一些措施,而且他还鼓励我像以前一样作战。

与此同时我又接到另一条命令:要撤出第16集团军的指挥机关。对此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师移交给叶尔沙科夫,另一个或两个师向维亚兹马以东转移。从我这里调走了两个师,其中一个第50师——非常优秀的部队,我真不舍得。其实所有的部队我都不舍得。

K. M.:那个师当时参没参加战斗?

M. Ф.:第50师本该坐车转移。但车辆不是方面军派来的,是我们集团军的。您肯定明白,如果把这些车都用了,我们自己的师依靠什么补给?这些已经是最后的车辆。但命令如山,必须执行。

四号当天我没能让他们后撤,一直到五号晚间终于把这两个师撤走。那是非常困难的时候。敌人步步紧逼,白天不允许行军,只能等天黑。部队集结完毕,车又迟到了,因为车队在途中遭遇空袭,炸毁几辆。所以第50师最终没能全部上车,只运走了两个步兵团加一个炮兵团的一部分,剩余部队徒步行军。如此一来,第19集团军的形势更加困难。

K. M.:就是说,把您的老底子师调走了?

M. Ф.:调走啦。

K. M.:调走的第二个师,也是您的老底子部队吗?

M. Ф.:也是啊。

K. M.:从方面军预备队拨给您的,留下了吗?

M. Ф.:他们留下了。

K. M.:您接收的这两支预备队师也投入战斗了吗?

M. Ф.:所有的师都投入战斗,到第三、第四天每个师都参战。这个仗打得啊!极其惨烈。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斗。斯摩棱斯克战役也很激烈,但我们没经历过敌人出动如此多的坦克和航空兵。三十辆、五十辆车一波一波涌上来,从拂晓直到天黑连续进攻。还有炮击、坦克。

但好也在这里。开战头一天,战士和军官看见大量被击毁的敌军坦克,以及成片的敌人尸体倒在我们战壕前,极大鼓舞了士气——他们认识到德国人是可以被击败的。

再者,最关键的是,所有的基层军官、政工干部和司令部军官在紧要时刻始终坚守在部队。所以我不是接电话听师长们的报告,一直是军官亲自递送。我拿出地图,军官直接标明:某支部队撤到这里,某支部队现在此处,敌军在某处。我口述:不允许某某师撤出某地,签名。这就成了给师长的正式命令。不过我们也组织了环形通信勤务——除集团军指挥所的电话线之外,我还建立了环形通信以防万一,打仗的时候车在动、坦克在动,炮弹横飞,线路随时会被炸断,当然不能对这种联络方式抱太大希望。至于电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中断了。斯摩棱斯克战役的时候,包括这时候,师部电台工作状况很差。因为我们顽固认为只要电台开机就会被敌人测向锁定,迅速被摧毁。这种认识多少是对的,但并不必然如此。多数情况下尽量避免使用无线电,以免彻底失联。所以通信代表——从师部到集团军,从集团军到师部——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甚至敢说,集团军正是靠着他们才保持完整,一直坚持到10月13日最后那场有

组织战斗，未出现分裂。所有的集团军，第30集团军，如果需要，我可以用文件、作战报告和集团军司令员本人的报告来证明。第20集团军是分阶段后撤的，确实，五号还保持完整，六号已经被部分分割。

K. M. :让第16撤了吗？

M. Ф. :命令第16后撤了。

K. M. :第16的部队拨给您没有？给了一个师还是什么都没给？

M. Ф. :没给我。全拨给了第20。

K. M. :去后方了？

M. Ф. :问题在于第16集团军需要撤下两个师，我这边也要撤下两个师，叶尔沙科夫的第20集团军似乎也要撤掉两个师。这些部队应该拨给罗科索夫斯基的，在维亚济马以东。可实际只出去了第50师的两个团，幸亏他们登上卡车才赶得及。当他们经过维亚济马时，维亚济马已经被敌军占据，他们立刻转向南。此时正好出现间隙——两个团溜过去，但第三个团已经过不去了。

第166师也过不去。它已经被卷入战斗，损失掉大部分师属炮兵，辎重队全丢了。这个师的残部留在我这儿，但不是在这儿作战，转移到别的地区了。后来他们找我会合，始终没撤出。罗科索夫斯基日后告诉我，他一个师也没收到，不管是我的还是叶尔沙科夫的。它们全部跟迂回的敌人交火，都没撤下来，未发挥作用。

K. M.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您说您一开始觉得很奇怪：前脚命令学习第19集团军顽强作战，几乎紧接着又命令撤出第16集团军指挥机关。

M. Ф. :我当时也不明白。

K. M. :实际上，看来是想组建一个班子以应对被包围的局面。

M. Ф. :我接任司令员之后，根据当时的情况——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一点，但现在我认为，科涅夫可能是打算撤出完整的指挥机关，一个已经磨合成熟的班子——这有一部分是我过去带的班子，我交出第16集团军，部分人员被替换了，部分还留任，总之是个很强的指挥机关……

K. M. :马利宁⁹……

M. Ф. :马利宁是他带去的，其余都是我的人。军事委员会委员也有我的人——洛巴切夫。科涅夫撤出这些师，想组建一支六个师的强大集团军。如果他成功，那当然好极了。但很遗憾，这一切没能实现，已经太晚了。

现在很多人批评我，特别是在苏军中央俱乐部召开的关于这次战斗的会议上，他们发言指责我：“你为什么不撤？你明明看到第30集团军已经撤退，正在零散作战，方面军军委派来恢复局面的霍霍洛夫也报告说这个集团军五号当天是在被包围状态下进行零散无组织作战。当然，都那样了不可能有强大抵抗，但部队仍在战斗。叶尔沙科夫也在逐步后撤。你为什么还留在原地？”我这样回答他们：“如果我知道敌人正在包抄我，我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请问，就要逃跑？我和方面军始终保持联系，方面军司令员鼓励我，说我打得好。我没有任何理由逃跑。再说了——逃跑？！不可能从敌人身边逃掉，敌人是机械化部队，四个轮子，很快就能追上我。如果我撤离阵地进入行军状态，会被他们快速追上，被分割、击溃、消灭。所以我坚守阵地，我认为我留下来作战完全是正确的。而且当我接到要求撤退至第聂伯河防线的命令时，也不是丢盔卸甲逃，我留下了大批掩护部队。夜间后撤，早晨重新建立防线，掩护部队再接力撤到新防线，成为后卫……”

K. M. :那么您是哪天接到这个命令的？

M. Ф. :五号。从五号到六号。

K. M. :要求后撤吗？

M. Ф. :后撤，占据新阵地。但当我接近第聂伯河时，敌人已经突破第聂伯河的预备方面军防线。就是说此地不能久留，敌军已经到了东面，逼近维亚济马河。所以我下令不在此处停留，继续移动。当前锋部队通过后，我清楚意识到包围圈已经合拢。六号我还以为包围尚未完全形成，但七号早上我最终确认包围圈合拢。

K. M. :您如何确认被包围了？

M. Ф. :侦察。侦察兵向各个方向刺探，都无法通过。

这时又接到命令要求撤退到格扎特斯克设防区，向格扎特斯克¹⁰方向突围。方面军司令也清楚敌人已经包围第19集团军、第16集团军一部（没有指挥机关）和第20集团军；另外第32集团军也被围了，它原来部署在第聂伯河并隶属第19集团军；第24集团军也被包围。

9 时任第16集团军参谋长米哈伊尔·马利宁

10 今斯摩棱斯克州加加林市

K. M. :第 24 是在左翼吗?
M. Ф. :在预备方面军的左翼。

K. M. :第 32 在右翼?
M. Ф. :不是……

K. M. :预备方面军还有那些集团军?
M. Ф. :第 43。

K. M. :第 43 集团军在第 24 的左边或右边?
M. Ф. :左边。

当方面军司令意识到这些集团军已经被包围时，他下达命令，准确地说，是把全体被围部队托付给我。第 32 集团军的维什涅夫斯基将军和他的司令部一直待在我的指挥所内。我跟叶尔沙科夫之间只有无线电联络。

K. M. :科涅夫已经有权调动预备方面军的集团军了?
M. Ф. :看来当时已经有了，所以他能够把第 32 集团军划归我指挥。

K. M. :以及第 24。
M. Ф. :以及第 24。

K. M. :您和他们没有联络吗?
M. Ф. :没有。他们撤退了，后来我得知司令员拉库京牺牲。他们快速撤退了。

K. M. :我查不出详情，找不到线索，不知道拉库京是在什么地方怎样被杀的。
M. Ф. :没人知道。



(第 24 集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拉库京少将起初被认为“失踪”，1946 年宣布“阵亡”。1996 年发现其遗骸，查明系 1941. 10. 07 突围时在瑟姆廖沃村附近牺牲，匆忙掩埋在弹坑内。)

K. M. :所有人都撤出来了。军委委员出来了，政治部主任出来了，参谋长也出来了……
M. Ф. :特别处处长被俘，后来他逃出战俘营。

K. M. :他还活着吗?
M. Ф. :不知道。我和他一起被俘的——第 24 集团军特别处处长。那时只能联络上叶尔沙科夫……我没有任何机动的余地。所以没有试图集结部队，而是在宽阔战线使用三个纵队、三个集团进攻突围。但没有一个集团能突出去。这时我终于确信自己陷入了困难境地。我请求空中支援、炮弹支援。

K. M. :炮弹不够了吗?
M. Ф. :对啊……

K. M. :储备几个弹药基数?
M. Ф. :两个弹药基数。

K. M. :开始的时候您有哪些炮兵部队？

M. Ф. :我原来的炮兵还挺不错的。有近卫第10迫击炮团、第509和第874反坦克炮团、第311加农炮团、第29军的炮兵团、第399榴弹炮团、第302榴弹炮团的第44炮兵营、第57和第8榴弹炮团、第7和第8高炮独立营。但这些也不够，因为无法对抗飞机——实属无奈。

K. M. :高射炮不够吗？

M. Ф. :全集团军只有两个高炮营，我甚至无法掩护主攻方向的部队。我还有第111摩托化工兵营、第233和第302……独立工兵营，第45骑兵团。

K. M. :炮兵够用？

M. Ф. :炮兵的大炮够用，炮弹不够用，问题就在这儿。

K. M. :怎么第一天就没有后勤补给啦！什么也没运来？

M. Ф. :我告诉您怎么回事。开打之前我命令把基础弹药基数集中存放部队，这个决定帮助我守住主要防线。同时我还派车去方面军补给仓库领取物资，那时我还有一些卡车，他们又运回两个弹药基数。这样我就有两个基础弹药基数，又补充两个。但我的卡车被抽调运送第50师，我就没办法拉补给了。

K. M. :卡车再也没回来。

M. Ф. :卡车再没还给我。我就像失去双手一样，感觉特别懊丧。这个时候，六号、七号，道路都被封锁，所以我没炮弹了。

K. M. :弹药输送断了。

M. Ф. :对，弹药输送停止了。

【录音缺失】

我们在乌克兰军区接受过各种作战方式的训练。学会了在撤退时设路障、布雷区和制造障碍，放置不易察觉的障碍，沿路埋地雷，在地雷上连接一些东西，一碰就炸。还学了拦河坝。有的小河看似水少，但您只要筑起一道坝，它就会泛滥开来使整片地区无法通行。不是因为水深，而是地面变得黏滑松软。所有指挥员都受过这方面出色的训练。而我非常遗憾地想起，那些三七年之后成长起来、被提拔到高位指挥员，他们没受过这种训练。

我们之前谈过巴甫洛夫和基尔波诺斯，对吧？

K. M. :没，稍微提了一下。

M. 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任命他俩。也太不称职了，匪夷所思。咱们都知道基尔波诺斯，也都知道巴甫洛夫，但是把西班牙的经验直接照搬到我们这儿来？根本两回事嘛。他¹¹回来之后，被任命为莫斯科的装甲兵司令¹²，向斯大林论证说不需要坦克军。我们原本拥有强大的坦克军、机械化军¹³。我们那个军是驻守日本边境的，在满洲，没有被解散。你想想，一千三百辆战车，多么强大！两个坦克师，一个机械化师。第57坦克师有三百辆作战坦克，两个坦克团，一个机械化团。如果给这些军配属歼击机和轰炸机，即便只给歼击机掩护，他们就能大显身手。但他们白白牺牲掉了，就因为没有空中掩护。敌机轰炸他们，他们无力自保。所以当我终于看清局势，知道自己被包围，我就联络叶尔沙科夫。我说：“叶尔沙科夫同志”——我们互相叫名字，我现在忘了他的父称——“费奥多尔，你打算怎么办？”他说应当突围。我告诉我打算从维亚济马以北突围。

我手下还有第32集团军，但只剩两个师，另两个师离开了。其中一个被布琼尼召回，另一个被敌军左翼迂回攻击打散了。只能依靠第32集团军的两个师从维亚济马以北突围。

我召集全体师长和政委，对他们说明我们身处的严峻形势，告诉他们只有在战斗中顽强、坚定、大胆行动的人才能成功突围，务必牢记口号“牺牲自己，拯救同志”。

我想强调，我说的这些话后来没有一个师长真正执行。

众人分散，开始突围。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屡屡失败。十号那天朱可夫发来电报询问（那时科涅夫已经走了，朱可夫指挥），哪个地点、什么时间需要轰炸，他承诺提供空中支援。我把情况通报给他。

然而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的，甚至我亲自和他见面的时候，他都说未收到我的电报：“我以为你们完蛋了”。但我认为司令部肯定收到了，因为莫斯科收到了（我之后会谈这通电报），那为什么他没收到呢？毕竟我这边始终保持联系。大概是他已经顾不上我们，因为莫斯科的情况极端严峻！没有部队，空荡荡的田野，只有波多利斯克的两个军校在那儿¹⁴，他们能做什么？顶多在某个地点拖延敌人几小时、一天、两天。他们只能守住一个不宽的正面，敌人可以绕过他们。

11 德米特里·巴甫洛夫

12 红军装甲车总局局长

13 1939年附议解散坦克军的还有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谢苗·铁木辛哥、格里戈利·库利克等人。此中不便明言的原因之一是，坦克军原系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倡导组建

14 波多利斯克步兵学校和波多利斯克炮兵学校，进行了殊死抵抗。

我的电报没收到答复。十一号我再次召集全体师长和政委，说炮弹不多了，子弹所剩无几，口粮已中断多日，我们从老百姓家找点东西吃。但那个时候又能从老百姓家弄到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土豆吃光了，卷心菜也吃光了，还能收集什么？只好开始杀战马。我们马匹多，杀肉吃吧。根本进不去任何一个帐篷，也进不去村子任何一间房，全部住满伤员。没有绷带，没有药品。伤员们呻吟喊叫：“打死我们吧，你们这是干什么？别折磨人啦，你们也看见我们活不成啦”。您知道吗，心都碎了。感情受不了。

К. М.: 没有药品吗？

М. Ф.: 没了，都用光了，什么都没有。撕下衬衣，用农民家找到的什么布料，快速洗一洗就包扎伤口。污染、传染很严重。那场面太可怕，根本无法直视人们承受的痛苦。但大家都在坚持战斗，人人都在战斗。当时许多人申请入党，都在喊：“莫斯科在我们身后，莫斯科绝不能失守”的口号，报纸、传单持续印刷，政工干部也在忙碌。全军上下热火朝天。莫斯科在我身后，必须保卫莫斯科。红军士兵们都这样讲：“莫斯科不能丢”，我们知道莫斯科一旦被占领，后果非常严重，将造成精神上、政治上的冲击。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明摆着就是苏维埃政权存亡的问题。所以我千方百计努力突围，倘若突围不成，起码要拖住尽可能多的敌人。

К. М.: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抱歉打断。您说这些天的突围尝试都失败了，但有没有某些进展呢？

М. Ф.: 没有。

К. М.: 你们身陷包围，敌人挤压你们了吗？

М. Ф.: 他们没有收紧包围。我明白他们的战术——他们察觉到我们在垂死挣扎，知道我军的炮弹今天、明天就会打光，他们又何必耗费兵力来进攻呢？他们的想法是：让我们去攻他们，他们以逸待劳。这是他们的正确战术，保存自己的兵力和装备……

К. М.: 他们可以等，您不能等。

М. Ф.: 我不能。他们知道我的炮弹今天不打光明天也要打光。所以我尽力在宽阔战线上拖住他们，尽可能多吸引他们的兵力。

尤其他们的坦克师长：丰克，他这个师头一个开进华沙、头一个开进巴黎，按照他们的计划也应该头一个开进莫斯科，他们有几套作战方案：占领、不占领、包围、歼灭等等。丰克收到一通电报，我这边也监听到了——他们已经开始拍发明文电报，内容是：“你们磨蹭什么？进攻莫斯科！”他答复：“我快顶不住了。第19集团军的司令也在猛冲莫斯科，我快顶不住了。我派了我的掷弹兵，最后的兵力都上了，无法再抵挡”。

我意识到此时我必须突围，但没有炮弹。于是十二号我最后一次召集全体指挥员，把剩余的炮弹集中运来，命令“喀秋莎”准备最后关头齐射。我指定了第2步兵师，这是莫斯科民兵部队¹⁵，编制很强，几乎没怎么参战，损失小，师长瓦什柯维奇少将很有能力。再加上第91西伯利亚师，共同突围。

瓦什柯维奇还有八百人的水兵队，都是船员。

К. М.: 是来加强民兵的吗？

М. Ф.: 是的。

我电告方面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和斯大林：某日某时我已集中全部炮兵的炮弹，准备喀秋莎最后一轮齐射，将在某一地段——博戈罗季茨科耶，向格扎茨克方向突围。你们曾允诺提供的炮弹和空中支援我未收到。我打算执行以上计划，如果未能突围，将向叶尔沙科夫方向撤退，从那里再行突围。

我寄予厚望的那位师长瓦什科维奇（现在他是上将了）与我争论：“我无法这么仓促投入战斗；一个师不是团也不是营，不能说打就打”。我说：“瓦什科维奇，你要知道明天我们就没炮弹了，敌人会把我们打垮；如果我们今晚不突围，明天全完蛋，我们将没有可以开火的武器。你明白这一点吗？各师师长的汇报你也听见了——没弹药，没口粮，把老百姓的东西吃光了，伤员哀嚎着叫人一枪打死他们。我们还能继续忍受下去吗？不能。必须突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还有第91师的师长，西伯利亚兵”。

我可以念一念他怎样描述这件事的，他在自己书里写得很准确。

我对他说：“讨论结束，再见”——我俩握手——“去突围吧”。诚然，这样安排不够周密。应该给每位指挥员分配任务、明确方向，布置炮兵。一切都匆匆忙忙进行，因为我清楚，明天我将被彻底击溃、无法突围。

开始突围了。刚到傍晚，还有光线。必须等天黑再行动，使敌人看不清我方人员在哪儿集结。我给两个师大致指定了突围方向，约六、七千米宽。进行炮火准备，打了一轮喀秋莎。我选定的地点相当湿滑，坦克无法通过；我知道我们面前就是第7装甲师，坦克在这种地形无法机动。我们发射喀秋莎，部队紧接着冲上去，突破敌军防线。

91师师长跑来报告：“将军同志，快撤出军部，突破口打开了，部队正在突围”。下到民兵第2师的参谋军官们也来报告：第2师已突围，炮兵正在动。

15 即莫斯科市斯大林区民兵第2师

我立刻将情况通知方面军司令部，说炮兵已投入突围，其它师正在跟进。我对91师师长沃尔科夫说：“我现在不能走，还有八个师呢。必须等大部队、至少半数部队通过之后我才能走。我现在怎么能离开？中途出了意外怎么办？不行，我不走。你带你的师突围，掩护侧翼……”

K. M. : 沃尔科夫是91师师长？

M. Ф. : 91师的。他是一位会打仗的师长。后来发生不幸，他被俘了，在德国人那边投靠弗拉索夫军。据科涅夫跟我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再上前线，率部回归我军。他也确实如此，带领自己部队整体投诚。之后又在科涅夫手下重新做师长，直到战争结束。至于他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他后来被逮捕，大概没放出来。

K. M. : 但他战斗到了战争结束？

M. Ф. : 是的。



(伊万·沃尔科夫回归苏联，接受一年的(1944.5-1945.3)审查甄别，之后担任第9空降师师长，并因1941年在斯摩棱斯克的战斗表现荣获红旗勋章。1946年转入预备役，1947年被逮捕、定罪、剥夺军衔。1956年释放出狱、平反恢复名誉。)

K. M. : 沃尔科夫？

M. Ф. : 对，沃尔科夫，跟着科涅夫。

我们突围了，前进。沃尔科夫从我这儿回去的时候，敌人把他通过的地段封锁了。等我和军委委员一起赶去察看进展，看看其他师是否通过这个突破口，这边已经被封死。

为什么撕开的口子又被封死？当时我不知道，还以为敌人调来新部队填堵。之后我才得知，原来第91师和第2师突围撤出，不仅未扩大突破口，突破口两翼也没守住。

K. M. : 沃尔科夫带他的师突围出去了吗？

M. Ф. : 他的师出去了，他本人没出去。他来找我汇报，通知我可以动身，就在此时敌人重新封锁了通道。当我得知这个情况，怒不可遏，简直失控了。怎么会这样，老子拼尽全力突围。哪怕撤不出所有人，至少带出去部分主力师也好，就算没有后勤，去他妈后勤吧，反正要把主力带出去。但我最终没成功，仅仅因为他们先撤了。我读到他(瓦什科维奇)在书中写道：“我抵达佩斯科沃村，走了18千米，在那儿整整等候一天，等着集团军的其他部队过来”——等着，混账东西！在那儿睡觉等着！当然，我的任何一个师都没能走到那儿。他把自己的师弄得四分五裂，一个人跑去加里宁方面军¹⁶。

K. M. : 怎么叫四分五裂？

M. Ф. : 敌人从四面八方追击，把他的部队打散了¹⁷。区区一个师能做什么？敌人那么大的集群——28个师——齐齐朝莫斯科猛扑。他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

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我已经报告过方面军司令，表示我将向叶尔沙科夫方向突围。我又一次召集全体师长和政委，说：“事儿没办成，现在就靠老天保佑向叶尔沙科夫突围吧。”

K. M. : 德军已经到了你和叶尔沙科夫之间吗？

M. Ф. : 是的，有德军。问题在于我失去与叶尔沙科夫的联系。第20集团军通信副处长库尔采维奇说八号那天第20军集团司令部已经不复存在，所有人被打散，个别部队仍在作战。我自己也确认他们九号还在战斗，但叶尔沙科夫找不着了。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是八号，他告诉我：“正在进攻，准备南边突围”，指出了将要突围的几个地点，又说：“敌军摩托化部队强大，参谋长科尔涅耶夫将军重伤。若不能突围，则分组撤出”。

K. M. : 科尔涅耶夫出来没有？

M. Ф. : 科尔涅耶夫没走出来，抬出来的。他那边组织的很好，把他抬出来了。

¹⁶ 1941.11.6改任第5步兵师师长

¹⁷ 瓦什科维奇的民兵第2师伤亡殆尽，国防人民委员会1941.12.27命令其解散并取消番号。

K. M. :叶尔沙科夫呢？

M. Ф. :叶尔沙科夫被俘。军委委员也被俘了。

当我召集全体师长和政委的时候，您知道，我无言以对——说点什么呢？我感到他们望着我，期待我创造奇迹。可您也明白，奇迹是没有的。我喉咙哽咽，该对他们说什么？我能给他们什么？之后我镇定情绪，说：“同志们，局势尚未绝望。我认为如果从维亚济马以南方向突围，向第20集团军的方向前进，你们会发现敌军主要兵力集中到了东面战线。敌人知道我快不行了，正在狭小地段挣扎，他们完全明白，跟我们自己一样明白。我们一定能在这里突围，一定能撤到第20集团军”。我还提前警告：“我们已经见过早先突出包围圈的部队是什么样子，他们撕下领章，换穿便衣。我坚决禁止你们这么做！要约束自己，纪律至上。这是保证你们带领部队冲出去的关键”。

大家当然都答应。于是开始突围。我们成功了，撤到第20集团军的防区，从维亚济马以南、西南方向渡河。一路上发生了不少意外。

我还没告诉您，当初我们以三个大集团沿宽阔战线推进的时候——那会儿在洛梅镇附近，就像咱俩现在这样，这边是我指挥所，那边房子附近有一条大路，我们眼睁睁看着敌人坦克、摩托车、装甲车、运步兵的卡车鱼贯驶过。

我感觉自己正在和部队失去联系，于是赶快召集司令部军官，说：“我们眼下不能溜出去，必须立刻返回部队”

这天是六号，我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包围，亲眼所见。

我们抓了敌人一个摩托车兵。他不知怎么掉队，被我们逮住。问他是哪支部队，情况怎样——他全说了，告诉我们包围圈已经形成，还说接到报告，南面来的第3装甲集团军，霍特与赫普纳已经会师。

军委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再也没来找过我。

K. M. :您从此再没见过他们？

M. Ф. :再没见，他们牺牲了。和他们一起出发的军官和红军战士在勘察地形的时候遭遇一伙敌军，发生战斗。战斗中军委委员被当场打死，政治部主任负伤坚持战斗，他边撤边指挥，后来……

K. M. :后来下落不明。

M. Ф. :对，后来如何就不知道了。这样军事委员会还剩下一位，也是个好同志，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前书记瓦涅耶夫。他精力充沛，是个优秀共产党员。

K. M. :第一位是谁？

M. Ф. :伊万·普罗科菲耶维奇……姓什么忘了¹⁸。

K. M. :以后查一查吧。他是干部？

M. Ф. :是干部。跟着科涅夫来的，是个好小伙子，挺年轻，爱笑。我从战俘营回国后联系他的家人，他两个女儿是工程师，在古比雪夫工作。他妻子听说丈夫失踪，精神失常了。

K. M. :维什涅夫斯基¹⁹跟您一起吗？

M. Ф. :他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

K. M. :他有职务？副官？

M. Ф. :就是帮忙的……

K. M. :情况很微妙啊……

M. Ф. :是，确实很微妙。八号他把部队完全移交给我。我有一架飞机。他说：“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我要飞过去汇报这边的情况”。我说：“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情况他们早知道了，不需要我们再汇报。你留下来帮忙吧，你也看见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你去那边帮不上，在这儿帮忙吧……”

K. M. :参谋长不在吗？

M. Ф. :在的，整个军部都在。我对他说“你来帮忙吧”，他也同意了。其实他是个好人，我对他后来被俘负有很大责任——他本可以飞走的。为了使人免于这种诱惑，一旦确定包围圈被封死，我把飞机送走了。我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派人送去方面军司令部，就是为了杜绝诱惑。我是这样想的：好吧，就算我本人能出去——“您好”，“您好，您的集团军在哪？”“部队留在原地，快不行了”。“您有什么权力抛弃部队？”——所以为了不让自己退缩，我把飞机送走。

K. M. :维什涅夫斯基同意不飞走，对吧？

M. Ф. :他同意不走。他是个正派人，看得出情况艰难，并没坚持要走，这一点必须讲清楚。

18 伊万·普罗科菲耶维奇·谢克拉诺夫，1902-1941. 10. 19

19 谢尔盖·维什涅夫斯基，曾任预备役方面军第32集团军司令，兵败后被委派接替第19集团军司令，但无法抵达上任，冻伤被俘，1945年获救。

K. M. :虽然,总的说来,他也有一定的理由,毕竟他把部队移交了……不过他究竟移交了什么呢?

M. Ф. :两个师。而且其中一个已经撤走。

我们就这样出来了。当时正在过一条河,聚集很多人。忽然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往维亚济马开去。有人放枪打他,一阵射击,子弹乱飞。我心想,要误伤自己人了,大喊:“停!停止射击!”

这时候博尔丁特遣队也赶到我身边。我还没提过博尔丁特遣队。我知道他在我北边某处,心想:去找找,看看什么情况。我跑了整宿,四处找,终于在一个村子找到他。他和参谋长坐在一间小屋内。我问: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你这边什么情况?”他说:“我正想去找你呢。你什么情况?”我说:“没几个人了,只剩152师的残部、140师的残部,零零碎碎”。152师是我的老部队,在斯摩棱斯克打过仗,乌拉尔工人组成的外贝加尔部队,很好的一个师。当时那个师长很优秀,姓切尔内绍夫,去年春天去世了。我说:“那就走吧”,他就来了,这就是所谓博尔丁特遣队……

K. M. :这支部队原计划是要扭转局面的……

M. Ф. :是的,但什么也没做成。他来了之后说:“至少给我点什么吧”。我就给他两个师。毕竟他得有指挥权,不能挂个虚职无所事事。说实话,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博尔丁是很好的人,但意志薄弱。作为指挥员很优秀,知识渊博,可是无主见。或者他已经被打得失去斗志了,反正给我的印象是这样。不过他为人确实好,很优秀。我给他两个师,编入他的特遣队。后来就叫博尔丁特遣队,两个师。他出席了每一次军事会议,和指挥员们在我身边。但他没能突围成功²⁰。

正说话呢,听见外面枪声大作。我骑了一匹马,马跑了,再一看,通信员也不见了,鬼知道跑哪儿去了。子弹噗嘶、噗嘶、噗嘶。我心想:“混蛋,要把我打死了!”

K. M. :是咱们自己人开枪吗?

M. Ф. :是的。我决定涉水过河。河大概十五米宽,本以为水浅,没想到该死的维亚济马河那么深。我一时糊涂把自己的军常服、毛绒内衣、军大衣都穿上,外面套一件德国飞行服。这件飞行服很棒,是飞行员从一个跳伞的人身上扒下来送给我的。我穿上飞行服,皮带扎紧,就这么一身跳进河里,全湿透了。对岸已经被敌人占据,我们这边一慌乱,他们就猛打机枪和迫击炮。

我对军委委员瓦涅耶夫说:“你带一队坦克兵去”。那些坦克兵人挺多,约两千人,组织的比较整齐,有战斗力、守纪律。我说:“你从左侧绕,我带第二队从右侧绕”。我这边也有大概三千人左右。我们从两侧夹击敌人,抓住了。那是一小股德军,几个机枪手、几个迫击炮手,人不多。然后我们继续前进,沿途的情景令人痛心。遍地的机枪都被破坏,还有的枪被卸了枪栓,扔到远处,免得捡起来用。

K. M. :是德军干的?

M. Ф. :是德国人干的——缴了我军俘虏的枪,统统砸坏,一排排扔在地上。几乎每走一步都能看见。我对瓦涅耶夫说:“情况不妙啊,第20集团军一点动静没有,我没听见打仗的声音。而且,你都看见了吧?”他说:“是,情况非常糟糕”。

我们怎么也找不到第20集团军,它已经不在这儿。我们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总有敌人的小型哨卡。来到一片树林,见一个哨兵站在高地。他说:“把这个哨兵干掉!”我说:“不行,千万别开枪。我们全身湿透,已经不是正规部队,是散兵游勇,衣服不干,天冷下雪。不能开枪,应该绕过去”。

突然一声枪响,哨兵没打死。机枪和迫击炮开火,大家慌了开始乱跑。

这时候我的胳膊被打伤。身边没人,我单手脱不下衣服,只感觉往外流血。我到现在差不多一星期没怎么睡觉,断断续续打个盹,所以我这会儿只想喝水、睡觉。两个女卫生员跑来问我:“将军同志您怎么了?您受伤了吗?”我说:“快帮我脱衣服!”她俩说:“我们没有包扎用品,所有的绷带都用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说:“帮我脱衣服,撕我的衬衣包扎,先止血再说”。她俩就帮我脱衣服,用撕下的布条扎紧手臂,接着又帮我穿好衣服,我感觉好些了。我说:“拽我一把”。两个小姑娘搀着我走,俩人十六七岁,最多十八,太年轻了。我身子沉重,失血多,走不动,几乎要摔倒……

K. M. :手掌受伤吗?

M. Ф. :不,是这儿。两条神经打断了:尺神经和正中神经。

我说:“你们的雨衣帐篷,把它铺开,我躺上去用左手抓紧,你俩拽我走”。果然轻松多了。下过雪,她俩在雪地拽我不费力,就这样把我拽进一条小山沟。这时一枚地雷爆炸,我的腿受伤,皮外伤。

我的后勤主任安德烈耶夫将军跑来,他是个很能干的将军。我早在西伯利亚就认识他,当时他是第133师师长²¹,后来我做参谋长、军副司令,他在西伯利亚指挥一个军,所以我俩很熟。他们搀扶着我,刚走出山沟上到坡头,第二枚地雷爆炸,我又被炸伤,同一条腿。

我们继续走,走了好几天。

K. M. :人很少了吗?

M. Ф. :已经没剩几个人。情况是这样:有时候凑起来一千多人,准备往某处走,只要机枪一响,立刻四散奔逃,最后所剩无几。

20 西部方面军副司令博尔丁两次兵败被围,两次血战突围,1941.11.05 负伤。

21 卢金的记忆似有误,133 步兵师 1939 年 9 月组建,并无姓安德烈耶夫的师长。

我已经走不动了。我对博尔丁说：“安排几个军官搀着我，否则我就掉队了，我受伤了跟不上你们”。他给我派了人。但在第一个休息点这些人走散，我又不认识他们。

K. M. :没有自己人了？

M. Ф. :没有自己人了。我的副官是个很不错的副官，我派他去转移我的家人，因为我感觉莫斯科情况不好，从二十二号开始一直被轰炸。我知道会有一场恶战，莫斯科肯定会被炸，想着至少把家人送出去。后来果然如此。没人关心他们，大家都往外撤，将军的家人也没人管。他们确实被转移了，但副官没法回到我身边来。要是副官们还在，我的处境肯定截然不同。我从外贝加尔带出来的副官都是好样的。

K. M. :您把两个副官都送走了？

M. Ф. :第二个还年轻，我送走了，他也是好小伙。如果他们在，我或许是另一种命运。我们一路走着，来到一片小树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过来说：“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大家都湿透了、冻僵了，大衣像棍子。天气这个样，又下雪，得把衣服烘干啊”。

K. M. :这些是同一天的事吗？

M. Ф. :不，已经过去几天了。我们在森林穿行，想走出去。我们朝布良斯克方向走，想绕个弯从森林突围。没东西吃，快冻死了。如果派人进村，处处都有德军。虽然是后方部队，但毕竟是德国人。

K. M. :你们这时候没有武器了吧？

M. Ф. :对啊，我感觉已经不是一支军队了。他说：“得升火”，于是就点了火。我跟他讲，外面立刻会发现森林冒烟。这时候我们的人不算少。我说：“敌人知道林子里有人，一定会来搜索”。果然如此。点燃篝火，两个便衣走过来，问：“这儿谁是首长？”我说是我。他们说：“我们是第24集团军特别处的。24集团军特别处处长莫任重伤”。我就去找他，这个人我早在西伯利亚军区已经认识。他躺在那儿，身边有几个伤员，他的特别处人员也在。他说：“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别走了，就待在这个地窝子。我已派了可靠的人，会有飞机来接。我保证，飞机一定会来的”。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请我们吃东西，他那儿有香肠之类。

K. M. :他不能动吗？

M. Ф. :他伤得很重。其他人还好，另一个特别处的也重伤。至于我，两个姑娘给我包扎的时候，我的手枪掉了，没找到，只能空着手。

我们打个盹。那两位被指派照顾我的副官忽然跑来喊：“同志们快出来，有德国人”。我帮莫任穿衣服——他双腿负伤，我一只手不能动，德军已经到了，大喊：“Halt!”我说：“赶紧出去，他们会先扔手榴弹，不会直接进来，扔手榴弹我们就完了”。

躺在旁边的那个特别处人员，伤重走不动，也说：“快出去吧，不然扔手榴弹了”。我们走出去，见德军站在外头。我们举起双手。我对这几个人——其中还有个女打字员或什么女兵——说：“告诉大家，谁也不许说他是特别处负责的，就说他是军需员”。因为他的领章不明显，只是一个菱形。大家都照做，没人说出他是特别处的头头。

他们当场搜身，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抢了我的银烟盒，摘了我的手表。我说：“你拿我手表干什么？”想夺回来，他一把又拽走。他查看我的证件：“将军！将军！”德国人呼啦围拢——抓住将军了。一个军士长走来把小兵推开，对我说几句话。我的德语很差劲。莫任已经被带走了，特别处的所有人都带走了，一部分军官也跟着走了。只剩我和几个指挥员。

这时候我军撤退的一队人正巧赶到，向德军开火，人人转身往那边看。我见他们都转过去，拔腿往反方向猛跑。偏偏反方向也有一队德军，冲锋枪“哒哒哒”，我那条伤腿的膝盖被打中，昏倒失去意识。

我醒来的时候——现在知道是谢姆廖沃²²的学校。我苏醒，睁开眼，一下子不明白自己在哪儿。再一看，周围很多伤员，全想起来了。心头一紧：部队完了，我被俘了。这时门推开，“Achtung!”，进来三个军官，两个上校和一个中校，上校走到我床前，用标准的俄语对我说：“你们的俘虏说您是第19集团军司令。您能证明吗？”我说，我不知道我的证件在哪儿。一个士官从床底拖出我的军服，血迹斑斑。他们掏出我的个人证件，他又问：“这儿写的第16集团军司令员，怎么回事？”我说：“当过第16军的，当过第20的，现在第19”。中校插话：“我们在斯摩棱斯克就等着将军阁下，但您当时从我们两个包围圈溜走了”。我不说话，没理他。他们掏出我的党员证，看一眼，说：“哦，老党员。这玩意儿您现在不需要了”——扔进炉子——“这个身份证明您还用得着，去德国的时候拿上吧。我们知道您身边还有五位将军，把他们的路线和去向告诉我”。我不说话。

之后他开始询问哪些师突围出去、有多少人、有哪些预备队等等。我对他说：“上校先生，如果您处在您的位置，会把一切讲出来背叛自己祖国吗？”他说：“不会”。“那您还问我这些？我不会再告诉您什么了。我个人的事您请问，其他的我不讲”。

前年我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干部局库佐夫科夫中将来找我，拿一张照片给我看：“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认识吗？”我说：“不，不认识”。我妻子瞧一眼，说：“这不就是你嘛”。我真没认出来。照片上我胳膊这么放着，可以看到一枚勋章，穿军常服躺着。上下铺的床。我看了看，好像真是我哎。还有一封信，是那家医院的牙科医生写的，就是给我动手术的、德国军官来找我谈话的那家医院。

这位牙科医生翻阅战争年代老照片，偶然看见我的照片，说：“哦，将军！我记得这位将军”。他描述了我与那些（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谈话。他说：“这位将军大概已经死了，他伤得非常重，很难活下来，兴许有家人在后方”。于是他把这张照片和情况说明寄给我们的驻德国集团军，那边转交我们总参谋部，最后到我手上。我可以拿那张纸给你看，写了整个经过。

去年我去德国讲起这件事。他们找到那位医生，他写了一封德文的信，表示这位将军非常勇敢……“我曾狂热纳粹分子，死心塌地追随希特勒。但在激烈的战争中，我遇见一位俄罗斯将军，他如此勇敢地忍受伤痛，德国军官打听军事机密，他又如此大胆答复……这让我意识到，对付他们没那么容易”。后来又发生一些事，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或许他粉饰美化过了，但他就是用这样口吻写的。事后某篇文章刊登了与他的谈话。

当我那样回答他们之后，他们向我行礼，说我们不会继续为难您，走了。他们之间用德语交谈，那位医生信中透露他们说：“我们尊重这位将军的立场”。

那时我不知道自己腿没有了。我知道很疼，知道自己腿受伤，但不知道腿没了。等他们全部离去，医生掀开毯子，我一看，腿没了。我瞬间把绷带扯下来。好嘛，部队没了，自己成了俘虏，腿没了，手也不能动，心想：“这他妈算什么！”我知道德军的俘虏什么待遇，我们早听说过。老子不活了。他立刻把我送回包扎台，重新绑一遍。起初给我安排一个我们这边的卫生员，我第二次扯下绷带……德国人会从我们的医生或懂德语的战士、下级军官里头挑人做卫生员——照料自己的伤兵、干些脏活儿。所以他们给我安排一个会德语的同志。之后他们又换了个士官照顾我。

我忽然发高烧，全身滚烫。现在我知道是出现幻觉，我觉得自己能听懂德语，身边躺的德国伤兵说的话字字句句能听懂。

K. M. :那些是德国伤兵？

M. Ф. :是德国人。我们的人一个没有，就我自己。我听到他们说话，说打算杀我。我扯下绷带说：“叫医生来”。来了个士官，说医生住在村子尽头，天气不好，他很疲惫，暂时来不了。我又扯绷带……

K. M. :叫医生也是幻觉吗？您是真的叫了还是以为叫了？

M. Ф. :我确实叫了医生，但我以为他们在用德语商量杀我。医生终究来了，劝我：“他们怎么杀你？他们跟你一样也是伤员，不能动弹”。我仍不相信。于是他们把我从大病房抬到警卫室，就是那个士官的房间，让我住那儿。医生跟我交谈很久，说实话我都有点同情他了。我知道他们从早到晚做手术，伤兵源源不断，天天激战，这是个包扎队。我感觉他是好人，他也确实是好人。他每次做完手术一定过来陪我闲聊。

K. M. :通过翻译交流吗？还是他会说俄语？

M. Ф. :不，他一句俄语不会，通过我们的卫生员翻译。他告诉我：“我不是纳粹，我是大夫，而您对我来说是受伤的将军俘虏。我会尽一切努力让您活着。”

他给我看了自家孩子的照片，告诉我和平年代他在哪儿工作。原来是柏林一家外科医院的总医师。那个士官是奥地利人，维也纳市法院的书记员。他会俄语，虽然说得不好，但能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被我们俘虏过。他跟我说：“将军，您要相信这位医生，他会尽一切办法救您。我也会尽力让您在包扎队住的轻松些，因为我当年受伤被俘，是俄罗斯人救了我的命。我忘了医生姓什么，但我感谢俄罗斯人救我”。

第二个医生是混蛋。如果总医师不在或忙不过来，需要给我换药，他们把我放上担架抬着走。我那时候不能碰，一碰就疼得大叫，因为神经暴露在外。士官听说，告诉总医师，他亲自来，两手抱我去包扎台。他是唯一有人性的人。我遇到的其他人，那些所谓医生，都是禽兽不是人。

K. M. :您找到他没？

M. Ф. :找到了。

K. M. :此人活着吗？

M. Ф. :三年前还活着。我在民主德国的时候请德国同志协助寻找，他们找到了。这个人说：“事情我都记得”，证实了所说的一切，但请求德国同志把这事忘记，不要写，不要提姓氏，看在上帝的面上什么都别写，因为——“你们知道现在的形势，我不想晚年再出点什么事”。

K. M. :他在民主德国还是联邦德国？

M. Ф. :在民主德国。

K. M. :也是在那儿找到的？

M. Ф. :对。

K. M. :他住柏林？

M. Ф. :住在柏林。

第三次采访

M. Φ.: 我在这个流动军医院一直躺到他们向东推进。开来一辆救护车，车内躺着三个德国军官。他们抬我上车，那些军官听说要和俄罗斯将军一起走，叫嚷：“Weg, russischer General! Weg!”——意思是不愿意跟我一辆车。那位善待我的医生来了，告诉我：“看样子您得坐货车走”。您知道那个路况……

K. M.: 救护车是四床位的吗？

M. Φ.: 对，四个床位，上下两层。

K. M.: 是在谢姆廖沃吗？

M. Φ.: 在谢姆廖沃。他们大概是跟随部队移动。

抬我上货车。士兵们把各种东西扔进来，一路开到车站，活像一场噩梦。我咬紧牙关忍耐。接着让我上卧铺车厢，还有别的德国伤兵。到了维亚济马。

K. M.: 在这个医院住了多久？

M. Φ.: 不好说。

K. M.: 一星期？

M. Φ.: 更久，大概两星期。

火车开到维亚济马，德国伤兵都被抬走，车门上锁，留我一个人在车厢。您能想象我的心情吗？被抛弃了。寒气袭来，我心想：“如果出现歹徒、罪犯，我就完了，根本没人知道”。不晓得过了多久，感觉很长时间，车门终于打开：“将军！”“我在！”说了几句话，把我抬上担架，装上救护车。

K. M.: 这就上救护车了？

M. Φ.: 是啊，抬上救护车。您想，我一条腿没了，另一只脚没穿靴子，当时累坏了，靴子一直拿在手上。一个兵对我说：“将军”，指指我的靴子念叨什么。我说：“Gut, gut”。他意思大概是“你还要靴子干什么？”——把靴子拿走了。我心想：“去他娘的，反正无所谓了”。

他们送我进医院。又到了维亚济马，一个宽阔大厅——我不知道什么建筑——躺着约莫五十个伤员，可能还不止。我瞅见几个俄罗斯姑娘在那儿，叫来一个询问：“俄罗斯人吗？”她说：“是的”。她叫索尼娅·安娃涅尔，1956年或1957年，她到苏联参战老将士委员会办事，我一眼认出她。那是1941年过后十六年，但我一下子认出来。她是犹太人，东欧犹太人长相。我说：“索尼娅·安娃涅尔？”她说：“是”。“你不认识我了？”“不认识”。我把这段往事告诉她。

我叫她过来说：“请问问医生，能不能给我开安眠药。我已经几宿没睡觉了，很晒，疼得睡不着”。医生正巧在查房，骂她一通，没给药。等检查完每个伤员，他走过来看我。我对他说：“Tabletten einschlafen”²³，他吩咐给我安眠药。

第二天伤口又该换药。抬我去换药的时候，看见包扎室有个女医生好眼熟。在哪见过来着？啊哟！我指挥第20集团军的时候，在某个师长那儿见过……忘了哪个师，算是他的军中情妇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个漂亮女人。我看她在这儿工作，询问索尼娅·安娃涅尔：“她怎么会在手术室？”她说：“我以后再告诉您这个女人是谁”。漂亮、有魅力的女人。她说：“臭娘们儿，对我们特别不好”。安娃涅尔告诉我，被当作卫生员使唤的我国医生住在什么地方。旁边有一座砖厂的建筑，没完全修好：无门无窗、无地板，用铁丝网围一圈，把人赶进去。伤员喊叫，不是要吃的，实在渴急了要水喝。一旦叫喊声音大了或让人心烦了，德军就往窗户或门洞扔手榴弹。她说那里面发生的事情无法想象。

K. M.: 这是我们留下的医院吗？

M. Φ.: 不是医院。抓了我们的伤员，送到这儿集中安置。

K. M.: 有什么医疗救助？

M. Φ.: 丝毫没有。

K. M.: 我们的医生不准进去吗？

M. Φ.: 一个不准进。伤员就躺在那儿。我说：“里头究竟成什么样了？”她说：“您无法想象。更糟糕的是里面有女人，关在一起”。

第三天卫生员来了，把我安置好，给我毯子。应该说给了我好几条毯子，裹住我。大概五条吧，您知道那种薄薄的德国羊毛毯。包好之后抬我走，放进一辆五吨卡车。车上只我一个伤员，外加几个兵。卡车从维亚济马沿着明斯克公路往斯摩棱斯克疾驰，开得飞快，我像这样上下乱颠。我刚开始还喊：

“Kamrad, Kamrad, 慢点！”车根本不停，照样狂奔。

K. M. :几个德国兵也是伤员吗？

M. Ф. :不是，没受伤。

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失去意识，实在太痛了，忍无可忍。

车开到斯摩棱斯克，已经天黑。问遍五、六家医院——哪家都不收俄罗斯将军。都不收！最后到了某个地方，我听见俄语，看来是遇到自己人了。我知道，大概是战俘营。

几个卫生员走过来，还有我们的护士，都是俄罗斯人。我请求喝水，“将军同志，我们没有水。斯摩棱斯克的自来水管道坏了”。我说：“那就化点雪吧”。“好，马上来”。于是融化雪水，用纱布过滤喂我喝。

担架抬我上楼梯、穿过平台，简直无处落脚。满眼全是伤员，楼梯、楼道、平台全部挤满，连床铺、担架都没有！就那么躺在地面痛苦呻吟。

进病房，内有十五个军官，包括我们第20集团军炮兵主任普罗霍罗夫将军。病房有床铺，他们把我放在床上。我用手撑着床，发现床垫被脓血浸透了。递给我一个枕头，算是额外开恩吧。

这家医院供应伙食。德国人不给粮食，只给一点面包，一小块，大概八分之一。剩下的食物来源，他们派出汽车或马车，让伤愈的人去集体农庄收集农民能拿出来的粮食。由于磨坊都停工了，他们就给未磨粉的黑麦或小麦，把黑麦和小麦蒸熟吃。此外没有其他食物。



(伊万·普罗霍罗夫少将参加维亚济马战役，突围失败被俘，1945年4月被英军解救，从巴黎回国。通过了甄别审查，1947年完成总参军事学院进修课程，留校任教。1953年11月因病退役，1961年6月逝世。)

K. M. :就是说，德国人押运的马车或卡车？

M. Ф. :是的。从集体农民家收集粮食。那真是一场噩梦。多数人都死了——腹部受伤、内脏损坏的伤员因为吃这些东西死掉了。

药品供应有限。常见的情况是，那些被俘虏的医生说：“我们知道某个医疗卫生营的位置，那里埋藏或遗弃了一些药品”。这种情况也会给辆马车，他们就去找，找到了带回来。但这些东西远远不够。

我告诉您我亲眼目睹的场景。我被抬上手术台，旁边另一张台子躺着我们的一位上校。医生看后说：

“你得了坏疽，必须马上截肢”。上校说：“好吧，切吧”。医生说：“没有麻药。只能像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皮罗戈夫²⁴那样动手术——不打麻醉”。

K. M. :擦酒精了吗？

M. Ф. :不知道，就是拿棉球擦一擦。我在旁边看着心惊胆战，看他切开皮肉，扭转。那人只是说：“大夫，哎，快点，快点，大夫”。医生说：“忍一忍，忍一忍，亲爱的”。接着开始锯腿，我不敢看了。那人轻声哼着。等做完手术，似乎他也有点解脱，但两小时后终究死了。

我后来问医生：“大夫，您明明知道他会死，为什么还要折磨他？这人经历了极度痛苦”。医生说：“不然怎么办？我毕竟想救他一命”。

K. M. :那里有德国的长官吗？

M. Ф. :我们的。

K. M. :一个德国人也没有？

M. Ф. :不知道。大概有管事儿的，但没见过。我们有自己的医生，俄罗斯的医生。可他们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他们把我放进澡盆，因为我很久没洗澡了。大概从……见鬼，记不清了！战斗那么激烈，哪有那个心情！我受了伤，医院也没人帮我洗。只有那个奥地利医士——之前说过的那个士官——会用樟

24 尼古拉·皮罗戈夫，赫赫有名的俄罗斯外科专家。

脑酒精给我擦身，此外再没洗过。现在必须要洗一下了。他们烧热水，加了高锰酸钾，把我放进去。我说：“不会感染吗？”“不怕，高锰酸钾消毒”。果然没事。这个医院曾经一天死掉三百到四百人。三百、四百啊！伤员不断送来，因为前线战斗太激烈。送来的都是重伤员。之所以是重伤员，因为野战医院治不了，把人送到这儿等死，就在这儿咽气。

K. M. :看来，有前线的战斗，主要还是包围圈内的战斗。

M. Ф. :既有被包围的，也有游击战，全有。不断抬人进来，不断抬人出去。我引用负责这个医院的医生的话——他说每天三百到四百人死亡。

某天，一位医生走到我跟前，说：“有个公民想找您”。我问：“谁呀？”“不知道，穿便装”。我说：“我不去，叫他来见我”。

K. M. :您已经拄拐下地了吗？

M. Ф. :没有没有，我还躺着不能动呢。我说：“我不想去，让他过来”。我不想和谁单独见面，我不想这样。

他去问了又回来，说：“不行啊，命令把您抬去”。于是上担架，卫生员抬我到一房间。我一看，是个年轻人。在哪儿见过？似乎很眼熟。“将军阁下，您不认识我了吗？”我说：“认出来了。你是……第19集团军特别处副处长？”“是的”。

K. M. :你俩是单独谈话吗？

M. Ф. :是，一对一，在房间里。我说：“您找我做什么？”他说：“将军阁下，您当然知道前线的形势，对苏联红军不利。您也知道，希特勒正在建立新秩序”。我说：“您已经开始为这个‘新秩序’效力了？”他说：“是的。我奉德国司令部之命找您商谈——您是否愿意协助建立新秩序，为俄罗斯人民工作？”我说：“我自懂事以来一辈子都在为俄罗斯人民工作！从我开始明白事理就一直在为人民工作。您记不记得，曾经有两个营长因为讲笑话被你们处决了？两个最优秀的营长！我请求过、劝说过，命令不要枪毙他们，让他们去惩戒营。但你从我这儿离开后，仍然把人枪毙了。你个畜生！”

日后我在斯摩棱斯克党史档案馆，负责人给我看这个特别处人员的案卷——败类最终被抓住了，他的口供交代：他曾经找过我——卢金将军——而我不仅没答应，还用各种难听话臭骂他一顿。这些在供词里写着呢。

K. M. :他什么时候被抓的？大概是战后吧？

M. Ф. :大概是战后。也可能是游击队抓的，这不好说。

K. M. :他什么军衔？

M. Ф. :大概是少校，大尉或少校。总之是叛徒，这个败类替德国人卖命去了。

我们谈完之后，我喊医生来，说：“抬我走，我不想跟他说话”。他就走了。人家抬我回去。我的情绪十分激动混乱，旁人问我怎么回事，我就简单讲了讲。第二天来俩德国人：“将军阁下，我们的代表昨天来见您，您对他态度非常恶劣”。我说：“这人是叛徒，不是代表，是给你们卖命的俄罗斯叛徒”。他俩说：“我们不讨论这个，以后不再提了……”我说：“你们也是来劝降的？”

K. M. :两个德国人会俄语？

M. Ф. :说俄语，说的很好。其中一人是列宁格勒中学毕业的，革命前住在俄罗斯。

K. M. :军人还是平民？

M. Ф. :穿便装。

他俩说：“我们知道您身处困境，也知道您是非常勇敢的将军，我们尊重勇敢的将军。我们想为您创造更体面的条件”。我立刻警觉起来：“你们想为我创造什么条件？”“我们并不是向您提什么要求，请放心。我们只是想把您转到条件更好的德国医院”。我说：“我一个人不去。如果带上那位炮兵将军（我原来的炮兵主任），我就去”。“这超出了我们的权限”。我说：“那我就留在这儿”。

过了一天他俩回来，说德国司令部同意了。于是我们就被带到德国医院。

德国医院的条件当然比之前好得多。也是前线医院，士兵和军官混住。伙食还算可以，吃得饱、热量高。有一些来自斯摩棱斯克的我国妇女做卫生员，其中一位姓德罗夫尼科娃或德罗文尼科娃，我记不清了，也找不到她了。我对她说：“帮我们弄点红菜汤，乌克兰的猪肉红菜汤”。她给我们端来，刚吃两口，德国女护士，“Schwester”，啪啪抡她几巴掌，把我们的汤泼了。

K. M. :不让吃？

M. Ф. :对，不让吃。还有一位老太太，德语翻译，她两个儿子在《消息报》做记者，姓什么我忘了。有一天晚间那个德国女护士碰巧不在，她给我们拿来人造蜂蜜。你知道德国那种人造蜂蜜吧？不得不说很好吃，尝不出来不是天然的。她还带来些面包干。结果真倒霉，德国女护士偏偏这个时候出现，把老太太打一顿，夺走我们的面包干和蜂蜜。

K. M. :这个 Schwester 是恶婆娘吧？

M. Ф. :她倒不是专门针对我们使坏，属于生性凶悍。她照顾的那些伤员……我等会儿跟您讲讲他们多么怕她……

K. M. :德国人也怕她？

M. Ф. :德国兵都怕她呀。晚上他们溜过来，有的给一根烟，有的给三根，有的只是来坐坐，只要她不在就行。进屋先嘱咐：“Nicht Schwester, nicht schwester”，意思是“别让护士知道”。他们是真怕她。但她做本职工作，你挑不出任何毛病，早上一定给你擦洗一遍……

K. M. :她亲自擦？

M. Ф. :是的，亲自擦。医院所有事情都是护士做，不允许女卫生员插手。她帮你擦身，防止长褥疮，整理床铺，命令把东西都搬出去。所以她做护士无可非议，但就做人而言，纯粹是泼妇。

K. M. :打这些女卫生员吗？

M. Ф. :打，当兵的她都敢推搡。人人怕她。

K. M. :病房除了你们俩还有别人吗？

M. Ф. :只有我俩。实际是禁止串门的，德国兵偷偷溜进来。

那里有一位医士，修道院出身的士官。我们跟他解释，说圣诞节得喝点儿高度酒。他满口答应：“Jawohl, jawohl”。天黑医生们下班，护士也走了，他给我们带来半升俄罗斯伏特加，莫斯科品牌，还带些三明治。德国兵也来了。我给自己和普罗霍罗夫各倒半杯。因为不知道莫斯科是否被攻占，气氛十分紧张。

K. M. :没听说他们后撤的消息吗？

M. Ф. :我们一无所知。

K. M. :士兵们什么都没听说吗？

M. Ф. :士兵们知道什么呢？他们也不知道，报纸可没写这些。后来才开始写，说是出于战略考虑后撤之类。再后来继续撤退，写的是“弹性防御”。写是这样写啊，但我们心里明白意味着什么。

我把半杯伏特加举到嘴边，一个德国兵抓住我的手，唯恐我喝了呛死。您知道德国人怎么喝酒吗？小口小口抿，吃完饭然后喝，用糖果下酒。

一个兵说：“意本参战了”。我们明白是说日本参战了，具体怎么回事不清楚。起初挺不安的——难道是打我们？我国两线作战那就糟了。他又说：“和美国”。美国参战了。

有一次抬我去换药，包扎得很正规，跟护理德国人没两样，只是那个换药的医生问：“谁给您做的截肢？”我说：“Deutsch Arzt”²⁵。他摇摇头。当初医生给我截肢，告诉我：“将军，您回国之后，您的矫形外科医生会问：‘哪个臭皮匠做的手术？’您可别介意啊。我是尽量多给您保留骨骼”。您见过被截肢的腿吗？

K. M. :见过，当然见过。

M. Ф. :通常是用肌肉尽量包住骨头。而我的骨头突出来，像这样鼓着。他只用皮肤包住，说：“您别介意。这样您的腿更有控制力，假肢可以顶在这上边，不会疼”。我至今感谢他，确实如此，到现在二十五年多了吧——我这条腿从没出过任何问题。

另一次又去换药，给我盖了别人的毯子。把我的毯子拿走了，给我一条估计是刚从前线运来的。我感觉有东西在身上爬，仔细一看吓坏了，虱子密密麻麻的爬我满身。我摇铃，Schwester 来了，我说：“你看，在爬”。她说：“这都是你们俄罗斯人的”。老天，俄罗斯人！德军的战壕也没法洗澡啊，他们大概一辈子都没洗过吧，所以招虱子了。还有农民的小木屋也全是虱子，因为挤满了人，能不多吗？过了一会儿来一个德国少校。我一看就知道是情报部门的人。他走进来说……

K. M. :也说俄语？

M. Ф. :说俄语。用俄语谈话，不用翻译。毕竟他们搞情报的人很多是……

K. M. :波罗的海国家德裔。

M. Ф. :是的，还有从俄罗斯出去的德裔。革命之后他们离开了，后来搞情报的那批人，尤其对俄方向的，都会说并且学习过俄语。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人走进来说：“将军，请看看照片”。我一看照片——第 28 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证件、皮夹子撕烂了，照片上有血，还有一些带血的文件、信件。他问：“认识吗？”我说：“认识，一个牺牲的苏联将军”。“他是谁？”我说：“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再仔细看看”。我又看了看，是卡恰洛夫。我说：“不认识，不知道是谁”。他说：“这是第 28 集团军司令卡恰洛夫”。我说：“您要想知道我国姓卡恰洛夫的太多了，有演员卡恰洛夫，也有作家卡恰洛夫，还有其他卡恰洛夫”。他说：“哎，

您讲这些干什么？您明明认识我们的指挥官，我们也认识你们的全体指挥官。您以为我们不了解您？很了解。要不要我把您的整个简历讲一讲”？我说：“没必要，我自己知道”。“这就是卡恰洛夫。你们宣布他是叛国者，可我们发现他死在坦克里。这要搁在我们国家他就是英雄，会给他追授铁十字勋章加月桂花环。你们却说他是人民公敌”。

我说：“我们确实宣布过一些人是人民公敌，我知道，我还在的时候就有这种命令——那些投降的、没和你们好好打仗就做了俘虏的”。“可我告诉您，他是被打死的。”那时候我国已经发了通令，说卡恰洛夫投敌。

K. M. :第 270 号令。

M. Ф. :您知道吗？我当时就不信。卡恰洛夫不可能投敌！我认识卡恰洛夫，他在中亚打巴斯马奇分子打得可狠了。



（最高统帅部 1941.8.16《第 270 号令》基于虚假报告，误称弗拉基米尔·卡恰洛夫中将“表现懦弱，投降德国法西斯”。1941.9.29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缺席判处他死刑，家属被镇压。战后调查得知，1941.8.06 卡恰洛夫乘坐坦克突围时牺牲，证件被德军收走，尸身被附近居民掩埋。1953 年 12 月撤销原判，平反恢复名誉。）

K. M. :他五次负伤啊。

M. Ф. :卡恰洛夫早年曾在察里津带兵，打邓尼金。卡恰洛夫怎么可能是祖国的叛徒呢？！他得过两枚红旗勋章。不，我不相信有这事。我跟普罗霍罗夫说：“伊万·巴甫洛维奇，你看看，卡恰洛夫怎么可能投降呢？”他说：“我也不信，不可能。准是德国人挑拨离间”。可这跟德国人有什么关系？是咱国家发的通令。德国人又没说他是人民公敌。

总之，我们看了这些东西……事情到此为止。

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先前来医院转运我们的德国人又来了，还带了另一位，大高个儿，俄语说得很好。他父亲以前在俄罗斯做木材生意，把枕木销往全欧洲。所以这人是在俄罗斯出生、长大的。大高个儿德国人，留胡子，穿便装，看样也是搞情报的。他说：“好了，先生们，准备一下，明天送你们去德国，我们送行”。好吧，既然要送，那就送吧。

K. M. :这时候你们仍不知道莫斯科的情况吗？

M. Ф. :完全不知道。没有任何报纸，也没人告诉我们什么消息，一无所知。

对了，我还在我国境内医院的时候，听卫生员说斯摩棱斯克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人。一个德国人常来我们这儿，来了就发莫合烟，可能想拉拢谁吧，我也说不清。我拜托他请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来一趟。之后来一位瑞典人，我向他抗议：“您瞧瞧苏联战俘的处境！”他说：“贵国政府未签署日内瓦公约，所以你们还在这儿完全是德国人的仁慈。这方面我们无能为力”。既然无能为力，那就没什么可谈了。假如他们能够介入，不知道将挽救多少生命！

我国竟然连关于战俘的公约都没签，多么令人愤慨！

K. M. :现在签了吗？

M. Ф. :现在签了²⁶。当时瑞士的一位神经科医生来看我，我告诉他我这只手不能动。他说必须缝合，那会儿应该还可以。但他说：“您知道德国人眼下顾不上这事，他们伤员太多，恐怕不会管您，我们也不便干预”。所以我的手就一直这样。

他们带我们走，带到火车站，塞进一个单独包厢。车上挤满人，空气憋闷，门也锁了。火车开动，一路开到奥尔沙²⁷不能前进——桥被炸了。

26 1954 年 5 月苏联签署日内瓦第三公约

27 白俄罗斯境内

K. M. :铁路桥吗?

M. Ф. :是的。看来扎斯罗诺夫²⁸开始行动了,也可能不是他的队伍。我们当年的做法是这样:我撤退时在桥梁或其他设施布雷但不引爆,过一段时间,一切平静下来,交通恢复,我叫无线电员,说:“引爆某号目标。”他一按电钮,桥、房子统统飞上天。可能是这么炸的,我不确定。各种方式都用过,赫雷夏蒂克大街²⁹也炸了……

K. M. :用无线电引爆的?

M. Ф. :我觉得是无线电引爆。否则德国人干嘛炸那个宾馆,他们不是住着吗?宾馆叫什么来着?挺高档的。

K. M. :“大陆宾馆”。

M. Ф. :他们为什么炸自己人?当然是我们炸的。民宅是不是我们炸的我不敢断言,但那家宾馆我觉得肯定是我们的人炸的。

火车不能前进,把我们抬进车站候车室。恰巧进来一队军事学院刚毕业的德国军官,即将奔赴莫斯科。候车室塌了半边,房间很小,我们占一块地方。他们听说里头有俄罗斯将军,大喊:“俄国将军,滚出去!”意思是把我们扔到大街上,“誓不两立”。

大高个留胡子的德国人花了很长时间劝慰他们,他们暴跳如雷。不知道这些人后来是回家了呢,还是在莫斯科附近某个地洞睡下了呢。

继续赶路。进入布列斯特,安排我们洗澡,澡堂条件很好,人人洗一遍。不洗澡、不符合卫生规范者不允许再往前走。

又继续前进,抵达柏林。把我们安置在柏林某医院,在那儿住的时间很短。陪同人员不知道做什么去了,留下一些给我们在路上吃的罐头,我们就把罐头吃光。估计他本想拿罐头给他家人吃的,回来一看罐头空了,破口大骂。

K. M. :他一路陪同你们?

M. Ф. :是的。

K. M. :穿便装?

M. Ф. :对,穿便装。

K. M.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您曾讲过,您听某个士兵说德军没拿下莫斯科——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吗?

M. Ф. :我们到柏林之后才知道他们在莫斯科城下兵败。报纸写的,勉强看得懂,不完全理解,但明白他们从莫斯科撤军。得知这个消息很高兴——莫斯科没被攻陷,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后来我们被转移到吕肯瓦尔德战俘营,遇见南斯拉夫人、法国人,获悉详细情况。战俘营不大,关押南斯拉夫人、法国人(没有英国人),以及我们。营地被铁丝网包围,我们又被单独拉一层铁丝网——跟其他战俘隔开³⁰。

K. M. :吕肯瓦尔德离柏林不远吧?

M. Ф. :有一段距离,大概一百五十千米。现在这个地方属于民主德国。日后我访问德国,特意去看过。什么都没了,烧光了。

K. M. :在柏林南边?

M. Ф. :对,南边。

K. M. :1945年我就知道这儿。

M. Ф. :附近不远有个靶场。战俘营关着法国人和南斯拉夫人。

K. M. :就是说你们在柏林时间不长?

M. Ф. :不长,中转而已。在吕肯瓦尔德我们已经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因为南斯拉夫人读报,法国人也读报。

K. M. :你们怎么和他们交流?

M. Ф. :隔着铁丝网啊。他们站那边,我们站这边。

K. M. :住板棚,还是什么?

M. Ф. :板棚。他们的板棚和我们的用铁丝网隔开。

²⁸ 康斯坦丁·扎斯罗诺夫,化名“科斯佳叔叔”,是在奥尔沙地区活动的敌后游击队长,1942年11月战死。

²⁹ 基辅市主干道

³⁰ 因为当时苏联未签署日内瓦条约,所以苏联战俘待遇更差。

K. M. :板棚怎么样?

M. Ф. :不错。板棚相当不错。

K. M. :生炉子吗?

M. Ф. :曾经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减少燃料消耗, 限制生火。天气太冷, 无处安身, 所以烧煤生炉子。另外还有电炉, 也能稍微取暖、热饭。后来在火炉上增加小装置, 如果饭没吃完可以放进去回温。伙食当然和所有战俘营一样, 稀汤汤。俄罗斯战俘的伙食绝对一致: 1升芜菁汤、250克面包, 鬼知道什么做的。我只有一个地方吃过好面包。怎么个“好”法? 你吃的时候尝不出来是代食品面包, 放了十一个月, 玻璃纸包着, 口感像新鲜面包, 只不过没什么营养罢了。而战俘营的面包掺了芜菁, 软塌塌, 吃下肚像吞一块石头。

K. M. :也就是1升汤、1块面包……

M. Ф. :还有茶。不知道放没放糖, 我们尝不出来。有人说放了糖, 尝不出来而已。就吃这些。

有一次我叫来医生, 说我胃不好, 吃不下这种面包。他回答: “德国还没准备杀鸡给你们吃”。我说: “谢谢, 就这样吧”。

不得不说, 南斯拉夫人真的很帮忙。他们能收到包裹, 从家寄来的。彼得国王也给他们寄过, 不是一直寄, 偶尔会寄。国际红十字会也有援助。所以他们和我们分享食物。尤其有一次来了法国医生, 说: “做个手术把你的神经缝合”。我说: “好, 同意”。

K. M. :他是战俘吗?

M. Ф. :是战俘。我说: “那就做手术吧”。他又说: “我需要一只猫”。我说: “您要猫做什么?”

“我要取猫的什么脑部组织”——或者脊椎的什么组织, 我不太明白, 总之是取下某个部位, “然后用酒精浸泡一段时间, 再植入你神经断裂的地方”。我说: “动手吧”。他说: “必须先征得德国医生同意”。

于是德国医生来了, 我告诉他法国人想给我做手术。他说: “好, 我协助他、监督他”。

K. M. :引起他的兴趣了。那位法国医生是战俘的儿子吗?

M. Ф. :他父亲被俘, 年迈多病, 他自愿代替父亲坐牢。释放他爹, 他进来顶替。法国人能办到这种事, 至少如此。

K. M. :有意思。我从没听过。

M. Ф. :您没听说过?

K. M. :没。

M. Ф. :有病的放走, 健康的进来。这对他们有好处——他能工作嘛。所以德国人对待法国人和对待我们不同, 只有我们是“法外之徒”³¹。

他给我做完手术, 送我进卫生站包扎换药——那几天是最好的日子。卫生站一定有法国人、南斯拉夫人给我塞东西, 主要是香烟, 德国狱卒根本不发烟, 所以特别想抽。人家给我塞香烟, 还从自己的包裹拿东西出来。这让我们好过许多。

K. M. :战俘营只有将军还是也有下级军官? 有军官营区吗?

M. Ф. :不区分。

K. M. :不, 我是说整个吕肯瓦尔德战俘营情况是怎样?

M. Ф. :既有士兵, 也有军官。不过法国人和南斯拉夫人军官是单独关押的, 我们混在一起。虽然我单独住一个房间。

那里有一位我国的优秀翻译, 工程师、工兵的。年轻小伙子, 姓……他对我很好, 总是尽力帮我找德国医生争取点什么, 或者药品、或者换洗衣物之类。我内衣一直是干净雪白的。但有一天他们把一条床单收走了, 只剩一条床单。因为轰炸, 床单短缺。

我被俘的消息是我国一位将军发现的。他姓……以后再告诉您。他后来被抓回国绞死了, 我一时想不起他姓什么。他来了, 我以为他也是战俘, 过后发现他是波罗的海军区, 也就是波罗的海方面军的作战处长, 开战之初投靠德国人, 为他们工作。而我并不知道他在为德国人效力。

K. M. :他是因为涉及弗拉索夫案被绞死的, 五人或六人中的一个。

M. Ф. :对, 对。我以后会想起他姓什么。

好像他还给我带了点东西。我问他: “您怎么能自由出入?” 他说: “德国人允许我活动”。我倒也没太在意。

K. M. :他穿苏联军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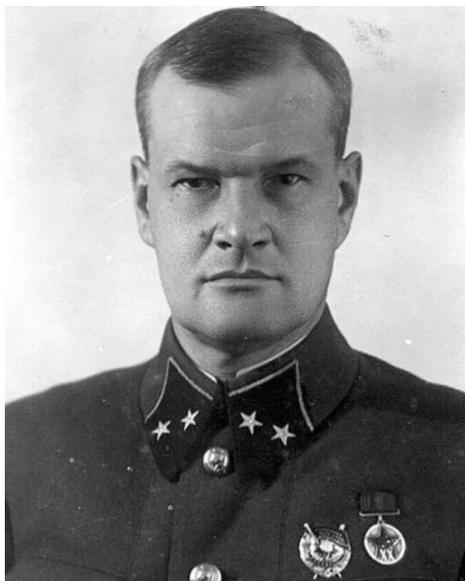
³¹ 指不受任何法律保护之人

M. Ф.:不穿。

K. M.:已经穿便装了?

M. Ф.:对,穿便装。后来我被转移到那个战俘营之后才知道他为德国人工作。原来他有些远房亲戚,本人是贵族出身。总之,投靠了德国人。随即在弗拉索夫手下做副手还是什么,穿德国将军制服,只是写着“P O A”³²。

不知为什么,又把我从这家医院转到柏林的一家医院。



(费奥多尔·特鲁欣,出身科斯特罗马贵族家庭。红军少将,曾任波罗的海军区副参谋长、作战处处长,1941.6.29在立陶宛被俘,时任西北方面军副参谋长。投敌后表现出明显的反斯大林、反共产主义立场,1943年2月会见安德烈·弗拉索夫,在“俄罗斯解放军”活动。1945.5.8被亲苏联的捷克游击队俘虏,关押在莫斯科,1941.8.1在布提尔卡监狱绞刑处死。)

K. M.:医院在战俘营内部吗?

M. Ф.:不是,战俘营是单独的,那个地方纯粹是医疗设施。战俘营在这儿,医院在战俘营旁边。

K. M.:医院不是仅接收俄罗斯人?

M. Ф.:向所有人开放。

K. M.:所以你们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南斯拉夫人。

M. Ф.:正因如此,我才说带来了一点特权。

K. M.:您是因为治疗手臂进的医院?那段时间进的医院?之前没去过?

M. Ф.:没有,之前没进过。换药包扎的时候去一次,但刀口几乎愈合了。

K. M.:那时候您已经拄拐杖了吗?

M. Ф.:拄拐。但很困难,因为我这只手没法拿拐杖……他们那种破拐杖顶在肘部,特别不好使。

我就问:“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做假肢?”他好像给什么地方打了报告,把我送到柏林的医院。也是个混合医院,有法国人、英国人、南斯拉夫人,用的是旧中学校舍。他们就在那儿给我装假肢,在柏林。

某天几个卫生员通知我:有位英国医生想谈谈。他们送我过去。那个混蛋!我陪他坐了两个钟头,他一直在抽烟。狗日的给我一支也行啊,他偏不给,我原则上也不想主动开口要。我心想:他会给我吗?终究没给!还故意朝我这边喷烟。谈话内容天南海北五花八门,他说:“眼下我们是盟友,但以后还得跟你们打仗”。我说:“咱们为什么非打仗不可?”他说:“等着瞧吧”。

K. M.:他谈话没有特定目的,纯粹想闲聊?

M. Ф.:对,就是想找人解闷。

K. M.:他是战俘吗?

M. Ф.:是战俘。他告诉我,我也亲眼见过:英国军官每天可以在战俘营外而不是营内散步两小时,当然有德国人押解。我亲眼所见,一个高个子英国人迈着大步走得飞快,跟在他身后的德军下士连蹦带跳紧跟,散完步回来,下士浑身湿透。

某个战俘营的英国军官曾经和守卫发生激烈冲突，揍了守卫。也许没全揍，只揍了几个。希特勒命令给所有英国军官戴手铐——这是那位医生告诉我的。据说丘吉尔得知这事，第二天命令也给所有德国军官戴手铐。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反正他这么讲的。后来，希特勒取消手铐令。他还告诉我不少事情，他说：“你们为什么收不到东西？我们英国被俘军官的待遇甚至比在前线更好，我们领的工资比前线军官还多百分之十”。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战俘生活不方便，这是补偿”。您听听！被俘的补偿！待遇高了，工资多了。这说明英国政府根本不相信英国军官会叛国。

K. M. : 或者自愿被俘，或者主动投降。

M. Ф. : 对，投降或者有这个念头。当然任何国家总会有败类，但原则上的态度……让我震惊。

手术做了，可惜没有任何效果。后来有人告诉我，任何外来异物，只要不符合身体结构，最终会被吸收掉。看来那位医生是在做实验呢。我问他：“您以前做过这种手术吗？”他说：“做过三次”。“结果呢？”“不清楚”。他很坦率地承认：“不清楚”。呵，试过，做过。

对了，在这里我见识了英国人和法国人收到多少东西。在这家医院，他们收到的包裹数量惊人。甚至被俘的英国黑人飞行员³³，床底堆满纸箱。所以他们根本不吃德国人的饭。

K. M. : 给他们的德国口粮是一样的吗？

M. Ф. : 不一样，他们的更好。我见过一次，在另一个法国人战俘营，给他们吃的是……软体动物。

K. M. : 吃虾？

M. Ф. : 我不知道是不是虾，看着像蜗牛。

K. M. : 啊，穆利，是穆利³⁴。

M. Ф. : 穆利？有一次法国厨房送来食物，普罗霍罗夫说：“快看，有肉”。仔细一瞧：“哎呀，是蜗牛啊”。

我后来被转到另一个战俘营，他们经常转移俘虏。然后我又被送到……我是什么时候到那个营来着？是在这儿还是不在这儿？我还在柏林某个战俘营的时候，经历了一次空袭。白天英国人轰炸，夜晚美国人轰炸。愉快的场面——只要你知道他们不是在你头上投弹而是炸别的地方。天空万里无云——我在两个战俘营见过——晴朗的天空，密密麻麻的飞机，五百架、七百架、一千架飞机编队飞行！你坐在那儿，听见声音越来越响。先是高射炮开火，接着发动机轰鸣，抬头一看，飞机临空了。炮弹爆炸，德国战斗机起飞，有些被击落，但队形始终不乱，继续前进。然后听见“轰——轰——轰——”，炸弹落地。我曾在两个战俘营亲眼目睹英国人轰炸法国营和法意混合营。

K. M. : 显然是误炸。

M. Ф. : 不知道是不是误炸，我说不好。因为那些人都是给德国干活的劳工，他们在工厂、作坊工作。法国人干活积极，虽然嘴上骂，手上可没停。这些工作归根结底是为前线服务的。也许是误炸，也许是故意的，鬼知道。

我们有个简易防空洞，很浅，甚至一部分露在外面，石板一块搭一块垒起来。我靠着炉子坐，旁边是烟囱。忽然百米开外一颗重磅炸弹落地，在淋浴间那一带，有点像澡堂。我当场就听不见了。我碰碰身边那位将军，他对我说什么我完全听不见，彻底聋了。我说：“我完全听不见”。后来逐渐恢复。可能我被烟囱震了，直到现在右耳听力仍然不好。

等我们出来，住的板棚没了，烧光了。所有的营房都炸毁。淋浴间炸平了，巨大的水箱飞出去老远。我们又从那个战俘营转移到另一个。那边有储罐，可能是炼油厂或生产合成汽油的厂。总之空袭不停，虽然是炸旁边的地方。

后来我又被转到另一个战俘营……名字记不起来了，那个营挑选人……

K. M. : 就是把您转过去的那个？

M. Ф. : 就是那个，那个卖国贼、“弗拉索夫分子”将军来过的营地，大概是他要求把我转过去的。那时候普罗霍罗夫已经在里头了。

K. M. : 他比您先到吗？

M. Ф. : 比我早。

K. M. : 不解释去哪儿、为什么？

M. Ф. : 他们根本不说不。把我带去我才得知：这个战俘营专门挑选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之人，主要是挑选技术专家。我就打听是什么情况，人家说，这些人随后要参加两到三周的培训，然后带他们去德国工厂，参观了解德国工业，最后送去被占领的我国领土——做学校督学、教师、行政人员。级别低的做地方警察。另外还有一类人——总之都是被占地区需要的。

33 英国空军1939年10月废除“仅招收纯欧洲血统英国臣民”的规定，之后约6000名西印度群岛居民自愿报名，其中400-500人升空作战。

34 法文Moule，贻贝。

K. M.:就是说,先上课,接着参观德国工业实力……

M. Ф.:对,然后送走。

K. M.:这是什么时间?夏天?

M. Ф.:四二年、四三年。

K. M.: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之前?

M. Ф.:斯大林格勒之后。因为我在其中一个战俘营听说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碰壁。那边的教师是一些早先住在俄罗斯的俄国德裔人,找他们做培训课教师。他们来了以后,开始透露一些多多少少允许谈论的事情,说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遭受严重伤亡,宣布全国哀悼两周。

K. M.:课堂上讲这些?

M. Ф.:对,上课讲的。我没去,一节课也没听。他们倒没强迫我。我说:“我不打算去被占地区,所以没必要上这些课”。我让普罗霍罗夫去:“你去听听上课讲什么”。主要是讲新秩序,德国人要建立的新秩序,内容包括什么。

与此同时,我国的叛徒教师还在组建所谓劳动党。劳动人民党,好像是这个名字。

我在那儿的时候只送走一批人去我们被占领土。但当时我已经和几乎所有能接触的学员建立联系,都是些不会引起怀疑的人。如果我们苏联青年走上歧路,那真是太可惜了。

至今我还收到很多这样的人来信。当时我跟他们讲:“去上课,避免引起怀疑,表现积极一点,去参观工厂。一旦你们被送回国内,立即寻找游击队”。这样被送回去的人非常多。

有一位也姓卢金的,好像是作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³⁵。他写过一本书叫《契卡分子》,你没读过吧?

K. M.:没读过。

M. Ф.:他还写了别的书。

K. M.:他也上课了吗?

M. Ф.:没有,他在国内,在游击战司令部工作,他知道我送出去的那些人有多少参加了游击队。

我先跟您说后来的事。有一次他到苏联参战老将士委员会,走到我面前问:“您认识卢金将军吗?”我说:“认识啊。问他做什么?”“我想跟他谈谈”。“什么事?要不要我转达?”他说:“我以前在游击战线,他当年在战俘营送出不少人,这些人都参加了游击队”。我说:“恐怕人家骂他是败类、叛徒?”他说:“不,哪儿的话,人家对他评价很高”。我说:“那我转达给他”。几天后我们又详细谈了一次。

我们在战俘营接触的大多数人参加了游击队。可最后与苏联红军会合时,他们却被抓去受审,判刑十年。所以很多人写信给我,请我帮他们撤销判决。凡是找我求助的人,罪名都撤销了。

有一次我被传唤去法庭,审一个战俘的案子,年轻人,二级军需技术员。他爸爸以前在我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上班,也在法国工作过,这个小伙子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是个好孩子,手臂受重伤。他曾经在米哈伊尔·格里戈利耶维奇的第33集团军司令部,就是自杀那个……

K. M.:叶夫列莫夫?

M. Ф.:叶夫列莫夫。这个好小伙子,战争一结束立即坐车去巴黎,又从法国去意大利。等他回国,被揪住脖子判刑十年,说他是间谍,德国间谍、法国间谍、意大利间谍。

我被传唤。最先叫我去的是莫斯科军区特别处负责人,他问:“您认识某某吗?”我说:“认识”。

“您给他写过品行鉴定?”之前他父亲到我家,说:“我儿子给我写信让来找您。他被判刑十年,但申请了再审”。于是我写了品行鉴定,写是我们一块在医院住院时的情况,我俩的病床挨着。特别处负责人说:“您写了鉴定,您知道他是间谍吗?”我说:“不知道”。“那您为什么写?”我说:“我写的是我知道的那段时间,是我亲眼所见。我和他一起住院一个半月,我了解这个人。我们谈过,我知道他内心什么样,他绝不是间谍。他是苏联军官,二级军需技术员”。“可他就是间谍。您得把这份鉴定收回去——给您,拿回去,重新写一份”。我说:“我不会再写一份鉴定”。他说:“不行,您必须写,这是协助我们司法工作”。我说:“不,我不会改的。我写的是我和他共同经历的那段时间,至于他后来在法国或别的地方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也不负责任”。

于是他换一套说辞,说:“我明白,卢金将军。您回来了,是苏维埃政权给了您自由,您受此影响,想做好事帮助别人,我理解您的善意。但您这样不是帮助司法而是妨碍司法。您这份鉴定是要放进案卷的”。我说:“不,我不会改”。这人翻脸了,大吼:“那咱们走着瞧”。我说:“您别嚷嚷,我不怕。我见过死亡,什么都经历过,我不怕您”。“您说您不改?”“不改”。“将来要后悔的”。“那就再看吧。我可以走了吗?请签个出门条”。他签了,我就走了。

之后开庭审理,叫我去作证。

35 亚历山大·卢金中校,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游击队员,曾两次深入德国后方行动。退休积极从事文学创作。



(第33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叶夫列莫夫参加维亚济马战役兵败，1942年4月19日突围中遇伏击，背部受重伤无法移动，开枪自尽。德军高级军官赞赏他的勇气，当天以军礼安葬。)

K. M. : 这些都是斯大林时代的事吗?

M. Ф. : 斯大林时代。我提前讲，省的以后回过头再说。

法院开庭，把他押进来。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您是没看见他看我的目光啊！那小伙子盯着我，我明白他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想传达些什么。

法官问：“你认罪吗？”“是，认罪。”他承认了。又一次看向我，我心里感觉不对劲，就是不愿相信，您明白吧。结果在他原来十年刑期基础上又多加五年。

K. M. : 反而……给他加刑了？

M. Ф. : 对，对，又加了五年。我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离开。您能理解，我真的无法相信，无法相信。看来他是害怕发生更糟糕的事。

K. M. : 估计是屈打成招。

M. Ф. : 不知道，不知道，说不好。但这个小伙子用那种目光看我！

K. M. : 后来他怎么样了您知道吗？

M. Ф. : 不知道。

有人问我那个战俘营什么情况。我就讲了，那是挑选人员的地方，部分是自愿在那儿工作，但大多数人打算学完这些课程，返回祖国投奔游击队。您知道，确实有很多人后来参加游击队。

顺便说一句，我们的情报部门对那个战俘营的了解其实不准确，他们认为里边的人全是叛徒。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现在与许多从那儿回来、如今在国内工作的人通信。

医生、卫生员被派到这个营，一位医生来找我：“可怎么办啊？现在有人告诉我们，可以领那种无国籍护照”。我说：“您要这个做什么？您别领啊，您是战俘，要这玩意儿做什么？什么叫无国籍护照！”医生说：“可以自由走动，找地方工作”。我说：“您要这种自由做什么？横竖都是在敌国内”。“可有些人劝我们领这种护照”。我说：“那您回国怎么办？拿了这个护照，意味着放弃自己国籍。说白了就是如此”。“哎，幸亏您讲清楚了”。

总之，那地方好人不少，坏蛋也有。曾有一位师参谋长，我记不得哪个师了，姓什马科夫，中校，他说他不上课。凡不愿上课的人，会被送去帮德国农民做农活。他也被送去大田，暗中怂恿其他人偷土豆，让他们故意多留些在地里，诸如此类。农民多次殴打他和其他同志，然后他被波茨坦的盖世太保叫走了。他路过战俘营来看我们，我们提醒他：“要有心理准备，结局可能对你不利”。他说：“明白，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将军同志”。果然一去不回。

新鲁平市³⁶的机务段挑走二十五个工程师去修火车头，他们都领了无国籍护照，课程结束后被选派去那边。休息日他们返回营地，普罗霍罗夫跟他们打交道更多，我只是间接参与此事。但我知道普罗霍罗夫开展的活动，他布置任务，让火车头行驶到某个区间出故障，不得不拖回维修，但不能被德国人察觉。

于是德国人在大家平常碰头抽烟的地方安装窃听器，盖世太保抓走两个人。过了一阵子，一个德国人来战俘营说：“普罗霍罗夫先生，你明天去见盖世太保，有人送你”。

普罗霍罗夫曾经负重伤。他是我的炮兵主任，早先在我的第16集团军，后来我把他调到第20集团军。他是非常优秀、知识渊博的将军。他受过重伤，德国人逼近时他开枪自杀，子弹从心脏几厘米处穿过，没死成。

带他到盖世太保面前，审讯的人问他：“认识某某吗？”“姓这个的我不认识，见了面也许能认出来”。实际他知道此人姓什么。盖世太保说“安排你们面对面指认”。于是把人带进来，确实是那位接受普罗

霍罗夫任务的同志。“认得吗？”“认得，我知道他。他星期天来过营里”。“他说是你给他下达的任务”。那位同志直接插嘴：“普罗霍罗夫将军从没给我任何任务”。

普罗霍罗夫说，眼前这个人基本没人样了——满脸青紫、肿胀，双手被什么东西捆在身后，憔悴虚弱。又问普罗霍罗夫：“认识他吗？”“认识，见过，但我没给他任何任务”。转向那个人：“你知道你什么下场吗？你已经说你认识他了”。“没有，我没说是普罗霍罗夫，也不会说”。

此人明知道自己会被枪毙、会被拷打，拒不出卖将军。您看看，在那儿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啊？工程师，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普罗霍罗夫回来之后，我俩坐了很久，一直在谈论此事。我们的人民真了不起！一个人明知必死，依然不肯出卖将军。

我劝过那些姑娘们不要领取无国籍护照，有的人还是领了，有的没领。她们被送到某个地方劳动，具体做什么我不知道。后来忽然听说，将要送一些人去我国被临时占领的地区。他们说送到乌克兰或白俄罗斯境内。

有人来找我，说被遣返的人当中有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个败类，要提防他。我说：“这事也怪，你们有护照，在森林自由活动，岗哨也是你们的人。他进了森林，一去不返嘛！”“懂了”。之后某一天，发现那人吊死了。现场布置得像他自己上吊，但德国人很清楚，他根本没理由自杀。宣读了命令，遣返暂时推迟，但终究把人送走了。

我手头有几封信。因为报纸登出来，说卢金将军在某个场合发表讲话，随即有人写信说：“亲爱的将军同志，当我读到您的名字，我笑啊笑出了眼泪，笑个不停，因为是您——曾经把我们引上正路的人……”信写得文理不通，但读起来令人心情愉快。可惜这些人后来统统服刑十年，都是因为所谓叛国罪。没有特别可靠的证据，仅仅因为他们上过那些课。虽然有的人参加游击队打了两年仗，有的甚至打了三年，仍然被判有罪。

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情：某位将军，我记不起姓什么，被俘。他从战俘营逃跑，投奔游击队……

K. M. :是布提霍吗？

M. Ф. :不是。布提霍去游击队啦？

K. M. :对。去游击队做了指挥员，后来被枪杀。

M. Ф. :我们杀的？

K. M. :对，我们杀的。

M. Ф. :我说的这位将军，逃到乌克兰的游击队，到了费多罗夫身边——就是两次苏联英雄那个费多罗夫。他在费多罗夫手下做参谋长，两年，费多罗夫的所有作战方案都是这位将军制定的。是个非常能干的将军，出身工人家庭：祖父、父亲、他本人三代工人，五金工。游击队和红军会师之后，他被揪住领子送进卢比扬卡。他跟我们关在一起，后来我们都被释放了，他仍在卢比扬卡。

K. M. :关了多久吗？

M. Ф. :挺长时间。

K. M. :活下来啦？

M. Ф. :对，他目前还活着。已经给他恢复了党籍。

K. M. :命运弄人啊。

M. Ф. :就是啊。想起来了，他姓西索耶夫，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毕业的，后来回去教书，退休了。

德国人把各民族的军团士兵送到那个战俘营休整——高加索人、中亚人，各种人。他们大多数登记参加了独立连，现在他们说“非自愿的”，搞不清楚。我国叛徒佩戴“P A”标志，那些人身上有骑马的图案，还有其他什么图案，乱七八糟。其中一个营过来休整，具体从哪儿来的我说不准。有人说是在波兰，看守仓库，打没打过游击队我也说不上来，因为他们没和我讲过。第二个营来自克里米亚，跟鞑靼人有关系，我仍然说不上来，反正很混乱。第三个营是乌克兰人，闹独立的。有一天我坐在墙根，一个下士走过来，瘸腿拄拐，穿乌克兰民族服装。他们这些人区别不大，就是标志不一样。他说：“你好啊，老爹。”我那时候留络腮胡，斯科别列夫式的，两边分开。我说：“首先，我不是你爹。第二，你他妈是个叛徒！滚开！”

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个德国下士。他是德裔，但也在战俘营。他走过来说：“将军同志……”我说：

“什么将军同志？你们不是叫‘阁下’嘛”。“好吧，‘将军阁下’，我们现在要出发了，又派我们出去，不知道哪儿。您也许能给我们安排点什么任务……”我说：“什么？！什么任务？你疯了？你应该去打俄国人！任务就是让俄罗斯自由！你跟我说个什么劲？”他扭头走了。

这就是他们的暗探，因为那些高加索人，有些小伙子真不错，我现在还跟他们通信。其中有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好小伙子。无论他们究竟是自愿进来的，还是被诱骗进来的。但后来这些人可能醒悟了，联系我，做了不少工作，为的是一旦被遣送回去立刻投奔游击队，总之不再为德国人效力。他们还向我提议：“将军同志，如果送我们走，我们带您一起走。我们去波兰，保证把您带过去，一到波兰就交给游击队”。

我心想：“假设跟他们一起走。到了那边，他们把我交给游击队。再假设游击队愿意接纳我——可谁能相信这不是德国人的诡计呢？”我说：“不行，孩子们，我不去了。就在这儿熬到战争结束吧”。他们后来也都被判刑十年。

之后又发生一件事。有人敲门，我自己在屋里，房间不大。“请进”。门开了，褐色大衣，黄皮鞋、黄色公文包，戴帽子。“可以进来吗？”“可以”。“您一个人？”“一个人”。“为了避免误会，我直接讲吧：我是某某团原政委（他说了番号），被俘了，目前在盖世太保工作。我们的人告诉我，您在搞宣传……”我说：“您这话讲的，我能搞什么宣传？这地方叛徒一堆一堆的，我宣传谁听啊？我受了伤，是俘虏，哪有能力宣传？”“不不，您别紧张，我跟你说我在盖世太保工作，但我实际是为自己人工作。”我说：“别，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事您别牵扯我，我一概不想听”。

然后我让一个小伙子（阿塞拜疆的）去查这个人什么情况。有人说他没问题，有人说他确实在盖世太保工作，鬼知道呢。最起码得多加小心。

总之，后来我们被转送到巴黎，这人忽然又冒出来了。还有一个人我在战俘营没见过，但在莫斯科见过，那时候我是莫斯科卫戍司令，他是莫斯科警察局侦查员。



（帕维尔·西索耶夫少将，曾任第36步兵军军长，两次被俘两次逃脱，投奔费多罗夫的“切尔尼戈夫-沃伦游击队”。1944年4月被传唤到莫斯科逮捕，指控其投敌，但1945年12月决定不起诉，恢复军籍，1946年1月释放。1947-1953年在总参军事学院做高级讲师，因病解职。1981年4月逝世。）

K. M.: 是个大官吗？

M. Φ.: 侦查员之一。他们在巴黎找到我，说：“您需要什么？”我说：“我需要什么？我没什么需要的”。

K. M.: 这个侦查员是什么族？俄罗斯人吗？

M. Φ.: 不，阿塞拜疆人。长得挺帅，英俊小伙子。我觉得是阿塞拜疆人，对，应该是。他们说：“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您需要什么？”我说：“我还能需要什么呢？”“好吧，我们给您带个烟盒吧”。我们的逃亡者，有些在法国和抵抗组织合作，战争结束之后，说实话，其中某些人在那边做了坏事。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估计是四处捞钱，无所顾忌。他们给我买了烟盒，给斯涅戈夫（也是将军）送了一块金表。我谢绝金表，我知道他们兜里没几个钱，也不知道金表是拿什么钱买的，我不想要。

K. M.: 他们这段时间是参加了法国抵抗组织吗？

M. Φ.: 不，他们是去了我国领事馆，为我国领事工作，协助把参加抵抗组织的我方人员送回国。

K. M.: 那在此之前，他们在德国人那边做什么？

M. Φ.: 有一个在盖世太保工作的……

K. M.: 另一个呢？从莫斯科来的？

M. Φ.: 不，他也是战俘。我在战俘营从没见过他，大概也在盖世太保工作过。也可能没在，我不清楚，不敢肯定。

K. M.: 也许是双重身份，有这种可能吧？

M. Φ.: 有可能是双重身份，不清楚。他们在那儿坐了一会儿，说：“不久就要送您回国，很快会来接您”。又给我写了一份良好的个人鉴定。

K. M. :谁?

M. Ф. :在盖世太保工作那位。我拿了鉴定以备有用,但后来撕了。去它的吧,要这种鉴定做什么呢。几年前我被叫到党的监察委员会,讨论恢复党籍的事。他说:卢金认识我。我说:“我确实认识他,但他做了什么,怎么做的,鬼才知道。他说自己在做爱国工作,可究竟怎么回事,我不清楚。不能说你好,也不能说他不好”。我照实把情况讲了。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恢复他的党籍,得问问领事,他的电话我好像还有。后来我国驻巴黎的前任领事被叫去问情况。

K. M. :领事不是瓦西里耶夫斯基吗?

M. Ф. :不,不是瓦西里耶夫斯基。

我接着讲那个战俘营。营内有一位教授,姓什么记不起来了,是数学教授,负责管理战俘营的图书馆。

K. M. :战俘营有图书馆?

M. Ф. :挺大的图书馆,从被占领地区搬来的,我常去借书。有一本小册子在战俘中间流传,尤其受乌克兰人欢迎。故事大概说某位乌克兰大公,不记得哪个世纪的,想把女儿安娜嫁给德国某位男爵或公爵,我记不清了,反正婚事终究没成,但从那时起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就有血缘关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一直想找到那本小册子,亲眼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我就是这么认识他的。他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真名实姓就不知道了,那时候很多人使用化名。我问他:“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您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在组织哥萨克委员会”。我说:“已经有俄罗斯委员会和乌克兰委员会了,为什么要搞哥萨克委员会?您是俄罗斯人,要哥萨克人委员会做什么?”“哥萨克是特殊的阶级,可以成为独立共和国”。“那您想当这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对谁领导不感兴趣。我只是想组织哥萨克委员会”。

看来他果然把事情办成了。这个坏蛋主要是通过他所谓的委员会协助克拉斯诺夫组建哥萨克部队。克拉斯诺夫当时就在那边组织哥萨克骑兵部队,他们在南斯拉夫打仗,没在我们俄罗斯战线出现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这个坏蛋就是在帮他。之后新来两位苏联军官——不清楚是他挑选的还是怎么样,反正是我们的两个军官。

我把他俩一个一个叫过来,问:“你们为什么来这个营?目的是什么?”他俩说:“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推荐我们来的,在图书馆工作”。我说:“你们知道这个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在搞什么吗?他想组织一个委员会,接下来可能还要搞别的,然后把你们也派出去。你们怎么看?去还是不去?你们可是俄罗斯军官、苏联红军的军官”。俩人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说:“你们最好还是离开这个营,别留在这儿”。我看出他们态度不坚决。您也知道,人是可以被引入歧途的,尤其他俩好像原本就认识这人,也许一起做过俘虏呢。所以他记得俩人姓什么,专门要过来,说明他们以前谈过。我觉得这两人不可靠,我对他们说,建议你们别待在这个营,想办法让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把你们调走,就说自己不合适,他有能力安排你们去别的营。我又问他们:“你们究竟为什么在这儿?”人家当然反问了:“那你为什么在这儿?”我说:“我为什么在这儿是另外一回事”。没跟他们多解释,对话到此为止。回国之后,俩人被捕,一个坐牢,另一个提到我,希望我能给他写鉴定。于是叫我到特别处,面见莫斯科军区的检察官,他说:“某某请求您为他写一份鉴定”。我说:“当时有两个人,另一个呢?”“另一个死了,不在了”。

由于他并未从事任何活动,也不曾加入那个委员会,我就给他写了鉴定,陈述事情经过:我怎么叫他来谈话,他怎么回答我的,我个人认为他不会实施也确未实施任何反苏活动。我不知道他内心想法,说不出来。但他的确没做任何反苏的事。我和他谈过,他没参加那个委员会,也没在战俘营搞反苏宣传,只是分发书籍而已。有时他甚至提醒我: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跟谁谈话了,谈些什么内容。我帮他写了还算可以的鉴定,他就被释放了。

他给我写过信——这封信我没保留——表示:提笔写信给您,全家都哭了,都说是您把我送回家,让我与家人重逢。这是一封感谢信。此人释放回家,而另一个死了。

这个战俘营还有特殊情况,有一天德国人忽然要求所有从事矿井或其他地下工作的工程师提交个人简历,写明哪所高等院校毕业之类,据说要把他们派往某个地方。我叫来一个工程师对他说:“听着,这事不能做。你们这样等于替他们卖力。绝不能照办”。他告诉我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写履历提交了,我说:

“你做做工作,劝阻他们”。

我们把这事搅黄了。战俘营指挥官弗伦岑得知情况,对司令说:“看吧,给两个将军创造了条件!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卢金和普罗霍罗夫,他们在做瓦解工作。德军还很强大,德国国家还很强大。我们反正会胜利的,他们会付出代价。等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要怎么付账?”

对了,还有一段插曲。布柳门塔尔-塔马林在广播电台讲话,张嘴就说:“先生们!是我在讲话,布柳门塔尔-塔马林,莫斯科著名演员!”就用这种腔调。有一次我们正坐着,我抓个什么东西扔过去,准确击中广播喇叭,把它砸碎了。有个混蛋告密。后来他又在广播电台说:“将军们坐牢,给他们创造了普通战俘营无法比拟的条件,可他们却怎样怎样……”

还有发生在医务区的一件事。医务区有一台小型无线电,用于营地内部广播。一位报务员来找我:“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我可以组装发报机”。我说:“那挺好,你装吧”。过了几天他又来找我:“组装好了,发报机能用了”。我问:“你试过吗?”“试过了”。有些小伙子见他总来找我,提醒我对这个人别太坦率。



(弗谢沃洛德·布柳门塔尔-塔马林是俄罗斯演员、导演，曾获得 P C Ф C P 荣誉艺术家称号。1941 年 11 月开始同德国占领军合作，访问柏林，定期在广播电台发表反苏演讲，模仿斯大林的声音说话。1942 年 3 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缺席判处他死刑，1945 年 5 月 10 日在德国明辛根市遇刺身亡，刺客身份不详)

K. M.: 发报机还是接收机?

M. Ф.: 是发报机。他说:“我组装好了。要不要发点什么?您有没有呼号?”我说:“我怎么会还有呼号?就算以前有,现在早不能用了。不,我不做这个”。“可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啊,可以发报”。事后人家告诉我:“他根本没有发报机,他是在挑拨你”。他又一次来找我,我对他说:“你个混账,想收买我吗?你不觉得丢脸吗?你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战俘。你是想利用我捞点什么吗?”他哭着认错:“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您不知道,他们一直逼我打听将军们在谈什么,怎么想的……”总之,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间来一辆四轮轻便马车,把我和普罗霍罗夫将军送上车拉走。我们又被带回柏林,然后从柏林郊外的战俘营去莫斯堡市。当天夜晚我俩在警察局的不同牢房睡觉,牢房比你这间小两倍,没有窗,没有门。关我进去的时候,我心里一下子揪紧了。为什么被关在这儿?因为原计划送我们去的那个战俘营道路不通,下大雪不能走。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没讲,思绪总有点混乱。我曾待过纽伦堡的一个战俘营,关的是我们苏联战俘。车子开进营地,大家听说送来一位苏联将军,我们的战俘还没见过将军呢。我下了车,德国人走开,旁人扶着我下车,忽然响起一声口令:“立正!向苏联将军看齐!”接着一位战俘迈正步走到我面前,敬礼并报告说:“将军同志,这个营地非常恶劣,大家像苍蝇一样死掉!”

德国人听见动静冲出来:“谁?怎么了?做什么?!”大家都沉默,喊话那一位躲得快。我有点发懵。德国人走后,小伙子们在厨房集合,说:“将军同志,您知道什么吗?给我们指点一下,现在怎么办?”我告诉他们,战争接近尾声了(已经是 1943 年年底),胜利指日可待,坚持住就行啦,小伙子们。他们说,有人散布谣言,声称苏联红军不存在了,被击溃了。“怎么会被击溃?你们看看报纸就知道!”“可我们没有报纸看,只在外出劳动的时候偶尔捡一张”。

这些话又被某个败类告密。一个德国军士来对我说:“把胡子剃了!”我说:“我不剃”。“剃掉!”“我不剃!”吵了一架他才走。医生来问:“您为什么不剃胡子?”我说:“我乐意留胡子”。他说:“可您刚进战俘营拍照的时候没胡子”。我说:“现在长长了,因为没有剃须刀,我可不用斧子剃,斧子钝得很”。

相邻营地的人听闻此事,立刻开始募捐。凑了不少德国马克,甚至法国人也出钱,他们帮德国人干活的,拿一部分马克酬劳。总之,众人拾柴火焰高吧。我原以为会在这个战俘营多待几个月,没想到才三天就被小推车推到车站,汽车都没得坐。

K. M.: 凑钱做什么用?

M. Ф.: 凑钱给将军们用。

K. M.: 啊哈,交给您呀?

M. Ф.: 对,交给我。虽然买不着什么。唯一能买的是芥末,德国酸芥末。但对我们来说这也不错——芥末抹面包,有点酸味儿,挺好的。此外没别的了。可以买水,但不是一般的水,而是……

K. M.: 矿泉水?

M. Ф.: 不是矿泉水,是某种……

K. M.: 带气的,苏打水。

M. Ф.: 对,差不多。

我接着讲：人家用爬犁拉我走，是我们的船员，不是战俘。被拘留的商船队水手，关在单独房间，周六、周日过来，星期一回去各忙各的。于是我们就上路了——不是一块儿步行，是他们拉着我。这对他们而言当然很新奇——来了将军。

K. M. :您没剃胡子吗？

M. Ф. :没，留着呢。呃，我一路和他们聊天，德国人走在前头，不禁止说话。他们问我一些事，我也问他们一些事。他们告诉我：“您要去的那个营也有败类，有个姓马尔采夫的——叛徒，我们已经知道了”。又说了我国其他被俘将军的情况，已有信件往来。我们一路说闲话到了地方。

K. M. :这地方是在西德吗？

M. Ф. :在纽伦堡附近，西德，莫斯堡市³⁷。当地的堡垒什么样呢？是一座高山上的中世纪城堡，护城河宽阔，古代想必是满水的。然后是巨大城墙，很宽。再往里，房屋和院子，院内有一口混凝土砌的井，从每个屋顶接了水管进去。因为没有自己的水源，所以收集雨水以备围城时饮用。早些年大概就是这样。我到达之后看了看，人们走来走去，各个战俘营都这样：要么皮包骨头，要么全身浮肿。身上穿的那叫什么啊！我瞅见几位将军，衣服乱七八糟，一点儿将军样都没了，破破烂烂的。高低床，没有床单，枕套是麻布的，枕芯塞的是刨花和毯子。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小伙子们给我两条床单。立即有人报告说卢金中将带走两条床单。我刚散步回来，两条床单就被没收了。但我还有一条，是我以前藏的。我看将军们都用两根手指擤鼻涕，问他们“你们怎么连手帕都没有？”“没有手帕”。（我讲这个是为了给您说明情况）我把床单递给最年长的将军：“把它剪了做手帕吧”。他们毫不犹豫地撕开、剪开分着用了。过后我再看，混账将军们个个又有床单了，而我把自己的最后一条给了他们。

K. M. :他们有备用床单？

M. Ф. :他们连手帕都有，只是习惯了手指擤鼻涕。

我还带了不少吃的，法国人送我的。刚开始这些食物被没收，给了马尔采夫叛徒团伙。我提出抗议，找管事儿的投诉。他们已经把一部分吃掉了，剩下的收回来还给我，我再把这点东西分给大家。

K. M. :这个马尔采夫是分开关押的吗？

M. Ф. :他住另一间屋，也和同胞在一起。我们将军是单独关的，他们那边没有比少校低的人。

K. M. :马尔采夫是中校吗？

M. Ф. :好像是少校。但他是个公然反苏的败类，被特意安插到这儿的。为什么安插他进来我不知道，可能是刺探情报，或者搞瓦解。就这么一小撮人，其他人——少校、中校、上校——拒绝为德国人卖命，不肯去工厂、工地劳动。估计是专门派这个败类对付他们。我把食品分了分。每人分得不多，好歹尝尝味道吧。战俘营实在是什么都没有。

K. M. :那边有几位将军？

M. Ф. :我们二十个人。二十个将军和两个旅长。

K. M. :一个房间吗？

M. Ф. :一个大房间。

K. M. :这个营只有苏联人吗？

M. Ф. :只有我们。关押那些船员的地方，那边有些犹太人、捷克人和别的什么人。也都是分别关押，在另一部分，我们和他们没有接触。忽然传出风声——成立了“弗拉索夫委员会”。之前忘讲了，我说话总是丢三落四。可以回过头去讲吗？

K. M. :当然。

M. Ф. :那个开设培训班的战俘营，来过一位将军，他之前也曾到吕肯瓦尔德的医院找我。他在培训班听课，马雷什金也来过。还有另一个混蛋也来了，此人原本在总参谋部负责建设我国的筑垒设防地区。我就问这个筑垒设防将军：“你在他们那儿做什么工作啊？”

K. M. :他已经穿德国军装了吗？

M. Ф. :还没穿上，应该领到手了。所谓委员会那时候暂未正式成立。他说：“我嘛，我在写传单，你也知道德国人写的传单狗屁不通”。您知道他们写的传单多么拙劣吗？我说：“那你是在帮他们润色喽？”他说：“润色。还能怎么办？我已经陷进泥坑了”。我说：“谁让你继续的？”“还能怎么办，我已经陷进去了”。我说：“逃跑吧”。“怎么跑？不准单独外出，能往哪儿逃？”我说：“那你自杀吧”。“不给我们武器”。我说：“哎呀，你们这算什么？帮德国人干活，反过来对付自己人，连枪都

37 伊萨尔河畔莫斯堡位于慕尼黑北边，建有 Stalag VII-A 战俘营。

不给”。他说：“不仅如此，生活待遇也是士兵标准：一天三根烟”。因为当时在后方的士兵一天三根烟。马雷什金也来过我这儿。

K. M. :他是什么人？是您的参谋长吗？

M. Ф. :是参谋长。有文化，工作节奏比较慢，但很有文化。

我对他说：“你怎么也被卷进去？”他说：“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鬼知道为什么！我不能说我反对苏维埃政权，也不能说憎恨它。我只是很委屈蹲过监坐过牢”。“你毕竟被放出来了，有些人到现在还没出来呢”。他说：“大家都晋升将军了，没我的份”。我说：“我已经帮你打过报告了，说不定你现在已经是在将军了”。



（时任第57特别军参谋长瓦西里·马雷什金1938年8月被指控参与反苏阴谋和间谍活动，遭受刑讯拷打，审判时当庭翻供，案件发回补充侦查。1939年10月获释，1941年7月开始担任第19集团军参谋长，10月24日被俘。他在囚禁期间投靠德国，成为弗拉索夫的亲密助手之一。1945年5月被美军俘虏，1946年3月移交苏联，同年8月1日绞刑处死。）

K. M. :他当时什么职务？

M. Ф. :集团军参谋长。

K. M. :您的集团军？

M. Ф. :对。原来是科涅夫的，转给我。

K. M. :他也是维亚济马战役被俘的？

M. Ф. :和我一起，只是地点不同。

为了不再多谈他，我补充一句：他后来又到医院探望我，我说：“你又来找我做什么？”“来谈谈心嘛。你负伤了，可你没屈服，坚持住了”。“谁逼你了？没人硬拽你去吧。你知道，他们也邀请过我，弗拉索夫亲自出面”。他说：“我知道”。“那为什么我没去而你去了？谁逼你的？”“委屈，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什么委屈？你说不给你将军衔，但你当时是集团军参谋长啊。你如果做了将军，完全可以指挥集团军，甚至做方面军参谋长。你是个有文化的人，怎么会这样？”“反正就这样了，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逼的我。我还有家庭呢，家人估计也被抓了”。我说：“很可能被抓了。你是祖国的叛徒，你早该想到”。他说：“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真假，也不敢肯定——我们派代表团去巴黎拜见俄罗斯皇位的摄政……”我问他：“这是德国人怂恿的吧？”他说：“大概吧。跟我没关系，弗拉索夫去的，估计是奉命而为，我不认为他自己想去”。代表团到了之后，请侍从通报，侍从出来说：“俄罗斯皇帝陛下命令我转告：他与祖国的叛徒毫无瓜葛”。“是沙皇说的？”“对，沙皇说的”。我说：“你看你们混的！连沙皇都说你们是叛徒”。“所以我才来找你谈心啊”。我说：“我无话可讲了，能说的都说了——你自杀吧，跳楼，怎么都行，但别再做龌龊事”。“一切都完了，我也明白，全完了”。后来弗拉索夫又派两个副官来找我，询问我，他能为我做些什么。

K. M. :弗拉索夫本人没来见您吗？

M. Ф. :我忘了说。他来过，不是在乌斯特拉夫，是在附近的齐岑戈斯，在那边筛选人员。弗拉索夫来了，同行两个人：一个是陪我出院那位，你还记得吧，另一位是不会说俄语的德国人——也可能说但假装不会。全程都是弗拉索夫和前一位发言。我认识弗拉索夫，他原先是第99师师长，这个师在1940年拿了工农红军比武第一名。后来，听说他在基辅、莫斯科附近指挥集团军表现出色，所以作为优秀的集团军司令员被派去指挥第2突击集团军，向西北方向突破。

人家说他主动投降，这不是真的。据他自己讲，他在森林游荡三个月，他们那一队有人掉队，想必是招供出来“这儿有个将军”，就把他抓住了³⁸。

K. M. :您以前和他私下接触过没有？

M. Ф. :没有，仅仅在四零年或四一年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见过。我一眼认出他，高个子，穿便装大衣。他从衣兜掏出一张纸给我：“看看吧”。我一看，纸上写着：“斯大林、全体政治局和政府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我，某某，正在组建军队。德军司令部允许我征召苏联前战俘组建军队，我要去解放祖国。”

我说：“从谁手里解放？”“嗯？从谁手里？你知道咱们是什么体制”。我说：“我知道，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你当了将军。和平年代你是师长，后来指挥第三集团军³⁹，国家信任你。你保卫过莫斯科，而且保卫得很好。如今你却想……”“所以我才第一个来找你。因为你是老资格将军，先邀请你”。我说：“不是你邀请，是他⁴⁰邀请，因为他知道我在军中比你有威望。我管过干部，在哈尔科夫独立师做了十年师长，还做过莫斯科卫戍司令。和平年代我是集团军司令，全军都知道我，至少高级指挥层认识我。所以他们让你来找我。不是你想来，是他们叫你来”。

K. M. :他提议您率先签字？

M. Ф. :是的。“你先签个名吧”，想让我第一个屈服。

我说：“弗拉索夫，我懒得深究你怎么拿到党员证的，也不管你内心怎么想的，但你要明白——你这是带领俄罗斯人打俄罗斯人！你说什么解放俄罗斯！你在他们的战俘营待过，亲眼见过他们怎样对待我们。你看看——那边德国兵打俘虏呢”。我们说话这会儿，德国兵正在打一个俘虏，就因为那人用手指鼻涕。可是谁有手帕呢？我们的习惯就这样。在战俘营打人很常见——有理由打，没理由也打。我说：

“不行，弗拉索夫。我不签，也不主张你签。别做犹大，会遭人咒骂，你懂不懂？”他开始对我讲：

“你知道库尔布斯基⁴¹是怎样对待伊凡雷帝的……”我说：“那能一样吗？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那个人也是叛徒。就算伊凡雷帝对待库尔布斯基不公，可他仍然是带领外国军队攻打祖国。你现在也一样。你听说过吧：‘餐馆只准德国人进，厕所只准德国人用，这个、那个仅限德国人’，一切都是为德国人准备的。你想必听说了他们怎样对待我国人民。你在战俘营亲眼所见：一个营原本有二十万人，第二年年底只剩几万人。那么多俘虏去哪儿了？怎么死的？我现在坐在这儿，外头就有浮肿的人摇摇晃晃。为什么会这样？不给饭吃、挨打、重体力劳动。根本不算什么劳动，把院子这边的石头搬到那边，再搬回去，累瘫为止。这些事你全知道，为什么还要参与呢？”

那个德国人说：“你别嚷嚷，喊什么呀？”但我非喊不可，因为隔板那边坐着我的同志们，我要让他们听见我怎么谈的。

弗拉索夫对他说：“你看，找过卡尔比舍夫——没答应，斯涅戈夫也没答应。卢金不愿意，波涅杰林也不愿意。波涅杰林已经被我国宣布为人民公敌了，仍然不同意”。我说：“你竟然去游说苏联将军投降，不觉得可耻吗？德国人还没开口呢，你算什么东西……”

德国人朝我大吼：“够了！你会后悔的。你大概出不去这个营了。知道把你送哪儿吗？”我说：“你别吓唬我，别拿死亡威胁我。我什么都知道，不怕你们动手”。他们就走了。

K. M. :弗拉索夫是惊慌呢，还是焦虑、急躁？

M. Ф. :他没有信心。我还对他说了别的——谢谢您提醒我。我说：“你是不是以为他们傻？现在让你组建军队，万一哪天形势变了，你再调转枪口打德国人。你以为他们会允许吗？我不想当预言家，但充其量同意你组建一个营、一个团。相信我，军队肯定是德国人自己指挥，你们不过是跑腿传令的”。

后来果然如此。有一些独立营，但真正成建制的只是哥萨克部队。营长是德国人，副营长是俄罗斯人。连长、副连长、排长、副排长，一直到班长都是这样。

过后他又派两个副官来询问能帮我什么。我说：“帮什么？我不需要他帮助。这种帮助是德国人的帮助”。我还说：“你们两个年轻人，一个中尉、一个上尉，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你们生在苏维埃政权下，苏维埃政权培养了你们，教你们说德语。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他俩哭了。

您刚才问在哪儿抓住弗拉索夫的。各种说法都有，都说自己亲眼所见。

K. M. :我可以拿文件给您看。有关于他怎么被俘的报告。

M. Ф. :这就有意思了。人人都在写，人人都撒谎，关键是人人都自称目击者。我再没见弗拉索夫，也再没见过马雷什金。

K. M. :他大概气坏了：这人也不签、那人也不签……

M. Ф. :对，对。“这事儿太难办了，都来催我，可我太难了，没人同意签名、没人同意加入……”

38 有研究称弗拉索夫和战友进入列宁格勒州图霍韦日村找饭吃，被村长发现，叫来当地的辅助警察，继而德军识破身份。该村长收到德军赠予的一头牛、烟、酒和荣誉证书酬谢。

39 原文如此，疑有误，似是“第四机械化军”。

40 指陪同的德国人

41 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公爵是十六世纪俄罗斯大贵族，曾是伊凡四世的好友，因受猜忌逃向立陶宛，率领波兰立陶宛联军入侵俄国。

有一次把我从一个战俘营转送另一个，或者是去医院——我经常被送医院，因为伤口反复裂开——在其中一个 Stalag 营我遇见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卡尔比舍夫⁴²。一见面，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他说：“快了，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有事要发生了，因为有人来找过我，提议让我领导一支什么军队。你记住并且转告其他将军，不要参与”。我说：“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你说什么呢！你居然怀疑我会答应做这种事！”“你记住就行！提醒其他人别答应！”他们已向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提议了，弗拉索夫也说过，对我证实过。

K. M. : 卡尔比舍夫身体还行吗？

M. Ф. : 还可以，看起来挺好的。胡子干干净净，穿自己的将军服，虽然破旧了。但他精神状态很好，毕竟那时候他已经上年纪了，老人更难熬。必须是身体健康的人才能扛过去。

K. M. : 您进入那个关押将军的营地，穿自己的衣服吗？当时是怎么回事？

M. Ф. : 我躺在野战医院的时候，女护士们——您还记得我说过吧——把我的军常服剪开了，然后剪掉一只袖子，不剪不行啊。等我稍微恢复一些，问医生说：“能不能给我缝一只袖子？”她们就给我缝了一只德军制服的袖子。所以我一边袖子是自己的，一边是德国的。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关押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营地，这个地方也值得讲。我们和普罗霍罗夫在一块，几乎一直在一块。我请求不要把我們分开，因为他们总想隔离我们——孤家寡人更容易被说服。我坚持要和他在一起。

咚咚敲门，进来一位仪表堂堂法国人，用纯正俄语说：“你们好，将军阁下”。“你好，先生”。他说：“我不是先生，我是俄罗斯人”。“那您为什么喊我们‘阁下’？我们的称呼是‘公民’、‘同志’。您也是俘虏，是我们的盟友”。“是的，我是俄罗斯人。我是移民的儿子，小时候就出国了。我父亲是上尉，普通人，把我也带出来了。我现在是法国陆军上尉，成了俘虏。我是这个营地负责的，我来告诉你们，面包、糖、奶油，要多少有多少”。我们说：“谢谢好意。能不能给点土豆啊？”他说：“土豆也有”。所以在那个营地，土豆和糖想吃多少吃多少。

忽然有一天送来一个箱子，底部是锥形的，画着一头公牛。有肉啦！我和普罗霍罗夫太久没吃肉了！于是用土豆煮了漂油花的汤。他一下子吃光，我分成三顿吃。还给我们送了巧克力、各种糖果，我都收起了，总觉得以后可能更糟。那么我把它们藏哪儿了呢？

【录音缺失】

那个营地还有意大利人，叛变的意大利人被抓来坐牢。他们的处境太糟糕，天寒地冻，那年冬天真他妈冷。

K. M. : 德国人对他们不好吗？

M. Ф. : 比对我们更差。我们起码有一碗稀菜汤喝，他们两天不给任何吃的。住帐篷！我们好歹住在板棚，他们住帐篷，冬天！衣服可单薄。惨啊，太遭罪了。还要挨炸弹。

有一天那位法国人来了，他经常来看我们。日后我找过他，好像姓列别杰夫或者什么，我很想找到这位伙计。他来了说：“你们怎么穿成这样？去要意大利人的军装吧。他们死掉不少，衣服都脱下来收着，埋人的时候不穿军装”。“您怎么知道？”法国人说：“我们负责埋他们”。

那么我就去要了。他们带我进仓库，我选中一件几乎全新的意大利军常服，还有意大利裤子，又拿个手提箱。手提箱是包铁皮的，我觉得将来可能有用，顺手拿了。

回屋穿上新衣服，感觉别扭。外国军服，什么玩意儿。很不愉快。这时敲门声响，俄罗斯裔法国人又来了：“哎呦，换衣服啦”。我一看，他满眼欢喜，感觉他中意这身衣服。裁剪确实不错，面料也好，显然是高级军官的。我说：“咱俩换换吧？”法国人平时穿迷彩色夹克，我想他如果愿意换给我，我穿更合适。他说：“我很乐意，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我故意逗他：“这衣服你恐怕穿不了啊”，实际是让他别改主意，“我脱下来你试试吧”。他一试正合身，说：“我给您送件新的，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

法国人有工装也有便服，是他们自己国家寄来的。他送我一件全新法军夹克，没有任何军衔标志，干干净净，还有裤子……

K. M. : 散腿裤？

M. Ф. : 不是，他们的裤子这边窄、这边宽……

K. M. : 塞进靴筒吗？

M. Ф. : 不塞，他们好像打绑腿。我说：“我要这种裤子干嘛？我需要散腿裤”。他说：“送给裁缝就能改”。于是交给裁缝，很快改好，在这个位置加了三角布片，变成散腿裤。我穿起来体面多了。

我回到金茨堡。德国人来了，说：“去有收音机的房间，听广播”。我们不愿去，但他们硬把我们撵去，大家都聚在那个房间。弗拉索夫开始广播了，说他成立委员会，类似临时政府，还要组建军队、解放祖国。有人叫喊几句，德国人立刻过来呵斥：“闭嘴！”就完事儿了。

一周后来了一位上校，我忘记他姓什么。这位上校，他后来也被绞死了，好像是第32集团军的，是不是布什马诺夫？以后再想想。他到我们住的城堡叫人：“斯涅戈夫！”

⁴² 工程兵中将德米特里·卡尔比舍夫1941年8月在白俄罗斯受伤被俘，1945年2月18日夜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遇害。



(卢金的记忆有误。第3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尼古拉·布什马诺夫1941年10月被俘，在战俘营组织并领导地下反纳粹组织。1945年4月被美军解救，移交苏联，判10年劳改，1955年10月重获自由，到机车修理厂上班。1958年9月平反后在苏联国防部档案室工作，1977年逝世。但即使平反，苏联国安委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仍坚称布什马诺夫“曾在德国学校培训宣传员”。)

K. M.: 他穿敌人军装来的?

M. Ф.: 穿着。他喊:“斯涅戈夫!”斯涅戈夫不动。“某某!”——也不动。我们不跟叛徒说话。又喊:“某某!”——还是不去。我心想,他们为什么不去?怕什么?只要站稳立场就不会玷污自己。

“卢金!”我说:“我来啦”。大家嚷嚷开了:你竟然去跟叛徒谈话!我说:“怎么不能谈?我听听究竟什么事”。我就去了。

到了他那儿,他在抽烟,递给我一根,我点上。他说:“广播讲的,你们听到了吧?”我说:“我比你早知道啊,上校先生,组建军队的事,弗拉索夫来找过我,我早知道了”。我又说:“你真不要脸啊!你可是苏联红军的上校!将来能当将军,说不定当元帅呢。你以前职位那么高”。他说:“如今说这些太晚了,将军阁下。还是谈点儿实际的吧……”

K. M.: 他叫您“将军阁下”?

M. Ф.: 将军阁下。我说:“咱别谈这个了,我希望您别做齜齜事。您想想,就快收场了,都四四年了。战争即将结束,您也看见我们几乎解放全国。这事您不明白吗?您要走向何方?是会有人跟您走,但那是些什么人?有人的亲属在苏维埃政权下受了委屈,被逮捕或被剥夺财产,这样的人我们这儿不少;还有阶级异己、盗贼,他们以前在边境劳改(边境的劳改犯一开战就被俘虏了,成千上万)。就这些败类、叛徒、卖国贼会跟着您。您带领他们回到祖国,去杀我们正直的人民。您想过这一点吗?您知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多么肮脏的事?”

我也挺幸运,一个被扣留的船员炉匠正蹲在旁边修炉子。后来伙伴们跟我说,那人高兴得跑出去,满脸激动说:“看啊,给我们送来了多么厉害的将军!”把我的话学了一遍。我开始收到纸条:“谢谢,将军同志,感谢您捍卫我国、我军的荣誉……”

K. M.: 其他人没去跟他谈?

M. Ф.: 除了我没人去。我一个人去的。

忽然有一天送来一位中校,穿军装、戴肩章。我们那时还没见过戴肩章的苏联军官⁴³。大家都挤到窗边看,但德军不准——会开枪打,从侧面悄悄看还行。来的是高大魁梧小伙子,飞行员,中校,苏联英雄,列宁勋章、红旗勋章,还有一枚什么勋章。

K. M.: 都戴着呢?

M. Ф.: 对,都戴着。

43 伟大卫国战争之前的苏联宣传把肩章称为“反革命军官”的象征,只用领章。1942年夏季红军和红海军筹备恢复肩章,1943年初军人开始佩戴。

K. M.:被击落的吗?轰炸机?

M. Ф.:是的。他姓弗拉索夫。哪个弗拉索夫?他曾经是斯大林儿子瓦西里·斯大林所在航空团的中队长,还是斯大林女儿订了婚的未婚夫。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个头高大,胸膛宽阔。有一次散步,他走到我身边说:“将军同志,我想和您谈谈”。我回答:“为什么找我呀?我们这儿有资格更老的将军”。我指的是穆兹琴科将军⁴⁴。



(卢金记忆有误。尼古拉·弗拉索夫中校是功勋战斗机飞行员,获金星奖章、两枚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和“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1943年7月被击落时在第275战斗机航空师。曾多次尝试越狱,成为战俘领袖之一,1945年1月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被德国人施以酷刑烧死。他不是瓦西里·斯大林的同部队战友。根据公开资料,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恋爱和结婚的诸位男性没有飞行员。)

K. M.:为什么说他资格老?军衔吗?

M. Ф.:不,我俩军衔一样。

K. M.:是按授衔时间算的吗?

M. Ф.:我授衔比他早几天。但他比我先到这个战俘营。我不想参与这些事,我图什么呢?

他说:“将军同志,我听人建议来找您的,尤其一些船员”。“什么事呢?”“我们去一边谈”。我们走到旁边。“我和船员早有书信来往,想借他们的帮助越狱”。“从这儿怎么越狱?”“您先听我说……”他就开始讲越狱逃跑计划。我说:“在我收到他们的答复之前,我写,您转交”。他们有约定好的放信地点,我们把信放过去,他们回信。于是收到答复:是的,弗拉索夫和某某、某某,我们会提供什么什么协助。就这样。

弗拉索夫开始装病。我们这一组俘虏有个小房间,医务室放两张床预备万一谁生病。里头有个大夫,姓杜布罗夫斯基。弗拉索夫需要给杜布罗夫斯基下安眠药。

K. M.:杜布罗夫斯基是战俘吗?

M. Ф.:是战俘。

K. M.:是个不可靠的人?

M. Ф.:没人知道。

K. M.:下药以防万一?

M. Ф.:免得他碍事。那个房间有暗门通向另一个房间,过去可以找到船员,再从船员那边走向厕所。厕所窗户的栅栏已经锯断,掰开铁条就行。等哨兵转过拐角,人就钻出去下到壕沟,那边有个在锯木厂工作的海员,夜晚不离开,他会放下绳梯,顺着绳梯爬上去,接下来怎么走就由你决定了。

我仔细推敲过,表示看起来应该行得通,但得考虑周全。例如你不能穿身上的衣服出去,必须换一件。他说:“已经有了,船员给我找了便装”。于是我同意了,说:“弗拉索夫(他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有件事你必须记住: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哪怕老将军也不行。知情者越少越好”。但又一次散步时他告诉我:“我把情况告诉老将军了”。我说:“不该啊”。“为什么?”“我没有任何证据说这位老将军会出卖你,但他身边有个人我信不过,就是萨莫欣将军”。

此人原来是情报局的首长,后来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坐飞机上任。他随身携带从白海到黑海的我军部署地图,详细到每个团。飞行途中遭遇暴风雪,他们迷失方向,迫降在某个德军机场。他说他把地图烧掉了,但风急雪骤,很难快速烧掉那么大尺寸的地图。何况德军一看见飞机降落就冲过来,他的说辞实

44 伊万·穆兹琴科中将,第6集团军司令员,乌曼战役兵败被俘,1945年4月被美军解救。他和卢金同为1940年6月晋升的中将,年龄比卢金小九岁。

在不可信。最糟糕的是，他在希特勒的大本营、在德国情报部门待了三个月。日后发现他同意为德国人工作。老将军跟这号人物有牵连，让他知情很不合适。我的担忧果然被证实。弗拉索夫假装生病，被送进医务室。他喝茶的时候偷偷往医生的茶杯放了安眠药。事后他留纸条给我：“我感觉到他在克服困意，我知道他应该昏睡了，但他有意识地抗拒睡意不躺下。等他终于熬不住，我走到门边，脚踢砖头，砖头松了，那边的砖已经有人拆了，我钻出去……”岂料那个从来无人的空房间竟然有个战俘或在押人员，不是海员，也不是我们苏联人，是犹太人。拆砖的时候医生醒了，喊叫俘虏越狱。警报拉响，探照灯亮，狗开始狂吠。我们当时都没睡，因为知道有人越狱。总之，全完蛋了。弗拉索夫被抓。



(时任第48集团军司令员亚历山大·萨莫欣少将1942年4月21日飞往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部，因飞行员失误飞越前线，被德军地面炮火击落。根据后来获救的机组成员及萨莫欣本人的证词，他试图烧毁文件并自杀，但手枪走火，被俘。他在审讯时回避关键问题、编造虚假信息，仅供述德军已掌握的情况。1945年4月被美军解救，12月在波多利斯克甄别营被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机密”。苏联国家安全部曾建议斯大林释放萨莫欣并结案。1952年3月被判处二十五年监禁，次年7月出狱，恢复被剥夺的军衔，到莫斯科国立大学军事系任教。1955年7月逝世。)

K. M. :他来不及逃出去？

M. Φ. :他刚跑进厕所就被抓住。他们原本是三个人一起逃——两个船员和弗拉索夫。船员跑了，弗拉索夫被抓。

弗拉索夫被毒打一顿，锁在我们楼梯下面。第二天早上带他去放风，我见他腰带没了、勋章没了，金星⁴⁵也没了。因为不准靠窗看，我只能贴边观察，见他一直盯着我的窗户，就是我平时站的地方。我挥挥手帕示意“看见你了”，他跺跺脚，我明白他把什么东西藏在那块石头下面。轮到我放风，我过去掀开石头，果然有张纸条，写着：“将军同志，您是对的。我们被出卖了……”接下来简单描述事情经过，“金星在土底下，您收好。如果您能活下来，请带给我父母，转交相关的人”。我把金星缝在这儿，裤腰这儿。他父母找到我，我把金星拿给他们看，讲了我知道的他们儿子的情况。金星我后来交给干部部，现在还在那儿。

K. M. :他死了吗？

M. Φ. :起初他被送到纽伦堡，在那儿遇见了本来准备和他一起逃跑的难友，是个油漆工。对了，他留给我的纸条还写道：“无论如何，只要我活着就会再试一次”。后来被送往萨克森堡战俘营，再次尝试越狱，又被某个败类出卖，在那儿被枪毙。

德国人很清楚，此事肯定有船员参与，必须交出来。如果某个时间之前不把人交出来，每五个枪毙一个。

K. M. :不交出谁？

M. Φ. :想逃跑的人。

K. M. :船员一个也没逃出去？

M. Φ. :无人能逃，因为狗、哨兵、警卫全冲出来了，已经不可能逃了。

当时西索耶夫、列昂诺夫和马拉卡索夫来到委员会——他们那边的党委还在，就像在部队一样，当然，是在地下秘密活动。他们来了说，我们没有子女，我们自首吧。其中一位就是没跑掉的那个人。他们说我们无儿无女，没什么可失去的。委员会决定：可以，你们去吧。他们供出自己，被从战俘营带走了。他们现在都还活着。

K. M. :真了不起啊!

M. Ф. :船员都是好样的。他们帮了我们大忙，给我们送面包、土豆，省出自己口粮接济我们。您知道他们把东西藏哪儿吗？藏在厕所，经常泡在尿里。有时候厕所满了，挂的地方都没了，搞得脏乎乎。我们把东西洗干净，照样吃。船员是好样的！了不起的一群人。他们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巨大支持。

第四次采访

M. Ф.: 我们开始收到美国、英国飞机撒的传单，是那些被派去老百姓家干活的战俘捡回来给我们的。传单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联名签署，写着：“每一位战俘的生命不仅由营地指挥官——上级负责，也由看守营地的每个德国士兵负责”。

我们从这些传单中察觉到，以及只要白昼天气晴朗，美国和英国的飞机就能毫无阻拦地在空中飞行，甚至单机飞行，德国飞机根本不见踪影，我们知道战争快结束了。

更早的时候我跟您说过，那些被扣押的我国船员外出劳动时偶尔带回一些报纸。德国人的报纸写道，他们正在东线“弹性防御”——我们当然明白“弹性防御”是什么意思——还说他们实行焦土政策。我们知道这意味着德国人在边烧边撤退。种种迹象使我们意识到战争即将结束。

一些战俘帮农民干活，偶然偷听广播得知英美军队已经在诺曼底海岸登陆，战斗十分激烈。形势一度陷入僵局，德国人语无伦次地说空降到德军后方的伞兵部队陷入困境。之后东线突然发动进攻。由此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我们苏联军队和政府对策陷入困境的英法盟军。

K. M.: 请问，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德国官方给过您报纸吗？

M. Ф.: 都是战俘捎来的。

K. M.: 没提供过，你们是偷偷搞的？

M. Ф.: 从来没人正式发给我们。我们收到过那些为德国人效力的白军分子和所谓“德意志民族”办的小报，他们搞了个报社，叫什么我忘了，只给这一份看。

K. M.: 俄文的吗？

M. Ф.: 俄文的，专门给战俘看的。纯粹宣传性质，肮脏下作。当然，它绝不会写真实情况，但我们心中明白。被拘禁的人帮我们搞了地图，我们甚至在上面做标记。

K. M.: 德国地图吗？

M. Ф.: 德国地图。我们用它做标记，当然，只是大致方向，无法准确。有一次我们外出放风，德国人挨个搜身，把地图没收了。凡是对我们有点儿用的东西一律没收。

K. M.: 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吗？

M. Ф.: 没有。

K. M.: 空投传单已经在威胁看守战俘营的德国兵了，他们的态度有没有变化？

M. Ф.: 没变化，一切照旧。有一天，营地副主任，少校，走到我们这儿，情绪十分低落，我们一眼就察觉了。顺便说一句，他对我们不算太坏，属于很普通的德国人。战俘营正主任是上校，姓名我忘了，大坏蛋。

这个少校一进来我们就感觉他情绪不好，满面愁容不说话，他平时挺健谈的。我们问：“怎么了，主任阁下，您出什么事了吗？怎么情绪这么差？”其实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儿子在斯大林格勒阵亡了。

K. M.: 他不年轻了吧？

M. Ф.: 年纪挺大。他的孩子们都上战场了，他大概六十岁左右。他说：“我心情糟透了，你们的军队已经进入东普鲁士，我的第二个儿子失踪，一直没写信回来，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我们就安慰他，说战斗正在进行，孩子可能太忙没时间写，或者邮路不通。他说：“不是，我们的邮局运转良好。看来不是被俘就是战死，没别的可能”。

我们开始听见西边传来炮声，尤其傍晚时分，能听见某个方向正在激烈战斗。

K. M.: 这个战俘营距离哪个大城市最近？

M. Ф.: 纽伦堡。

K. M.: 不远吗？

M. Ф.: 大概六十千米。我们问了德国人——那些审查我们的人，当然是盖世太保……某个管我们的上尉是盖世太保，士官——连长也是盖世太保。

K. M.: 主任不是盖世太保吗？

M. Ф.: 不知道他什么身份。我们问：“这是什么炮声？”“空袭”。但我们知道这不是对空的高射炮响，是地面战斗。一些部队——美国人或英国人——正从西边向我们推进。后来，夜间甚至能听到机枪扫射。少校忽然来了——不是主任，是副主任——他说：“先生们，营地要后撤。病人和伤员可以留下”。

我们已经在商量战俘营撤离时怎么逃跑、谁会来看守我们等问题。讨论了很多，大家都在想怎么办。我是重伤员，另外两人也是伤员，其中一位是第5集团军炮兵主任索京斯基少将，他得了腮腺炎，跟不上行军。

K. M. :他病了?

M. Φ. :生病了。另一位身负重伤的将军也送到我们这儿,他姓……刚刚想起来,这会儿又忘了。

K. M. :他一直没好起来吗?

M. Φ. :没有,他一直重伤卧床!其他人可以跟着走。人家劝我:“卢金同志,留下吧。过几天美国人来了,给你吃巧克力、喝咖啡,他们会喂饱你的。很快就回家了”。我说:“不,我不留下,我要跟你们一起走。你们不想让我妨碍你们?想在途中逃跑?尽管跑,丢下我,我不拦着。别担心我,但我不想自己留在这儿。死我也要跟你们一起死”。他们反复劝我:说我会拖累大家,这个那个的,我表示绝对不妨碍你们,你们有行动自由。别担心我。

然后副主任来了。我们告诉他,战争快结束了,如果你们现在对我们人道一点,将来我们会在什么地方帮你们说好话,说你们优待俘虏。

K. M. :他怎么说的?

M. Φ. :他说:“我尽力而为”。给我们安排了一辆马车。最前面是船员队伍,后面是我们所有能走路的人,包括将军、少校、中校、上校,马车拉着大家的行李,让两个走不动的:我和第6集团军司令穆兹琴科中将坐车。

K. M. :他也病了?

M. Φ. :腿震伤了,拄着拐杖挪步。我们到地方以后,给他做了截肢。

这次转移途中我们遇见德军部队。您知道吗,有时候敌人也会让令人佩服。一群年轻人,敞着衣领、挽着袖子、唱着歌。已经濒临灭亡了,这些部队依然按照条令列队唱歌行进。当然,他们一见我们就认出是苏联战俘——显然是苏联人,因为穿我们这身打扮的不可能是法国人、英国人,更不可能是美国人。他们恶狠狠叫骂:“还照顾他们做什么?带他们去哪儿?他们有什么用?毙了吧!”态度咄咄逼人。

K. M. :但毕竟遵守纪律,动口不动手。

M. Φ. :同为军人,我不禁感到钦佩:军队即将崩溃,国家实际上走向覆灭,队伍依然纪律严明、行动有序,没人垂头丧气。他们不是一副被吓破胆、灰溜溜的样子,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感觉到了,但不表现出来。我们在一个村庄停留,村名不记得了,停了一夜又一天……

K. M. :你们一共多少人?

M. Φ. :我们大概二百人,外加船员四五百。

K. M. :将军几位?

M. Φ. :二十七。将军和旅长,有几个旅长也是将军衔。

少校来了。我们已经见不着主任了。少校来了说:“先生们,你们感觉到前线逼近吗?”我们白天也能听见机枪响,前线一直在逼近,推进速度很快。他说:“我可以帮你们找辆一吨半卡车,能都坐进去吗?”二十七人,加二十个看守,我说:“能坐得下”。

我不知道怎么传来的消息,是看守透露还是其他渠道,我没细问,只是听说我们离开战俘营之后,留下的两位将军——那位重伤员和得了腮腺炎的索京斯基将军——我们刚走,盖世太保就来了,问在哪,有人指了指,于是把俩人扛在肩上,抬到城堡外面、监狱外面,枪毙了,搬石头压上。不是挖土掩埋,直接用石头压住算完。

我对自己说:“这事注定会发生。没有看守、没有上级,随便一个德国人都能对我们为所欲为”。我当时就像有预感:绝不能留下。

K. M. :日后证实了吗?

M. Φ. :都证实了,把他俩重新埋葬。我们坐上卡车,船员们和我们分开走。

K. M. :军官也坐车?

M. Φ. :也上车了。只拉将军和看守,像麻袋一样被塞进后车厢……

K. M. :一辆车?

M. Φ. :一辆车!我们二十七人,看守二十人。德国人全喝醉了,身上酒味冲天,两边挤着我坐。我忍着,心想,什么也别说了,不是我自己受苦,大家都在忍。问他们:“带我们去很远?”“不远不远,就在附近。莫斯堡市,开车最多三个小时”。

结果开了一天一夜,还在路上。看环境是往山区开。嗯,开始感觉不对劲了,怕是要拉我们进山枪毙。心情嘛,不得不说,很压抑。熬过战俘营,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不光彩地死掉,说实话真是不甘心。

天亮开到一个战俘营,一看就是——铁丝网围着呢。听见俄语国骂,知道是到了自己人身边。

苏联战俘跑过来看我们——怎么回事?我们说:被带到这儿了,这是什么地方?是国际红十字营,各国战俘集中在此。有两个管事的,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都是上校。德国人已经把把这个营地移交国际红十字会。

K. M. : 以前是德国的营地吗?

M. Ф. : 原来是德国的普通战俘营。我们说: “想办法通知两位上校——英国人和美国人”。“可我们出不去啊, 铁丝网挡住了。其他国家的战俘都在一起, 唯独我们苏联人单独关在铁丝网后面”。

K. M. : 你们只是在这儿临时停留吗?

M. Ф. : 只是停一下。德国人大概有什么事要办, 可能加油吧, 我不清楚。我们被安置在一间板棚。我国战俘设法报了信, 进来两位高大健壮的上校, 英国人和美国人。我们都不懂英语, 他们也不会俄语, “固特-固特, 固特-固特”, 瞎聊几句, 瞅瞅我们, 摇摇头。他们本以为会见到将军, 谁知眼前是一群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老老少少。他们看了又看, 摇摇头走了。半小时后, 我们板棚门外站了哨兵, 英国兵和美国兵。

K. M. : 没枪?

M. Ф. : 带枪。我们正在奇怪: 为什么看守我们? 结果发现这是有原因的。德国人来了: “俄国将军, 出来!” 哨兵拦住他们不让进。德国人叫骂, 我们在屋里听着, 这才明白为什么派哨兵站岗——防止德国人把我们拖走。他们肯定想枪毙我们, 都已经送到这个营地了, 接下来还能去哪儿?

K. M. : 看来最好是扣住你们不放。

M. Ф. : 那当然, 尤其是已经把营地交给红十字会了。营内其他军官随后出现, 带着翻译, 问我们: “你们需要什么?” 我们说, 首先需要衣服。“固特, 固特”。但人家不说“固特, 固特”, 而是……怎么说来着?

K. M. : 一个意思。只不过德国人说“固特”, 这些人说“固得”。

M. Ф. : “我们需要衣服; 连内衣都没有。然后也想吃点好的”。他们待了一会儿, 看看情况。片刻, 看见士兵推来装满军服的双轮车。他们把车推到窗前, 敲敲玻璃——来拿吧。好吧, 我们都换上了新衣服。

K. M. : 军服是英军的还是美军的?

M. Ф. : 美军的。没让我们签收据, 什么都没说。有保暖内衣、袜子和其他一切东西。之后又给我们送来包裹, 打开一看,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 您是不知啊, 眼花缭乱。罐头、黄油、饼干、香肠。亲娘啊! 打开一个, 再开另一个——几乎没区别。我心想, 见鬼, 为什么全送一样的? 不过说实话, 有些人吃撑了, 因为一下子吃太多, 忘记身体已经不适应这种食物。好几个人感觉很不舒服。

第二天——放炮。某个炮兵连打了几颗炮弹, 机枪也响了, 子弹甚至飞进我们营地。转眼风平浪静, 大约一小时后进来一位美军将军, 是攻下莫斯堡市的师长, 来祝贺我们胜利并重获自由。他看见我们这副模样, 深感惊讶。

K. M. : 你们已经穿上美国军服了?

M. Ф. : 怎么看也不像将军。他巡视一圈就走了。第二天人们说德国人要离开, 他们会被俘虏。营区管理将是国际性的, 就是这些美国人、英国人等, 可能还有法国人。我们等着看德国人怎么变成战俘。

K. M. : 战俘营的守卫?

M. Ф. : 对, 这个战俘营的警卫部队。德国军官和士兵列队站好, 一名军官拎着两个手提箱走来, 下士立刻跑出队列, 敬礼, 接过提箱, 放在那位军官应该站的位置, 挨着他身边。都已经变成俘虏了, 军纪毫不松懈, 首长仍然是首长, 这让我很惊讶。之后他们被带走了, 士兵们又帮军官拎箱子。他们被带到什么地方我就知道了。

我们不少人去了莫斯堡。据说美国人纵兵抢掠三天, 具体发生什么不清楚, 听说是做了很多糟烂事。我们一些人也带回手提箱, 这不好。

还看见英军的苏格兰部队。大高个, 穿短裙。天气挺冷, 冻得腿发青, 虽然穿了长袜, 但膝盖、大腿露着, 短裙盖不住。我们看这副打扮挺稀奇的。

至于美英士兵对我们的态度? 没什么特别。一些人出于好奇来看俄罗斯人, 但没人表现喜悦, 比如“我们并肩作战”、“我们是盟友”这种情绪完全没有。如果我们解放了他们, 我们肯定要凑上去闲聊、称兄道弟。但这里完全不这样。偶尔来几个兵, 没有任何军官找我们。最后现身的是一位美国或英国长官, 我不清楚, 他说: “明天你们将离开。我们送你们上飞机, 去巴黎”。

第二天送我们上运输机, 飞巴黎。到了巴黎, 安排我们住旅馆。

K. M. : 巴黎有人迎接你们吗? 有没有我国代表?

M. Ф. : 我不敢肯定。也许有吧, 但我记得我们是后来才见到他的。之后会讲这事。

我们被分别安置在几家旅馆。我住进位于香榭丽舍大道的一个旅馆, 其他人在别的旅馆。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了。我住的旅馆有一位俄罗斯女人来找我们, 不知道她是管理员还是什么人。她来找我, 问我: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 请您给我建议。我爸爸妈妈在这儿, 他们以前住莫斯科, 叶洛霍夫斯基教堂

那一带。那边现在有座大教堂，我们都知道。爸妈想回家乡终老。您有什么建议吗？”我说：“这事我怎么出主意呢？您想跟他们一起回去吗？”“不，我不回去”。“为什么呢？不陪着爸爸妈妈？”“他们老了，现在不那么害怕了，我还想活下去”。我说：“您究竟怕什么？”“哎呀，就是觉得怕”。这是一位漂亮的开朗少妇。

K. M. :那时候的巴黎什么样？

M. Ф. :巴黎完全没被摧毁。已经是五月了，德国签了投降书。想象中的那个巴黎——光鲜亮丽的女士们之类——那时候不存在。服装都很简单，木底鞋，衣帽朴素。

K. M. :骑自行车的人多。

M. Ф. :跟整个西欧一样，老人小孩全骑自行车。

我们开始完全自由地行动。因为我们是法国战争部的客人，在军官食堂吃早饭和午饭，晚饭送至旅馆。面包非常多，我们第一次见识雪白雪白的面包，手一捏像棉花似的松软。

法国人对我们特别友好。服务人员也很友好，诚然，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把吃不完的面包分给他们。后来我们还把许多食品包裹送给法国服务员。相处很融洽。

法国人给我们发了衣服。虽然谈不上多么讲究，但也是干净体面的便装。破旧衣衫早扔了，现在换下美国军服，穿便装。

我们抵达的第二天，负责遣返回国的将军：我们苏联的德拉贡少将为我们举办宴会。大家吃饭、聊天。他为他认识的一些人订做了苏联军装，甚至缝了肩章。



(瓦西里·德拉贡，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官员，会说英语，曾任苏联驻英国军事代表团副团长、驻法国和意大利军事代表团团长。获列宁勋章、五枚红旗勋章、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等。1947年2月因“公务违规”被开除党籍，1961年12月逝世。)

K. M. :他是步兵将军吗？

M. Ф. :步兵的⁴⁶。

K. M.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那段时间您想没想过今后会怎样，战争结束了会怎样，被德国俘虏会不会有后果？

M. Ф. :当时完全没想。

K. M. :相互不交流吗？只是自己心里琢磨？

M. Ф. :那时候各自想各自的，很少交流。每个人都不爱表露自己。哦，关系亲近的人，比如我和普罗霍罗夫，共同经历了整个俘虏生活，我们坦诚相待。但没有这种广泛的交流。

K. M. :那您当时预计未来如何呢？

M. Ф. :我没抱好希望。我知道我们在芬兰被俘的官兵没有一个回家，统统送去砍树。跟我一起被俘的，我之前跟您讲过，和我一起躺在斯摩棱斯克医院那位，他就是负责押送我国被俘人员去伐木的人之一。

我自己没什么感觉，但很清楚我国对待战俘的态度，所以没指望自己能有好下场。

我们那儿有个人，姓萨莫欣，少将，我好像简单提起过。他喜欢横挑鼻子竖挑眼，当时我们在比克堡要塞，背靠背坐，桌子紧挨着，有一天正在闲聊为什么德国人坚持作战，事情眼看到头了，早就该投降，可他们还要打。我说，德国的铁血宰相临终遗言：“千万别跟俄罗斯开战”。他听见了，扭头质问：

“铁血宰相什么时候变成您的权威了？”我说：“去你妈的，你较什么真啊？”他说：“咱国家列宁、斯大林才是权威，您竟然引用什么外国权威！”

46 实际是坦克兵少将

还有别的事。我们这一队战俘归一个下士管，按规定要向他敬礼，他也确实是拿出长官的派头办事。我说：“如果我们也能给军队培养出像这个德国下士一样优秀的士官，那该多好啊！”“您又歌颂德军！又夸他们！您觉得我们处处不好！”我说：“这个德国下士怎么招惹您了？”

我不记得说没说——我从未站过队列。点名的时候我会出去，但坐板凳。我甚至从未向那个盖世太保上尉敬礼。他把我们的组长叫去——我们中间被指定了一位俄罗斯组长，以前是旅长。他说：“转告卢金将军，他不是亚洲而是在欧洲。他应该向我敬礼”。我答复：“如果上尉先向我敬礼，那么我身为将军，军衔从未被剥夺，更何况德国人也无权剥夺，我自然会还礼。礼貌归礼貌。但只要他不先向我敬礼，我就绝不向他敬礼”。反正德国人也没因为这事惩罚我。

在巴黎的时候，我们在城内游览。我印象最深的是先贤祠。我们还参观了拿破仑陵墓，用白色大理石和黄金装饰，士兵身穿他近卫军的制服站岗。这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法国人至今缅怀他们的皇帝。

人家带我们进剧院。巴黎有一家为俄罗斯移民开办的俄语剧院，听说我们是俄罗斯将军，一群法国人围过来，在小餐厅拿出伏特加和其他好酒款待，但我们谁都没喝。据他们讲：布柳门塔尔-塔马林曾来巴黎，想在这个剧院发言，但巴黎的侨民不让他开口。他刚要说话，被臭鸡蛋、橘子、各种能扔的东西乱砸，根本没机会发言。

法国人的风俗给我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大白天，离香榭丽舍大街不远、军官俱乐部食堂附近的一个公园，男女青年搂抱热吻、上下其手，毫不在意旁人，旁人也毫不在意他们。我们略感惊诧。

我跟你讲过，有两个阿塞拜疆人来看我，一个曾在俄斯特拉发的战俘营见过，另一个已经在这儿了，是那位全权代表，您还记得我讲过吧？他们来找我：“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带您去看红磨坊。如果愿意，还可以带您去更花花的地方”。我们说：“不必，去个差不多的地方就行”。于是去了红磨坊，观众主要是士兵——英国人、美国人，当然也有法国居民。

十几个甚至更多女孩登台表演，都很年轻，显然是黄花闺女，仅在关键部位贴了无花果叶子。唱唱跳跳，一转身，暴露无余。

K. M.: 呃，我听不下去了……

M. Ф.: 我就是说，您可以想象我们的观感吧？一个美国大兵把脚搭在前排座椅靠背上，人家把他脚推开，他又把另一只脚搭上。当众饮酒、抽烟，烟雾弥漫。我们心想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能在剧院做这种事？懂行的人告诉我们：“这很正常啊”。好，正常就正常吧。

接着上演了一部我国哥萨克生活的剧，展现哥萨克人怎样过日子。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情节完全是扭曲颠倒的。一些人后来又去了约会场所，里面有各种刺激表演，什么剪影之类应有尽有。我没去看，只是听说有这种地方，但没去。

巴黎几乎天天游行，全市人民涌上街头。某一天，我不记得哪天了，戴高乐现身香榭丽舍大街，我亲眼瞧见。他走在街上，人山人海围着他，身边一个警卫员没有。人群推挤他，有人和他握手，他就回应几句。民众高呼：“戴高乐万岁！戴高乐万岁！”在他们眼里戴高乐简直是神人。我们也知道戴高乐是民族英雄，领导了抵抗运动——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唯一发动起义的上校。而让我们惊讶的是，一位国家元首，居然毫无警卫、随随便便出现在人群中。我们对此不习惯。咱国家完全是另一回事。

过了一段时间，法国报纸大字标题刊出通知：“法国男女公民们！明天几点几分，曾在德国战俘营受苦受难的我国战士将抵达某某火车站，请大家迎接！”

我们说，去瞧瞧法国人怎么迎接他们的战俘。于是就去了。我们穿便装，但一说我们是俄罗斯人，人家就放行了。街头站满人，几乎走不动，我们慢慢挤过去，走上站台。站台还搭了观礼台。火车进站，原本是要举行欢迎仪式的，但火车刚停稳，车厢门一开，亲属们猛扑上去，拥抱、呼喊、欢笑、眼泪、歌唱。官方仪式办不成了，音乐响彻云霄。

我们站着观摩一会儿，都在沉思：将来怎么欢迎我们呢？有人说：“当然啦，亲属住在莫斯科或莫斯科附近的，肯定要来迎接啊”。我说：“未必吧。首先得报告：你，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卢金，是怎么被俘的？我必须解释清楚。你在战俘营做了什么？你表现如何？”“哎对，你总是……”——萨莫欣将军又挑毛病了，另一些人也这么说。但大多数人沉默不言。已经开始真切感受到离家不远了。思考着，那边情况怎样？

某天通知我们：莫斯科来人接我们。谁来了？一些军官。我们猜想来的肯定不是普通军官，不是部队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

K. M.: 那时你们已经在巴黎住了几个月吧？

M. Ф.: 大概一个月吧。感觉忐忑，心揪揪着。将要发生什么？不仅我一人担忧，大家都焦虑。一方面想回去，好像挺高兴，另一方面也想：之后会怎样呢？或许，最好不让家人知道？让他们以为你牺牲了，也就罢了。

德拉贡为我们设宴。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他请我们吃饭，现在是钱行宴。有法国白兰地，下酒菜很棒，还有伏特加，伏特加好像是咱国家的。我坐在桌子一角，对角坐着来接我们的少校。我问他：“您是哪位？”他说：“红军少校。”

K. M.: 他穿便装吗？

M. Ф.: 不，穿军装。全军通用领章。我说：“我当然看得出来您是红军，但您具体是哪儿的？”

С М Е Р Ш 的吗？”“С М Е Р Ш 是什么？”我说：“我们在这儿听说有个 С М Е Р Ш，但不知道是什

么。我们以前只知道特别处，知道有 М Г Б⁴⁷……”他笑了笑，说：“不，我们是部队的”。好，是部队的。继续喝。

您知道吗，那顿饭我喝了不少。我非常想喝醉，可是醉不了。神经太紧张，酒精不起作用。我提议：“来，咱再喝一杯”。“为谁干杯？”我说：“就像列先科说的：‘西伯利亚也是俄罗斯的土地’”⁴⁸。“哎，干嘛这么悲观，尤其是你？”我说：“什么叫‘尤其是我’？”“你有什么好怕的？”我说：“倒是不怕啊，就是想知道点情况——谁来接我们，去哪儿，怎么去？但眼下还不明朗，您也不会告诉我什么”。

我们一杯接一杯，我始终没醉。宴席就这样结束。

次日早晨送我们到机场。飞机已经准备好了，是我国飞机，我国飞行员。他们安排我们登机，运输机。

К. М.: 所有人都送走了？

М. Ф.: 都走了。

К. М.: 根据我看过的一些材料，好像波涅杰林是十二月才从法国离开的。

М. Ф.: 不对，他和我们同机返回的⁴⁹。没从莫斯堡战俘营回来的是加里宁，旅长。加里宁这人我早在波兰战役就认识，我是旅长，他是我手下的团长，二十年代的事。很多人知道他在战俘营表现不好，我们在莫斯堡的时候，一些将军报告说这个人需要特别对待……他感觉大家对他态度不好。



(第12集团军司令员帕维尔·波涅杰林1941年8月7日尝试突围，与尼古拉·基里洛夫少将同时被俘，8月16日最高统帅部第270号令声称二人和弗拉基米尔·卡恰洛夫中将“懦弱投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缺席判处他死刑，家属被捕。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救波涅杰林，1950年8月25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撤销原缺席判决，仍判死刑立即执行。1956年3月平反恢复名誉。)

К. М.: 向谁报告？

М. Ф.: 战俘营管理者。我们以为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逮捕他，但他们未加理会。他没跟我们一起走，留那了。后来他去了何处，发生了什么，我一概不知。

К. М.: 那么他有什么不好的表现？

М. Ф.: 我不了解。

К. М.: 是有感觉呢，还是有传言？

М. Ф.: 不，不，知道他跟德国人、跟弗拉索夫有勾结。后来不知怎么搞的他又被送到我们战俘营。

К. М.: 您估计，是不是被安插进来的？

М. Ф.: 有可能是吧，也可能他不愿意干了，或者犯错误了。但他没讲过。大家不跟他谈话，他自己也不说这件事。另外几个将军，似乎刚开始也曾跟弗拉索夫合作，后来拒绝效力，被扔到我们这儿了。

К. М.: 跟他们说过话吗？

М. Ф.: 不怎么说。我再多讲几句，甚至对波涅杰林，大多数将军的态度也很差，尤其那些和他一起待过哈默尔堡的人。波涅杰林——如您所知——被宣布为人民公敌，通令就是针对他和另几位将军的。我好

47 С М Е П Ш 是战争年代红军的锄奸反特机关，М Г Б 是国家安全部。

48 彼得·列先科是活跃于1920-1930年代的流行歌手。卢金引用这句歌词的意思是，即便到西伯利亚服刑也是生活在祖国。

49 5月26日

像说过，德国人在哈默尔堡曾建议我们写红军历史，怂恿将军、上校们写，说如果你们肯写，给你们增加口粮、发香烟。有些人同意了，但后来大多数人谴责他们：“你们给德国人写这些做什么？为什么把我们的情况统统告诉他们？回国之后，想写多少写多少”。那些人也就放弃了，退出了。但将军们对他们已经有了成见。我被送到纽伦堡战俘医院时，我跟您说过，医院的法国人、南斯拉夫人，以及一些曾为德国人工作的苏联人，听说我要回城堡，集资凑了五百马克。我不清楚具体数字，反正不少。他们是想让我把这钱带回去，分给将军们。我就把钱交给老将军穆兹琴科，说：“您分配吧”。结果不公平了：有的人给五十马克，有的人给十马克，取决于他认为此人对苏联政府犯罪的程度。我自己留了几张钞票，因为知道他会这样做，我亲自去找那些将军，分钱给他们。您知道吗，他们哭了：“凭什么这样对我们？那个某某（指名道姓）也跟我们一起的，可他没事，因为他跟穆兹琴科关系好”。我得告诉您，关起门私下讲……

【录音缺失】

那么，我们从巴黎坐飞机起飞，途中飞越柏林，望见柏林炸得稀巴烂。真高兴啊，柏林总算遭报应了。无论飞多远，满眼全是废墟。感觉特别愉快。

降落在柏林机场，柏林市内有个机场。我们下飞机，有人问：“你们去哪儿？”“我得去什么地方……”又问飞行员：“什么时候飞莫斯科？什么时候起飞？”飞行员扭头不答。所有人心情一下子不好了。

K. M. : 是给飞机加油吗？

M. Ф. : 对，给飞机加油，又起飞了。飞啊飞啊，我一看——因为我对莫斯科很熟悉嘛——正在中央机场上空盘旋。我说：“咱们到中央机场了”。

K. M. : 在巴黎，有法国代表送行吗？

M. Ф. : 有的，但只是打发我们走而已。我国代表是领事馆负责遣返的人，法国也派了代表。

K. M. : 在那边气氛正常吗？

M. Ф. : 正常。

K. M. : 相比柏林，莫斯科还算完整。

M. Ф. : 莫斯科完好无损。我们在中央机场降落，天擦黑了。飞机滑行至机库旁，我一看，没人。我说：“怎么没有家属，也没音乐、没鲜花”。大家不说话，沉默不语。连萨莫欣都没话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将军带领一队军官出现，站立片刻，往我们这边看看就走了。又过了一会儿，开来两辆有点破旧的客车，我活几十年没见过这种客车，迷彩色的。还有几辆小轿车。

架好舷梯，一名军官走过来，按姓氏点名：“伊万诺夫、西多罗夫、卡尔波夫、卢金，出来”。我们出机舱。他到我面前问：“自己能走吗？”“不行，我需要人扶一把”。“来，我扶您”，他搀着我下飞机。“这边请，坐轿车”。安排我和内务人员坐一辆轿车，出发。我问：“带我去哪儿？”“您熟悉莫斯科，自己看吧”。他们不肯讲。我说：“莫斯科我熟悉，我们现在走的是高尔基大街，接下来去哪儿？”“到了您就知道了”。

莫斯科的景象令人沮丧。楼房做了伪装，人们穿棉袄、棉夹克。

继续开，驶上了……现在叫卡尔·马克思大街，那时叫剧院巷。我说：“去卢比扬卡？”“不是”。车头拐向旧广场，我说：“难道是去中央？”他回答：“您在那儿没事干”。沿着马罗谢伊卡街开，我说：“那就是去列福尔托沃了”。我知道列福尔托沃监狱是最恐怖的监狱，心想，是要去列福尔托沃。再一看，不对啊，车往柳别尔齐方向开，出城了。开到熊湖村，停车，他们有点迷路。村里妇女儿童立刻围拢，我们也下车歇歇。朝哪儿开呢？往左拐，三栋两层小楼。

K. M. : 是不是有的人穿我国军装，有的人穿美国军装？

M. Ф. : 我们都穿便装，军装是美国的。暂时没人穿我国军装。

K. M. : 德拉贡不是让谁穿了吗？

M. Ф. : 没人穿，因为我们尚未正式授予军衔和肩章，所以都穿便装。

三栋两层小楼——这边要建设新机场⁵⁰——是给领导干部住的。我们下了车，列队集合。主任说：“我是你们最直接的上级，也就是你们将要居住的地方的主任。你们之前见过的率领一群军官的那位将军，他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流眼泪了。他答应来看望你们，和你们谈一谈”。

提前说一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过去了，我们问主任：“那位将军呢？仍在哭还是已经哭够了？”

K. M. : 几个月不露面？

M. Ф. : 他再没出现过。“请看，看见蘑菇岗亭了吗？有个战士。那个蘑菇就是你们活动的边界，不能往前走了。还有这栋楼，从楼边往外走五步，也不建议再走了”。然后开始安排谁跟谁一个房间。“食堂在这儿，你们可以到食堂吃饭。”我们去吃饭不用列队，也没人押送。就是普通食堂，饭菜还凑合。

50 熊湖村在莫斯科市东北，曾有莫斯科航空学院的训练机场，今已废弃。

过了几天，开始叫我们去见审查员。审查员来了，点名叫我们去。

K. M. :就在这儿审查吗？

M. Ф. :有个专门的房间。

我还是回过头说巴黎吧。我想，我为什么带着德国假肢走？我要德国假肢干什么？让法国人给我另做一个，听说法国的假肢水平高。我叫来我们那位阿塞拜疆人，说找法国人给我做假肢。

他说：“没问题，很快就好”。我们去作坊，老板说：“两个月”。我说我等不了两个月，需要尽快。

他说：“行，尽快做”。我们按照约定时间去拿，还没做好。为什么没做好？这很典型——天天集会游行喊万岁，没人干活。这就是法国人的特点，他们不爱干活，整天游行。

K. M. :那么，是带着旧假肢回国吗？

M. Ф. :不，他终究帮我做出来一个。手工挺不错，全金属的。我曾以为这样的耐磨损，谁知还是被我用断了。不过我也靠它走了挺长时间。

至于德国假肢……有一次早晨睡醒，发现假肢没了，裤子也没了。我心想见鬼了，难道清洁工拿走啦？蹦到卫生间看，没有，钻到床底看，也没有。我打电话投诉说我的假肢不见了，旅馆一阵忙乱。最后在哪儿找到的？在一个美国兵房间，被这个混蛋丢在自己床底。

K. M. :怎么，偷东西？

M. Ф. :偷东西。他不需要假肢，就是想偷伤残将军的东西。

K. M. :偷个纪念品。

M. Ф. :对。您记不记得我以前说过我有一个烟盒，是领事馆的两位阿塞拜疆人给我买的。烟盒也被他偷了。假肢他不想扛走，扔自己床底，人溜了。最后找回假肢，我又装上了。

【录音缺失】

审查员说：“坐下，讲讲，开始吧”。既不称呼我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也不叫姓，什么都不叫。我们警觉起来。

K. M. :审查员是什么样的人？年轻人吗？

M. Ф. :年轻人。我的审查员姓阿法纳西耶夫，我必须说，他对我态度很好。他抽我的香烟——我们带了很多烟，因为美国的食品包有很多，法国人也送我们烟，他自己也请我抽烟，但更多是抽我的。这个审查员从未对我粗暴无礼，纯粹公事公办，而且说实话，态度相当友善。他甚至试图帮我，比如，我跟您讲过有个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找到我，说：“老爹你好”。他说：“您怎么不讲这事，怎么和他谈的，怎么把他打发走的？那个南斯拉夫上校，俄罗斯人，原来是白军，您怎么和他谈的？您为什么都不讲？”我说：“这有什么要紧的？”

K. M. :由此可见，他们掌握的是间接信息。

M. Ф. :他们无所不知。他们对我了如指掌，想必也了解每个人的言行。但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更没谈论过，他却问我：“这件事您为什么不讲？”我说，需要的话就写入案卷吧。

这样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来某一天忽然发给我们军服，不是将军的，就是一般军官的，但没有肩章。过些天开始有人被叫去莫斯科，去见谁呢？见阿巴库莫夫⁵¹。从他那儿回来的人情绪都很差，阿巴库莫夫对他们大吼大叫，骂他们叛徒。总之，带回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我以为也会叫我去，可一直没叫，也不带我进莫斯科。我决定自己去一趟，但怎么去呢？我把假牙弄坏了，通知主任说，我的假牙断了，不能吃饭，需要修理。他说：“好，我问问”。随后告诉我明天进城。

我们是傍晚出发的。去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门诊部，医生已经等候多时，把一切处理好，我们返回。车子驶过莫斯科街道，我一直盯着窗外，尤其快到市中心的时候。“您怎么老往外看？”我说：“万一看见我老婆或女儿呢？”“那您打算怎样？”我说：“还能怎样，当然是喊一声，让她们知道我在这儿”。他说：“我劝您别喊”。我说：“你能把我怎样，难道开枪打我吗？”“我劝您别喊”。我就说：“别紧张，我不喊。我为什么要喊老婆？她在街上走，我在车里喊，她又看不见，只能听声音……”

K. M. :没有安排亲属见面吗？你们提没提出要求？

M. Ф. :提过。

我说：“我当然不会喊她，为什么要喊她呢？又不能见面，只会让她猜疑。有什么意思？让她以为我死了吧。无论是死是活，反正失踪了”。

我们开始询问自己亲属和家庭的情况。“把各自的地址报来，告诉我们家属住哪儿”。我们就报了。他们查清楚通知我们，我收到的信息是：“您妻子已经在领取您的养老金，女儿在外语学院念书，儿子在远东海军服役”。某些人的家属情况一时查不到，就没通知。还有些人，比如波涅杰林，直接告诉他：“您的家人被镇压了”。波涅杰林和另几位将军都是如此。

K. M. :基里洛夫没和你们一起吗？

51 维克多·阿巴库莫夫，时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长，是著名的酷吏，1954年12月枪决。

M. Φ.:他在这儿。基里洛夫是一位很优秀的将军,沉着、干练,也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但他是个好将军,很优秀。他没放出来。

我们的一些将军,虽然主任说过不许远离楼房五步,仍然试图走到公路那边看看。灌木丛跳出一个兵:“去哪儿?!”就这样……“哎,你们要转交什么东西,让我们代劳行不行?”只好扭头往回走。在食堂吃饭,悄悄问女服务员:“你们星期天休息,如果去莫斯科,请帮我寄信”。这信当然落入审查员之手。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将军们不清楚自己什么处境,不明白岂有普通服务员在这种地方上班。东西当然都被审查员拿到了。审查员问我:“您怎么从不写信啊?”我说:“写给谁呢?我知道家属在领养老金,我就放心了,领养老金说明目前平安。我女儿读书,儿子还在海军当兵,没从部队抓走,所以我不担心。没必要写信吧?”“写信告诉她您在这儿啊”。我说:“可我不知道你们放不放我啊,你们又没说放我。如果你们肯放我,我就写信,你们转交,好让她们准备迎接我”。他笑了笑:“这我没法告诉您,不是我说了算,我只负责调查”。“但结论是您写吧,您怎么判断?”“嗯,我还不知道作出什么结论,咱俩还没结案呢”。他就这样表态。



(第13步兵军军长尼古拉·基里洛夫少将1941年8月被俘,10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缺席判处他死刑,家属被捕。1945年5月被盟军解救,1950年8月25日以“军人叛国”的罪名枪决。1956年2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宣布基里洛夫案“没有犯罪事实”,恢复军衔、发还勋章。)

K. M.:他对您也说不了别的。

M. Φ.:当然,他只能这样说。

忽有一位将军精神失常了——罗日科夫。他绝食,不肯去见审查员,表示抗议——为什么还不放我们走。主任找我商量:“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劳驾您和他谈谈,搬到他的房间住。他装疯。我看得出来,您在这儿颇有威望……”我说:“我哪有什么威望?我一点威望没有!”他说他观察了,旁人对我的态度不一样,叫我去劝他。

于是我搬进去,陪他下棋、聊天。我说:“他妈的,饿了想吃饭,懒得去食堂。我叫他们把饭送来”。但我没说也给他带饭,我知道他不肯吃,这样他不会拒绝。服务员送来两份饭。我说:“先吃点吧,吃完接着下。你啊,下棋确实厉害,比我强”。我看他坐下开始吃饭,哎,挺好,情绪冷静了。我又跟他聊,说我们不必紧张,怕什么?见识过死亡,德国战俘营也熬过来了,在自己国家还要害怕吗?总之,这家伙缓过来了。

送我们去柳别尔齐洗澡,卫兵押送。那边的人都避开我们,因为看见武装人员寸步不离看守我们,都躲得远远的。感觉不愉快。洗完澡出来,见几位姑娘坐在外头,大概是高年级学生。她们坐着跟我们闲聊,很开心。我心想,她不知道自己和谁说话,她在和祖国的叛徒说话。如果告诉她,肯定跳起来就跑了。跟一个不猜疑你的人说说话,确实挺好的。突然:“列队走啦!”军官们跟我们一起乘车离开。我总是坐轿车,不坐大客车,算是优待吧。

七个月之后把我们转移到戈利齐诺⁵²。途径莫斯科,倒也平安无事。抵达戈利齐诺,安排我住的房间就是我上前线时家人来探望住的那间房——当时是莫斯科军区疗养所,我和女儿都住过。

K. M.:那时候有什么吗?

M. Φ.:也没什么。我们来之之前安东内斯库⁵³住过,之后没人住了。于是把我们转移到这儿。已经是冬季,每人发了毡靴。照样去食堂吃饭。感觉甄别审查已经结束。我们打牌,玩“傻瓜”、“公鸡”⁵⁴。没别的事可做,打发时间而已。

52 莫斯科市西边

53 扬·安东内斯库,罗马尼亚领导人,1944年8月被推翻,移交苏联关押

54 都是纸牌游戏

K. M. :给书看吗?
M. Ф. :没有, 没给过。

K. M. :报纸呢?
M. Ф. :从来没给过。

K. M. :连报纸也不给吗?
M. Ф. :不给看。
忽然有一天, 一个战士走进来说: “卢金中将去见审查员!” 大家都愣了: “中将!” 我也吓一跳。

K. M. :之前没这样称呼过吗?
M. Ф. :没有。

K. M. :只称呼姓氏。
M. Ф. :不是。战士说: “卢金去见审查员”, 而审查员只会讲: “坐吧, 说吧, 走吧。” 我之所以吓一跳不是因为叫我“中将”, 而是觉得审查已经结束了, 见鬼, 肯定有人告我的黑状。人们开始互相揭发、写举报信, 说某人什么时间讲过什么, 骂过集体农庄, 骂过领导人。他们举报了一位: 诺斯科夫将军, 他被俘比我们晚。当时我们问他, 我们的家属什么情况? 他却说: “你们的家属卖淫呢, 因为没有供给凭证, 没发工资, 没人雇佣她们, 她们还能怎么办?” 大家听了这话都很压抑。



(第6骑兵军亚历山大·诺斯科夫少将1942年5月掩护友军后撤被围, 亲自率队突破, 战至仅剩五名士兵, 被枪托打晕俘虏, 1945年5月被美军解救, 通过甄别审查, 1946年初恢复军职, 1954年6月因伤病退役。1960年元旦逝世。)

K. M. :蠢货。

M. Ф. :当然, 纯属傻冒。

审查员问我: “您怎么不写揭发材料呢? 不是跟各种人谈过吗?” 我说: “您看, 审查员同志, 我们这些人已经够惨了, 吃尽各种苦头, 我为什么要揭发别人? 确实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过什么, 难道你们在自己的小圈子就没说过什么不好、什么好吗? 你们也说过呀。这不就是反苏分子。您自己也知道, 我们的集体农庄有好有坏, 好的少, 坏的多, 您很清楚。议论这些有什么大不了的? 或者某人说某个领导不好, 也不等于他是反苏分子, 活该被揭发。我认为写这种材料等于诽谤中伤”。“哎呀, 您是这种人啊!” 对, 我就是这种人。

他还对我说: “您知道吗, 您还有三七年的尾巴⁵⁵, 那时候的问题还没交代清楚呢”。我说: “哎, 别提三七年, 三七年的事我清楚”。他又来一句: “您是这种人啊”。

应该说, 阿法纳西耶夫不像其他审查员, 从不冒犯我的自尊, 也不提什么刁钻问题, 甚至尽量帮助我。这个审查员我挺满意的。后来我在一家商店——以前的叶利谢耶夫商店——遇见阿法纳西耶夫, 那时我已经穿军装了。我们聊几句, 我说: “其他人怎么样? 谁放了谁没放?” 他告诉我, 某某、某某还没放出来, 判刑二十五年。尤其萨莫欣也判了二十五年——还记得我谈过他吧。

战士叫我去见我的审查员。“不, 不是这间, 在隔壁”。听这话就轻松多了, 是要我作证指认别人。松了一口气, 指认别人比听别人诽谤你轻松得多。

我一看, 隔壁屋坐着三个军官。“您好”。“您好, 请坐。那个,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 收拾东西, 我们出发”。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去哪儿?” 看来我脸都白了, 因为他马上说: “您怕什么呀?” 我说: “太突然了, 不是我怕什么, 是你们没说去哪儿”。他说: “回家”。我说: “我回家回了八个月进不去门。已经身在祖国, 在莫斯科, 还是摸不着家门。甚至不让亲属来看我”。“这次是真回家, 但别告诉任何人。您行李多吗?” “我哪有什么行李, 只有几个包”。

还记得我说过那个意大利大箱子吗? 我把几个包尽可能塞进去了。原来想的是, 回了家, 莫斯科大概不剩什么了。

55 即斯大林发动的1936-1938年大规模政治迫害

K. M. : 包里装的什么？

M. Ф. : 发给战俘的物资，他们叫食品包，就是给美国人、英国人寄的，我们在莫斯堡和巴黎收到的那些东西。

K. M. : 您留着呢？

M. Ф. : 我们都爱惜这些东西，因为不知道未来命运如何。而且食品包多的很，无限量发放。

军官说：“别告诉任何人您要回家”。但我仍然通知了几个熟悉的，知道他们没问题，在战俘营表现非常好，无愧于苏联将军身份。我从审查员那儿回去，说：“同志们，我要回家了。留个电话号码，没电话的写地址”。他们说：“我们早知道你第一个回家，这是好事儿”。我说，他们通知我回家，但我不敢确定。

挥别诸位，走出门外。门前有个广场，打字员、几位审查员、我们的看守和战士们排排站，齐声说：

“祝您好运，将军同志，一路平安”。我当场就哭了。这说明我真的要回家了，他们肯定知道才这样说。

出了大门，我问：“去哪儿？”“去卢比扬卡”。“哎，你他妈的，直接说去卢比扬卡不就行了”。

“嗯，然后再回家”。

来到卢比扬卡，我上了某一层楼，记不清哪层了。他们领我进接待室。我一看，牌写着：“阿巴库莫夫上将”，心想，行啊，轮到我了，之前没遭殃，今天遭殃了。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

门立刻开了：“请进，坐吧”。他的办公室比你这间宽两倍，但很长，门边放一把椅子，我刚进去就被要求坐下。而他远远坐在房间另一端，不抬头、不打招呼。我也没打招呼。他正在看文件，写什么东西，头也不抬问我：

— 卢金中将？

— 是。

—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

— 是。

— 腿没了？

— 对。

— 第二条腿两处骨折？

— 是。

— 手不能动了？

— 对。

— 谁招募过您？

— 呃，您知道的，弗拉索夫来过，和德国人一起，来招募我。他们让我签一份告俄罗斯人民书，声称斯大林、政治局和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敌人。

— 然后呢？

— 您知道我没签，没参与此事，我还努力劝弗拉索夫退出。

— 对，我们知道。您夫人给我写过两封信。

我说：您怎么答复她的？

K. M. : 他全程不抬头问话？

M. Ф. : 是的，根本不看我。他一直在翻阅文件，显然是我的案卷。

— 我那会儿不在，我休假了。

— 您的副手不能答复吗？

他没接话，抬起眼睛盯着我：

— 告诉我，您是个诚实的人吗？

— 上将，哪有混蛋承认自己混蛋的？

他似乎微笑了一下：

— 好吧，我决定放您回去。

K. M. : “我”决定？

M. Ф. : 对。“我决定放您回去。裁缝、鞋匠会去您家量尺寸做军装，还会发钱给您。您将重新编入红军。但一星期内别出门，也别和任何人说话。我们现在派人去您家接您夫人”。

我说：这是做什么？

— 您怕什么？

— 现在凌晨四点。他们去了，家里人在睡觉，听说“请去卢比扬卡一趟”，还不吓死了。

— 怕什么的？

我说：谁心甘情愿半夜上你们这儿？都是抓来的。他笑了笑：那好，我们先派人通知您家属。我说：那就不一样了。

当我收拾东西、出门、上车、开动的时候，派去我家的使者已经在敲门了。家中当然乱成一团，您能想象吗？

K. M. : 他们知道情况吗？

M. Ф. : 不知道。

K. M. : 不知道您在莫斯科？

M. Ф. : 不知。

K. M. : 就是说，只有夫人提交了申请？

M. Ф. : 她提交了申请，已经在领养老金。

K. M. : 她从何时开始领养老金的？

M. Ф. : 现在记不得了。

K. M. : 但不是在战争年代吧，战后？

M. Ф. : 战争年代她已经领我的养老金了，起初没人愿意聘用她，后来才要她。将军的口粮她也没拿到手，被某个混蛋冒领。后来我追查此事，为什么我家属没有口粮，被强行压下去了。后期给她安排工作，在营房维修处上班，但有人监视，严密监视。她知道自己被监视。有一次叫她去卫戍司令部，她说，她一进去就明白了，等她的不是军事委员，而是 C M E P III 的人。“您知道丈夫的情况吗”？诸如此类。她说：“也许您能告诉我丈夫的情况，我一概不知”。

她知道自己被持续监视。上班的地方有个姑娘，曾对她说：“那些家伙总来打听，问你跟谁见面了，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就告诉他们，她走路摇摇晃晃的，都挪不动步啦”。我妻子领取的口粮少得可怜，属于“受养人口粮”，所以日子很难。

总而言之，我到家了。当然，欢喜难以言表。第二天即有裁缝和鞋匠登门，帮我量了尺寸。还有人送来五千卢布，我问：“这是什么钱？”他们说：“有命令，发给您五千”。我说：“因为我被俘？”“您整个被俘期间五千卢布”。好吧，五千也挺有用的。过些日子军服做好了，没收钱。

邻居们听说她丈夫回来了，纷纷来我家“朝圣”。

K. M. : 从第二天起？

M. Ф. : 是的。对于那些我认识的、确信没问题、会被释放的人，我说：“我认为，您的丈夫，我见过他，他状态很好，我或许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您等着吧，他应该很快就回来”。用善言安慰她们。

K. M. : 没有看错的？

M. Ф. : 没有，一个都没看错。什么人清清白白我全知道，一个都没看错。家属盼了一段时间，之后特地感谢我。至于那些我知道不会释放或者有疑虑的人，我只说没遇见。听过传言，但仅限传言而已，具体在哪、什么情况不清楚，也不好说。何必揭人家伤疤呢，说我见过他、还关着、肯定出不来啦？我不想使人痛苦。

过日子呗。无人邀请我过节，也没有同志叫我到家做客，我以前有很多很多好同志，如今都像被牛舔净了似的。那几年没人来拜访我家人，没人询问你们生活好不好，更别提帮助了。每当节日临近，内心特别不是滋味。家家户户庆祝，四处召开隆重会议，而你像个被社会抛弃的人。

我向总政治部下属的纠纷调解委员会递交申请，要求恢复党员身份。“视同自行脱党”。总政治部的一个姓“И”的首长约我谈话，他现在似乎在哪个州委做书记。我去见他，他站在办公桌后，让我坐。

— 退役中将根据您的命令前来报到。

我拄拐站着。

— 说说您是怎么投降当俘虏的？

我说：

— 上将同志，您是不是问我怎么被俘的？我告诉您。

— 嗯，都一回事。

— 不，不一回事。

他沉默，我也沉默。

— 您没有问题问我吗？

— 没有。

— 我可以走了吗？

— 走吧。

我心想，还能指望这个呆子什么？何必在他面前据理力争呢？懒得跟他说话了，他给不了我什么。我就走了，“自行退出”。

K. M. :没有重新列入干部队伍？

M. Ф. :立即就列入了。

K. M. :军休干部？

M. Ф. :还没，我还在职。

K. M. :您自我介绍说“退役中将”。

M. Ф. :哦，看来我那时候退役了。我是四七年退役的。

当时布尔加宁和柯涅夫召见我——柯涅夫已经是总司令了——说：“我们可以安排您担任军事教育机构总局副局长，要么去‘维斯特列尔⁵⁶’”。我说，不要，我不干。首先，我从没担任过副职……

K. M. :在“维斯特列尔”也是副职吗？

M. Ф. :不，去“维斯特列尔”就是主任。但我毕竟不是党员，党籍还没恢复呢。布尔加宁和柯涅夫说：“我们了解你啊”。我说：“你们当然了解我，可党不信任我，党证没发还。想想看，万一工作中出了什么事情，找谁背锅？他们会说，这人做过战俘、非党员”。所以我说不行，我不干。“好吧，随你的便。虽然还没宣布，但我们会给你发全额退休金，军衔该享受的一切”。我表示感谢就走了。

随后我去干部部，找部长——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戈利科夫认识我，几乎每个人都认识我。他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今天有人给我提供职务，我谢绝了”。他说：“你做得对。无论出什么事，终归让你背黑锅。党组织闭门开会，你也要担心他们是不是在议论你。这就没有安生日子了。最好退役”。他这番话是金玉良言。

所以我退役了。拿着疗养证去疗养院，刚去过……比方说索契，又给你开一张去基斯洛沃茨克的疗养证。挺好的吧。但你一到地方，人家问：“党员吗？”“非党员”。惊讶地看着你：怎么一个将军不是党员？但你不会跟每个人都解释。这一切憋在心里，不痛快。虽然也跟你说说闲话，可大家聚到房间喝点酒聊点什么的时候不会叫你，泛泛之交而已，哪怕他们曾是我的同志、我的下属。人家如今是大首长了。

K. M. :斯大林死后才有变化吗？

M. Ф. :斯大林死后才有变化。具体是这样：所有曾和我一起被俘的同志们，都被建议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进修。我也收到建议，但我表示不去。我去做什么？上课要写作业、画图，我用左手能画吗？我说我不想再服役了。他们都读完总参军事学院，有的人去了部队，但大多数人留在学院执教。

K. M. :普罗霍洛夫也去了？

M. Ф. :也去了。每个人都去了。

K. M. :波塔波夫没和你们一起吗？

M. Ф.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波塔波夫也在。他到远东担任第5集团军副司令，晋升中将、上将。因为朱可夫早在哈拉欣河战役⁵⁷时就认识他，朱可夫出任基辅军区司令，把他调到第5集团军。所以朱可夫一直在提拔他——提拔的很对，因为他是个非常能干的、有学问的将军，相对年轻。

56 军队高级指挥员培训课程

57 诺门罕战役

后来同志们又被解职了。他们来找我，说自己被解职了。



(时任第1集团军副司令米哈伊尔·波塔波夫少将1939年参加哈拉欣河战役，1941年初到基辅军区担任第5集团军司令，同年9月兵败，部队伤亡惨重，他徒手搏斗，重伤被俘。囚禁期间坚忍不屈，曾获斯大林表扬。1954-1958年在远东担任近卫第5联合兵种集团军司令——卢金此处口误，1958-1965年敖德萨军区第一副司令，1961年授上将衔。1965年1月逝世。)

K. M.: 大概是在五十年代?

M. Ф.: 是的。我当时想: 今天解职, 明天恐怕就要逮捕了。于是我给国防部长布尔加宁⁵⁸写了条子: “请您接见我谈一点个人问题, 哪怕十分钟也好”。第二天清早, 他刚收到我的条子, 我家电话铃响——通知几点见我。

我去布尔加宁办公室, 他热情接待。我们坐在大桌子旁聊天, 回忆战争岁月。那时他是西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而我, 您知道的, 集团军司令。聊了一个小时甚至更久, 他才问: “哎, 你究竟为什么找我?” 我说: “大将同志(他当时也可能是元帅了), 我至今仍然是间谍”。

— 什么, 你是间谍?

— 是啊。哪儿都不邀请我, 同志们也不请我去家里。我约人做客, 人家不肯来。我就像被社会遗弃的人。比如我遇见熟人, 他非常熟悉我, 我也了解他, 但他东张西望, 或者走到另一边去, 避免跟我打招呼。我感觉大家对我不信任。

— 哎呀, 你这是胡思乱想。

— 不是我乱想, 确实如此。跟我一起做过俘虏的那些同志, 都是将军, 读完了军事学院, 成为教师, 如今却被解职了。

— 他们不是我解职的。

— 那大概是您副部长朱可夫签的字吧。跟我一起蹲战俘营的波涅杰林、基里洛夫等人, 被说成是人民公敌。卡恰洛夫被杀了(我把事情经过讲给他听), 波涅杰林在战俘营表现非常好。德军要策反, 何不策反波涅杰林、基里洛夫呢? 既曰“人民公敌”, 岂非人人得而诛之……

K. M.: 他们当时完全可以滞留巴黎呀。

M. Ф.: 完全可以留在巴黎。他们在莫斯堡的时候也可以留下, 投靠英国人或美国人, 像加里宁那样一走了之。他们可以这么做, 但他们没这么做。我曾和波涅杰林谈过多次, 我说: “你感觉怎样? 打算怎么办?” 他回答: “我什么感觉你心里有数, 周围人对我什么态度你也知道。但我要回去, 我要证明我不是主动投降的, 那时候无计可施了。至于开枪自杀, 你知道, 我不想自杀, 没必要白死”。

K. M.: 您也和基里洛夫谈过这个话题吗?

M. Ф.: 我和基里洛夫、和其他人都谈过。他们的回答一样: “我不认为自己有罪, 当时走投无路了”。基里洛夫说: “我手下只剩一小队人, 眼看我们被包围。还能怎么办? 自杀吗? 枪弹全打光了, 一发不

58 尼古拉·布尔加宁 1953.3-1955.2 任苏联国防部长

剩”。他们坚信会有人听他们解释，会查清原委、查清他们是怎样被俘的。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波涅杰林和基里洛夫都没放出来。

我对布尔加宁说，波涅杰林和基里洛夫在战俘营表现非常好。如果策反，为什么不策反他们？要知道有人提议让波涅杰林取代弗拉索夫，但他没答应。这说明他不是人民公敌，存在某种误解。

— 你知不知道是谁签署的“人民公敌”命令？

我说：“知道，命令签发的时候我还是集团军司令，我知道谁签的”。

— 拿来我看。

命令拿来了。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布琼尼、铁木辛哥——共七人签名。

我说：“元帅同志，也许当时确实需要人们更顽强地战斗，可现在战争结束了，还关押他们做什么呢？”

他开始给某个部门打电话：“卢金在我这儿。我们在谈波涅杰林——他在战俘营表现非常好，随便问谁，没人能说他勾结德国人。对，对的，照片的事……”

有一张照片，您也看过。怎么搞得我不清楚，反正照片是德国军官和他碰杯。我问他：“你跟德国人一起坐过吗？”他说：“在什么地方坐过……”我说：“你跟他们碰过杯吗？”他说：“没有”。那么照片究竟怎么拍出来的？

K. M. : 确实能伪造，不难。

M. Ф. : 我再给您说一个。在哈默尔堡当俘虏的第20集团军司令叶尔沙科夫中将死了。他从不跟德国人有任何来往。他出门散步，突然倒地，心脏破裂，去世了。按现在的说法大概叫心肌梗塞。我们战俘难友用几块普通的、不太干净的木板给他钉了一口棺材，抬出铁丝网外。德国人接收了棺材，没过多干预。可一段时间后我们收到一本杂志，刊登一张照片：包着红布和黑布的棺材，旁边搁着 P O A 的旗帜、纳粹的旗帜，还有 P O A 的卫兵和德国卫兵站岗。注明：“德国司令部厚葬否认苏维埃政权的将军”。我们都知道他从未背弃苏维埃政权，这完全是为了宣传伪造的。他是个非常正派、非常优秀的苏联将军，忠于祖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这时候布尔加宁打电话，提起那张照片。我对他说，照片我也见过，事情根本不是那样。波涅杰林从没被邀请参加什么酒宴，更没出席过。他一直表现非常好，直到最后。我被释放的时候他还关着呢。我曾坚信会搞清楚的，可到现在他还没放出来。

K. M. : 那时候他已经被枪决了，或者稍晚些。

M. Ф. : 是的。布尔加宁叫副官：“找找基里洛夫和波涅杰林的家属在哪儿”。几天后我给布尔加宁副官打电话，问：“找到了吗？”他说：“找到了。已下令让他们的妻子返回莫斯科。波涅杰林儿子还没找到，暂不知道他在哪个劳改营”。我问：“波涅杰林和基里洛夫夫人呢？”他不说话。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被枪毙了。

当然，肯定没人敢向斯大林汇报。大家都害怕，当时认为斯大林绝不会犯错误，这可以理解。

“好吧，你还需要什么吗？”我说我什么都不缺，养老钱足够，退役金也领了，又下命令帮我建别墅（虽然后来找我要盖房子钱，但也无所谓了），还给我一辆车，配了驾驶员。总之我都很满意，不需要什么。军装也做了。“那就好过日子。有事来找我”。我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党籍呢？没人请我入党，我自己要求入党。内战年代我就是团长，还指挥过旅，怎么变成党外人士了？”“都会解决的”。

过了一阵，曾在总政纠纷委员会拒绝我的那个家伙又找我，他还是中央委员呢，说：“你怎么还不写入党申请？”我说：“我去找过你，你拒绝了我，认为我自行脱党”。他说：“哎呀，以前是以前，写申请吧”。我说：“不写。别人写了那么多我的材料，我自己也写了很多，现在我都记不清了，到时候你又要说，某某时间该人不在此地而在某地。老天爷，早就忘干净了，不想再写了”。“那你就写两句话：请求再次审查”。嗯，这我倒是能写。

我写完自己的，告知那些被解职的同志：“听着，申请入党吧，据说可以了”。他们说：“我们试过了。昨天库兹涅佐夫——干部部的部长——叫我们去”（那时候他已经和戈利科夫调换了职务）。他召集所有被解职的人说：“亲爱的同志们，大家现在有的人列入预备役，有的人退役了。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眼下我们在精简军队。请各位不要认为曾经俘虏过，就会被另眼相看。去申请入党吧”。“我们已经申请过了”。“怎么样呢？”“被打脸了。什基里亚托夫叫我们去，说：‘你们保住军衔就该谢恩，还想入党！’”“对啊，那是以前，现在情况变了，写申请吧。卢金几天前刚找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元帅同志，我到现在还是间谍’。你们能想象他多难吗？”大家说：“我们都认识卢金，是你们不了解他。‘知道他多难吗！’我们就不难吗？！”“好好，写入党申请吧”。

于是又写一遍，呈送中央。审查员约谈——那时候命令还没下给审查员。布尔加宁跟我谈完，去找了赫鲁晓夫，他们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K. M. :这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吗?

M. Ф. :斯大林去世之后。我拜访布尔加宁三四天之后赫鲁晓夫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K. M. :斯大林未死, 去也白去。

M. Ф. :没有意义。我跟大伙说, 赫鲁晓夫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了, 他对我说: “卢金同志, 一切都会改变”。我懂, 他这是给我希望, 是真的会有改变。

显然, 这个指示还没传达到党的审查员。大伙去提交申请, 审查员却对他们说: “你们又来申请入党!” 开始训斥他们。他们回来埋怨我: “你他妈的害人, 又挑唆我们申请入党!” 我莫名其妙。审查员列昂诺夫约我谈话。

K. M. :在总政吗?

M. Ф. :不是, 在中央谈, 当时他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以前是总政纠纷委员会主席。他说: “将军同志, 您有三枚勋章?” 我说, 是的。“参加国内战争的勋章吗?” 我说: 是的。“您这样的人不入党谁入党?” 我说: “这个嘛……您更清楚党应该要什么样的人”。“请您在这儿稍坐。中央正在开会, 我去一趟”。

您去过中央委员会吗?

K. M. :去过。

M. Ф. :去过呀? 走廊很窄, 两边墙两排椅子。我身边坐一位高个、年轻英俊小伙子, 约莫四十五岁, 也可能不到四十五。我问: “您来这儿做什么?” “我从处女地来的”。“哪个处女地?” “就是过去的‘人民公敌’, 现在我们都这样互相称呼, 回来就说从处女地回来”。我问他: “您因为什么被抓? 原来做什么的?” 他说: “最后的职务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委书记, 之前是列宁格勒市共青团委书记。基洛夫提拔的我, 先是任命我做州委第二书记, 之后中央批准我做州委第一书记”。“那您因为什么被判刑? 指控您什么?” 他说: “罪名实在荒唐。第一条, 说我想杀基洛夫。我告诉他们, 我为什么要杀基洛夫, 他是提拔我的人, 难道我想取代他吗? 第二条更是无稽之谈, 说我提名一位集团军司令进入最高苏维埃。您也知道, 这些候选人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上面让提名谁我们提谁。我自己可能更愿意提个工人、挤奶女工或集体农民, 但上面吩咐了, 我就照办。因此他们判我刑。我穿着夏天衣服被送去砍树。哎呀, 将军同志, 林场的日子好苦啊!”⁵⁹

K. M. :他是战后发配的, 还是三七年那会儿?

M. Ф. :他说是三七年的事, 现在才把他放出来。也许服满刑期了, 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他说: “上级领导是刑事犯。吃得差, 天寒地冻, 雪有这么深。叫我砍树, 我当然完不成定额。不仅如此, 还要挨打。我暗想, 迟早得死在这儿。之后某一天, 领导又来了, 我知道他是来打我的……‘你再靠近一步, 老子劈死你。我可拿着斧子呢。劈死你! 我没什么可失去的, 我无期徒刑, 让你掉脑袋’。从此他就不敢了。我永远干不满定额, 尽量劳动出汗暖和暖和, 但定额太高, 根本完不成。我不仅总能拿到自己的口粮, 还能多拿一份。您看我现在这样, 还不赖吧”。他确实看起来不赖, 挺体面的。

这时他被叫进去。他出来后我问他: “怎么样?” “您知道吗? 根据各种情况, 我的党证会发还我。派我去哪儿不清楚, 哪儿都行, 但我感觉党证能拿回来”。

旁边还有一位老妇人, 年纪很大了。我问她: “您因为什么事来的?” ——我仍然想知道大家为什么来这儿。她说: “我呀, 原先是辛比尔斯克(或库伊比舍夫)的教师”。“您因为什么被关的?” “损害教学大纲”。“您被逮捕了吗?” “是的。先抓的我丈夫”。“您丈夫做什么工作?” “他是中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先抓了他, 之后把我也抓走了”。“而您至今不知道他在哪儿?” “不知道啊”。

对面长椅坐着一个人——走廊窄窄的, 说话听得一清二楚——他满脸胡子, 身材臃肿, 盯着她听她说话。她刚说完丈夫是师范学校校长, 那人突然喊: “阿妮娅!” 她也立刻叫出他的名字, 俩人紧紧拥抱。夫妻面对面坐着, 居然没认出彼此, 人的变化太大了。坐了十八年牢啊。您能想象那场面吗? 真是可怕。接着叫我了。我进屋, 屋里人不少, 大概十五位。

— 请坐,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你认得我吗?

— 听你说话我就认出来了。

此人是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叫尼古拉·季莫费耶维奇或伊万·季莫费耶维奇, 姓什么我忘了。他后来成为什基里亚托夫的副手。我做莫斯科卫戍司令的时候跟他很熟。外国代表团来访, 我俩一起接待, 参加宴会, 经常见面。他说:

59 卢金的记忆可能混淆。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委书记履历相似者只有亚历山大·费奥多罗夫, 1909年出生, 1929-1933在列宁格勒州共青团工作; 1937-1938沃洛格达州“鲍利斯-苏德斯基”机械化林业队队长; 1941-1942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委第二书记, 1942-1946州执委会主席; 1951-1954调任诺夫哥罗德州委第一书记, 1952-1954中央候补委员。此人年轻时仪表堂堂。

— 那么，同志们，我早就认识卢金，他曾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还有，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也给我打过电话，说他俩在 frontline 战斗，很了解他。还有你，列昂诺夫，大概也认识他吧？

我说，列昂诺夫肯定认识我。

他扭头问委员会诸位：

—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 没有。

我说：“列昂诺夫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我的案子是他审查的”。列昂诺夫有点尴尬：“没有，我没问题”。

— 那么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可以恢复卢金同志的党籍。卢金同志，我们一般是不宣布的，因为中央通常要审批我们的决定，但今天可以告知您。我们恢复您的党籍，您是真正的将军，苏联将军，应该是党员。愿上帝保佑您长寿。

我放声大哭。发生得太突然了，出乎意料。

— 党证可以到二号楼政治处领取。

我去了，人家说要补缴十三年党费。我说：“您开玩笑吧，十三年党费！我那时候不是党员啊”。“但现在要补缴全部党费”。我说：“等我打个电话给某某”。我打电话说：“听着，伊万·季莫费耶维奇，怎么回事——党籍恢复了，我现在还要赎回党证，交十三年半的党费？”“啊那个什么，他们不知道规定。我们这儿有规定：从发放党证之日起计算缴费”。

我没多想，就缴了发证当月的党费。回家一看——党龄不连续啊。呸，见鬼了！无论我去哪儿，亮出党证，人家就要问：您的党龄怎么不连续？每次都得解释一番。说实话，烦透了，我又给他打电话：“听着，你为什么给我发张废纸？”他说：“什么废纸？”“我不管走到哪儿，总要被问为什么党龄不连续，我必须反复解释我被俘多久、表现如何等等。我受不了了！你干脆让我变回无党派吧”。他说：“好吧，你打个申请，帮你改成连续党龄”。我写了申请，他马上批了，手续办得很快，改成无中断。

之后开始约谈其他被开除的同志们。审查人员起初对他们很严厉，慢慢的态度缓和了。某将军被指控（我们缴获了一些德军文件），说他告诉德国人伏尔加河沿岸正在组建三百个师，其中一部分即将发起进攻，你们德国人要倒霉喽。大概是这个意思。德国人确实准备在这个方向进攻，一听这话是将军说的，而且是集团军的炮兵主任、很了解内情的人——他们吓坏了，取消原定进攻计划。事实上我们在那边的确有新部队集结。俘虏供述了，情报部门显然也发现新部队踪迹。他说，他知道德国人正在准备进攻，所以故意那么讲，吓唬他们我国还没彻底耗尽力。最终他恢复了党籍。

几乎每个人最后都被释放了，除了波涅杰林、基里洛夫、西巴耶夫——他是铁道兵将军，曾在我的集团军待过。还有萨莫欣也没释放，判了二十五年。萨莫欣出狱我见过他一面，他当时在列宁山的莫斯科大学军事系任教，但党籍一直没恢复，以党外人士身份去世。他是唯一没恢复党籍的人。

我最后一次作证是一年半到两年前为格拉西莫夫⁶⁰作证，他目前住在别尔基切夫，是曾想写历史的人之一，但后来放弃了，坐牢太久，失掉党籍。他请求传唤我到党中央或党的监察委员会作证。他们问我是否认识此人，我说认识。“写写吧”。我就写了，我不可能说他什么坏话。于是他也恢复党籍。除了萨莫欣，其他人都恢复党籍。

各人继续工作。波塔波夫工作了很久，两年前去世，是个好将军。大家表现都很好。有些人对于写历史的问题有过犹豫，至于给德国人卖命——那是坚决拒绝的。所以我们这些将军，在被俘的艰苦条件下，仍然忠于祖国。

还有一位将军，他不在于我们那个战俘营，在别的地方关着。都喊他“别佳”，姓不记得了。是个好将军，非常乐观，讨人喜欢。美国人救出他，位置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边境。他问：“我可以开车四处看看吗？”“当然，玩去吧”。他说：“我去了南斯拉夫，然后开车到意大利。玩够了，找领事说：我是某某，请送我回国”。他们把他送回来了，谁知刚到敖德萨就被揪住领子扔进监狱。后来和我们在一起受审查。是个好人，可惜，没放出来。

К. М. : 死了吗？

М. Ф. : 死了。

1967年2月

60 第146步兵师伊万·格拉西莫夫少将1941年9月突围失败被俘，1945年5月被美军解救，同年12月被诬告在战俘营从事“反苏宣传”，逮捕、开除军籍、剥夺军衔，但从未定罪。1953年8月获释，1956年11月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军衔。

